



纳粹德国的最大克星

1. 从鞋匠的儿子到克里姆林宫的主人

约瑟夫·斯大林生于 1879 年 12 月 21 日，父亲是格鲁吉亚哥里镇的一个鞋匠，母亲是农奴的女儿。双亲都是目不识丁的格鲁吉亚少数民族的下层劳动者。斯大林家境贫困，父亲制鞋所挣不多的钱大都买酒喝了，母亲拼命工作以便免除儿子的辍学。父亲对斯大林的愿望是长大之后做个鞋匠，母亲对他的期望是长大之后作个传教士。

1888 年，母亲把斯大林带到了她当清洁工的哥里镇教会小学，她为儿子申请到每月 3 卢布的助学金，再加上她每月 10 卢布工资，这就是他们母子的全部收入。靠这些，斯大林在读完了 5 年的课程并以优秀的成绩毕业。1894 年夏，斯大林由校方推荐进入了第比利斯神学院。这所神学院，学生思想很活跃，是反对沙俄和封建势力的中心。斯大林在此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1898 年秋，斯大林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麦撒墨达西社”。

1899 年 5 月，由于斯大林的活动引起学院的反感，他被学院开除了。

1902 年 4 月 5 日斯大林因组织工人运动被捕，次年被流放



到西伯利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对沙皇的斗争中,斯大林先后 7 次被捕入狱,6 次被流放。

1917 年 4 月,在全俄布尔什维克党代会上,斯大林被选为中央委员。5 月,斯大林被选为政治委员。10 月,俄共中央决定斯大林领导武装起义。在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斯大林一直是最坚强的支持者。哪里有危机,哪里最困难,斯大林就被派到哪里。

1921 年 3 月,在俄共第 10 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

1922 年 4 月 3 日,苏共中央根据列宁的建议,选举斯大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从此,奠定了斯大林在苏共中央和苏维埃共和国的统治地位,也使他具备了入主克里姆林宫资格。

1924 年 1 月 21 日,列宁逝世。同年 5 月下旬,斯大林主持召开俄共第 13 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斯大林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此他成为名符其实的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领导。在此后将 30 年的岁月中,斯大林一直牢牢地控制着最高领导权。在这近 30 年的不平静的岁月中,斯大林领导苏联人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经历了苏德战争的洗礼,最终把苏联建设成为令资本主义世界震惊的社会主义强国。

2. 气吞山河的军事统帅

斯大林没有进军事院校学习的历史,但他却掌握着与时代相适应的军事思想,在处理军事问题时,他总是站在战略的高度上,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气吞山河的气势指挥军队应付战争。

3. 纵横捭阖的战略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不仅在率领苏联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表现出钢铁般的坚强意志,而且在建立反法西斯联盟中显示出了作为伟大战略家的纵横捭阖的雄伟气度。

一 母亲的愿望

在苏联西南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有一座叫哥里的小城镇。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有湍急的河流,有肥沃的田野。山谷里的葡萄园、麦田和果园也远近闻名。

1874年前后,一个年轻的格鲁吉亚鞋匠和一个娴静、端庄的格鲁吉亚姑娘,在这里相爱并结了婚。年轻的鞋匠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娴静、端庄的姑娘叫叶卡捷琳娜·格拉泽。她刚满18岁,比丈夫小5岁左右。他们都是下层劳动人民,因家庭贫寒,没有文化。由于手中缺钱,只好以每月一个半卢布的租金租到一所小屋安了家。

这所小屋只有一间厨房和一间住室。住室大约有14平方米,有一扇小窗户,光线暗淡,也很潮湿。由于地势低洼,一到雨

苏联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它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格鲁吉亚是其中的一个民族。它由若干个加盟共和国组成,各加盟共和国的名称都是以建立该共和国的民族为名的。格鲁吉亚民族1921年2月建立了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尔后加入联盟,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



天,泥水就不可避免地外面灌进屋子里来。全部的用具和陈设是一张小桌,四个凳子,一个放着一把茶炊的小碗橱,一面镜子,一只放衣物的箱子以及一铺着草垫子的木板床。

在这所暗淡无光的屋子里,1875年到1878年之间,他们生了3个孩子。这3个孩子都在出生后不久夭折了。1879年12月21日,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取名约瑟夫,爱称索索。他以后改名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自然,父母把他当成了心肝宝贝。尤其是母亲,她把自己的一腔爱 and 心血全部倾注在她的索索(或索赛罗)身上。但由于父亲挣的钱入不敷出,有时甚至连房租也不够,更谈不上养活一家人了。所以,母亲不得不没白没黑地拼命干活。为别人洗衣服、烤面包、缝制衣服,想方设法使儿子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免受饥寒。约瑟夫因此在五六岁以前体格健壮,有充沛的精力。

在约瑟夫童年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母亲,她是个虔诚的教徒。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她决定让儿子上教会学校,以便他长大后当一个教区神父。她一心为儿子的打算就是这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更加拼命地干活。

天有不测风云。有两件事几乎使这位母亲的希望完全破灭。

第一件事发生在索索7岁(1886年)时,他患了天花,病得十分厉害,靠着他那结实的身体才熬了过来。第二件事发生在1889年,也就是索索上学后的第二年,叶卡捷琳娜的丈夫坚决

索索,是约瑟夫·斯大林的爱称。格鲁吉亚语中索索是“乔”的意思,索赛罗(小乔)是更进一步的爱称。



反对儿子上学读书,他一定要让孩子学自己的手艺,并把儿子领到他做工的工厂。他愤怒地对妻子说:“你想让我儿子当神父,是不是?”你一辈子休想!不错,我是个鞋匠,我的儿子将来和我一样也是个鞋匠。”这次在约瑟夫前途问题上爆发的斗争,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经过激烈的争吵,叶卡捷琳娜胜利了。儿子因此才回到学校去继续上学。

很多年以后,她的儿子成了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领袖,成了对整个国家和全世界较有贡献的伟大人物。而这位母亲却不理解,她似乎瞧不起儿子所取得的成就,瞧不起尘世间的荣华。因而在她去世前不久儿子去看望她时,她对他说:“你没有当上神父,真可惜!”

二 奋发向上

1888年的秋季,快满9岁的约瑟夫带着母亲的希望和嘱咐,进入了哥里城的一所教会小学读书。

学校的课程大多数是用俄语教的,每星期只有很少的几节课用格鲁吉亚语教。这样,作为自己本民族的格鲁吉亚语就成了“外语”。但索索这样的年龄,却也能较容易的接受和吸收这种“外来语”。他天性聪颖,有非凡的记忆力,各门功课都几乎不费什么力。可他个性好强,十分用功,一定要胜过别人,他的考试成绩在班里总是最好的,他是公认的“优等生”。



这期间,他父亲到 40 里外的皮鞋厂当雇工去了,每月无钱寄回。母亲一面在学校当清洁工,一面为别人洗衣服,每月可挣得 10 个卢布。索索在学校勤奋学习,有很好的影响,母亲帮助他获得了每月 3 个卢布的助学金。索索和母亲就是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的。

在学校,索索一边努力学习,一边开始认识人生和社会。他逐渐觉察到,他的大多数同学都来自富裕的家庭,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也发现了这一区别,并看不起他。可他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优越感——在课堂上,他能够更流利、更轻松的用俄语或格鲁吉亚语朗诵课文;在操场上,他的敏捷和胆量也远远超过了他们;更重要的,他还是学校最优秀的摔跤手。大家都听命于他。

他酷爱读书,像饥饿的人扑在食物上一样。他读过达尔文的书,读过马克思的书,读完了哥里图书馆的“几乎所有藏书”。这时他开始反对宗教,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当一位同学和他谈话提到上帝时,他说:“你知道,他们在骗我们。没有上帝……我借一本书给你读一读,它会告诉你,这个世界和一切生物与你想象的有很大不同,关于上帝的话全是胡说八道。”

对于有些事,人们的记忆或判断可能会有变化,但历史的裁决是永恒的。约瑟夫的早慧还有别的事实为根据。那就是 1895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升入第比利斯正教中学的第二年,在格鲁吉亚很有影响的《伊维里亚报》上发表了他的诗文:

当皎洁的月光,
蓦然洒向大地,
淡淡的清辉投到
那遥远的天地;



当苍翠的树林里，
夜莺在啾啾啼，
悠扬的萨拉穆里，
袅袅余音回肠荡气；
当安静片刻之后，
山泉重又丁冬而去，
长夜里微风徐徐，
把黑树林骤然惊起；
当逃亡者在敌人追逐下
重返多难的故地，
当沉沉黑夜过去，
重又见到阳光熹微；
愁云这时终于消散，
敞开了抑郁的心扉，
强烈的希望再一次
在我的心中燃起，
诗人的心情激动万分；
诗人的心潮澎湃不已，
因为我知道，
这希望多么纯洁、多么美好！

这首描写山乡月夜的景象，抒发对现实和未来的朦胧希望的诗，以他这个年龄的知识、理解和笔法的简洁而言，的确是很不一般的。

萨拉穆里，是一种芦笛。



1894年7月,金风送爽,在丰收的季节到来之时,约瑟夫也取得了一张考试优等证书。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哥里教会小学五年的学习。学校根据他的表现和能力,把这个模范学生保送到第比利斯正教中学学习。

哥里学校的校长和神父知道他家没有力量供他进入中学,但却对他的能力和前途充满信心,一致帮助他争得了奖学金。为他进一步的深造、成长尽了最大的努力。

母亲的梦想似乎就要实现了。

三 非要拔尖不可的学生

年仅14岁的约瑟夫上中学了,内心欢欣鼓舞。

他告别母亲,走了70多公里的路,从梦幻般的农村小镇来到了喧嚣而又热闹的格鲁吉亚首府。这是一座古城,广场和大街都很宽阔。从广场和大街伸延开去,是狭窄的曲曲弯弯的街道,街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平顶房和集市。集市,各地的商人以及不同民族的人熙来攘往,摩肩接踵,讨价还价。仅仅是这一变化,就使他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了。

从1894年秋季到1899年夏季,他一直在正教中学学习,对他的智力和思想的发展来说,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

这所学校以前叫梯弗里斯神学院,后改名为第比利斯正教中学。它和当时俄罗斯帝国其它地区的宗教中学一样,其宗旨



不仅在于进行教育,而且在于训练学生过宗教生活。当约瑟夫进校时,马克思主义和各种解放运动的思潮已经在这里涌动,学校实际上已成为第比利斯反对俄国当局的一个中心。在学生方面,这时最主要的表现是强烈地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利益,仇视俄罗斯的民族歧视和统治,憎恨学校牢狱般严酷的校规。这有事实为证:

1885年,一个名叫西尔韦斯特·季布拉泽的学生(他后来成为一名革命领袖),由于痛恨院长丘杰茨基说格鲁吉亚语是“狗语”而袭击了这个院长,结果遭到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刑罚。但是第二年,这个院长还是被另外一个学生暗杀了。1890年3月,学生们又组织起来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罢课。1893年12月4日,就在约瑟夫进入该校前的几个月,发生了这所学校中所有格鲁吉亚学生的正式罢课。第比利斯宪兵司令扬可夫斯基向沙俄首都圣彼得堡电告:“正教中学的大多数学生已经宣布罢课,要求撤换几个教员,并建立格鲁吉亚文学讲座。”警察头子也不安地报告说:“很多知识界的人士认为,对于学生来说,封闭这所学校将是一件不公正的事情,因为这些学生只是按照自己的思想来捍卫本民族的利益。”但在校长的要求下,警方还是暂时封闭了这所学校,强迫学生们回到家里去,并有87名学生被开除出学校。

约瑟夫成为这所学校的一名新生,和新入学的其他同学们一样对于这次罢课的情形逐渐地了解了。罢课学生怀着对格鲁吉亚民族的热爱激情,要求在学校中教授本民族文学的强烈愿望,使他一开始就受到这场政治事件的感染,并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注视着这个新的环境。



校长是俄罗斯修道士海尔莫杰尼斯，教务长是格鲁吉亚人阿巴希泽，他对俄罗斯当局奴颜婢膝，竭力讨好，一心想得到重用和提拔。俄罗斯人校长还不能忘记他的前任被暗杀。格鲁吉亚人教务长则一方面对上级的一点点不悦都感到恐惧，另一方面又十分担心幽暗中可能酝酿着可怕的举动。学校当局越是处于紧张和恐惧之中，就越是密切地监视学生的举动，积极地偷听学生的谈话，经常地在学生宿舍中搜查禁书，把学校变成了一座大监狱。他们害怕学生的造反。

学校每天早晨7点把全体学生集中到礼拜堂做长时间的祈祷，全天上课和祈祷交替进行。除了宗教课程外，还有数学、希腊语、拉丁语、俄罗斯文学和历史。规定学生只有得到特殊允许才可以在课后外出两个小时，但必须在下午5点校门关闭以前返校。学生只要稍有违犯，就要受到在地下室的一间小黑屋子里单独关禁闭的处分。伙食也很低劣。这种令人难以忍受、令以窒息的气氛，引起了学生们普遍的愤恨。

在中学的头两年约瑟夫很用功，开始成绩在全班名列第八，第二年名列第五。他脑子反应快，记忆力强，能够一下子记住所学的课程。与此同时，他开始憎恨学校侮辱人的制度，接受了当时在学生中间风行一时的造反精神。他在哥里上学时就有一种非要拔尖不可的劲儿，如今越发显得突出了。

他读书的范围也更广泛了，除了对启迪思想的政治书籍感兴趣外，还对民间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从一个流动图书馆借书，所读作品不仅有格鲁吉亚的诗歌和小说，也有俄罗斯和西方的经典著作。他还爱看历史、经济和生物学方面的书籍。对一个年轻的中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读书活动。如同谙熟



祷文和圣经一样,他读过的东西从不会遗忘。

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本格鲁吉亚作家的小说《弑父者》,这本书描写了山区农民为自由和独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柯巴是书中的一个主人公。之后,他开始用柯巴作绰号;后来,这个绰号成了他常用的名字;直到1910年前后,他开始管自己叫柯巴·斯大林;最后才改为约瑟夫·斯大林。

四“不明的原因”

处在十五六岁年龄的斯大林热情奔放,知识和思想也在不断的丰富,中学阶段的头两年他发表过好几首诗。这些诗极具浪漫色彩,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表现出他对祖国强烈的爱。其中的一首《致月亮》特别引人注目,这是一首热情奔放的抒情诗,歌颂为反抗外国压迫者而牺牲的格鲁吉亚烈士们。这些诗所表现的思想证明了他当时已经是一位热情的格鲁吉亚爱国者。

在这个时候,对他的思想和发展起主要作用的是达尔文的生物学以及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通俗读物。

从这时起,自然和社会的唯物论观点,在他的心中极有影响。他失去了对神的信仰,而19世纪末叶俄国涌现出来的一批出类拔萃的革命青年,由于他们富于理想,勇敢,事业心强,极端仇视旧社会,强烈主张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因而开始成为他的



楷模。在第比利斯的一些革命青年用格鲁吉亚文在当地的大型刊物上发表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他们大都在哥里小学和第比利斯中学上过学。1893年12月第比利斯中学轰动一时的罢课之后,一些革命青年由于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捕,出狱后于1897年又回到第比利斯,以巨大的热情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他们的行为激发了约瑟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从而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1年斯大林回忆说:“我参加革命运动是从15岁起,当时我和居住在南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成立的秘密小组发生了联系。这些小组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引起了读马克思主义秘密刊物的兴趣。”在回答“是什么力量把你推向了反抗的道路?”时,斯大林回答说:“……是我当时在那里求学的那个中学的反动校规、贫富不均、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使我成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真正革命学说的拥护者。”

当时俄国已处在革命风潮四起、大革命风暴正在酝酿的阶段,列宁已在彼得堡展开了革命活动。1894年6月列宁发表了他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当时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阶级力量进行了深刻地分析,指出了无产阶级解放之路。列宁的著作,激起了年轻的斯大林要求革命的愿望,他准备献身于革命,并决心为争取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从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斗争。他相信人民一定会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一定会胜利。

1896年至1898年,他成了第比利斯中学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领导骨干。他向大家讲解达尔文学说,组织进行关于历



史、政治经济学的座谈会，并根据手抄本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一些著作。学习小组还根据斯大林的倡议，组织了手稿杂志的出版。他们在杂志上写文章，揭露、抨击专制制度及其对劳动者的压迫和残酷剥削。斯大林尤其喜欢列宁对局势的分析，他曾非常渴望“我无论如何要见见他。”

1898年8月，在当地革命者的介绍下，他参加了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事业中起着积极作用的“麦撒默达西社”，他和1895年参加该社的楚鲁吉泽和1897年参加该社的凯茨霍维利3人，是在“麦撒默达西社”中占少数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核心，这个核心是后来建立格鲁吉亚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派的萌芽力量。

斯大林参加了革命组织“麦撒默达西社”之后，更加焕发了精神和干劲，一面继续领导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一面在工人群众中进行革命活动，参加工人中的秘密会议，写传单，组织罢工。这是他最初在先进无产者中间受到的革命实际工作的锻炼。

由于他经常在工人和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1899年5月29日被校方开除出学校。理由是为了“不明的原因”而未能参加考试。从此他离开了这所他度过5个年头的半修道院半监狱般的学校，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他没有循规蹈矩争取毕业后当神父去过自己的舒服日子，而是走上了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充满艰险的职业革命生涯，成了革命的“柯巴”。



五 不屈不挠的柯巴

约瑟夫被学校开除后离开学校的几个月里,没有职业,没有固定的住处,暂时靠着朋友的帮助。他学会了机警谨慎,学会了使自己不引人注意以躲过警察的监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他能弄到的各种革命材料,同具有革命精神的人秘密而广泛的接触,他的造反精神从此有了发展,产生了向沙皇政权挑战并试图摧毁这个政权的强烈欲望。但一时又找不到他所需要的那种指导和答案。在他看来,尽管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对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启发,可是他却远在格鲁吉亚,不能与革命运动取得真正的联系。

1899年12月底,他在第比利斯地球物理观测站找到了一份工作,报酬很低。上班,就是在规定的间隔时间用精密仪器进行观测,有时整夜不能休息。但他还是感到很满意。因为他有生以来破天荒第一次有一间房子,不值班的时候,能自由自在。

他的房间没有什么陈设,十分简朴。桌子上总放着叠得很高的书籍和小册子,其中多数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他在业余时间不是读书就是组织工人小组开会。他经常给大家看一些当局禁止的小册子,后来还有《火星报》,但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从谁手里得到这些材料的。

1900年“五·一”节对约瑟夫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他组织



了以铁路工人为主体的庆祝活动。当时在格鲁吉亚，“五·一”节是非法的。他在加里宁(后来担任过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支持下,还组织和领导了5月、7月和8月的铁路工人大罢工。工人罢工的浪潮席卷第比利斯各工厂,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恐慌。他们用暴力和逮捕对付工人,特别是工人运动的领导者。这样,他不得不离开第比利斯转入地下,在秘密条件下进行活动。

为了进一步对工农群众进行思想动员,使社会主义与高加索的工人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在他的领导下,以“麦撒墨达西社”中的革命力量为基础,组成了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并于1901年9月创办了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张秘密报纸《斗争报》。关于报纸的主要内容和方针,他给了这样的说明,他写道:

“在俄国和一切地方,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具有解放人类并为全世界谋幸福的历史使命。很明显,只有工人运动才有其坚实的基础,也只有工人运动才能摆脱任何一种乌托邦的空想。所以,这个报纸既然是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就应当领导工人运动,给他指示道路,使他不犯错误。总之,这个报纸的首要职责就是尽可能接近工人群众,设法经常影响他们,成为觉悟的、领导工人群众的中心。”

在俄国,《斗争报》是一份很好的马克思主义报纸。列宁的《火星报》热烈地祝贺格鲁吉亚第一个革命的定期刊物的问世,并赞扬该报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揭露机会主义者和团结工人为革命而斗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1901年12月,他受党组织派遣,前往濒临黑海大港口和南



高加索的重工业城市巴库。该城是一个新的石油工业中心,有10个以上的大型企业和数量众多的产业工人。但还没有一个革命组织来领导工人革命运动和发动他们对沙皇制度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进行斗争。

他一到这里,就立即着手与这里先进的工人群众联系,在各企业中建立社会民主工党小组,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组织农村中的革命宣传工作,把革命的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革命核心。

1901年11月11日,他被正式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委员会委员。这个机构领导着整个高加索首府的各社会民主工党小组,是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高加索的实际执行机构。警察的秘密报告中这样写道:

“1901年秋天,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派其成员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前第比利斯中学六年级学生)去巴库,执行在工人中间搞宣传鼓动的任务。由于朱加施维里的活动……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开始在巴库所有各工厂相继建立起来。”

巴库临近土耳其,有3万多人口,约有一半是土耳其人。在这里,约瑟夫开始经常使用“柯巴”这一化名。在土耳其语里,柯巴的意思是“不屈不挠的人”。而斯大林在俄语中的意思是“钢铁的人”。



六 第一次被捕

1901年12月31日,在秘密的充满紧张与革命的激情中,新的一年就要来到了。柯巴在一位工人家里,以举行新年晚会的名义,组建成立了一个新的巴库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

为了满足宣传和斗争的需要,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一个秘密的简易印刷所。之后,又用从第比利斯带来的设备扩充了这个印刷所,很快就印出了传单和宣言书。到1902年2月底,在各大工厂的工人中间,共建立了11个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巴库有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在活动。

这期间,他还不时地到第比利斯去,与委员会的同志们联系,参加那里的会议并报告他在巴库的工作。他亲自撰写传单,这些印制的传单散发到了石油工厂、货运车站和其它工厂里,对工人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警察的机密报告中说:

“由于朱加施维里的活动……社会民主工党宣传的后果已经在1902年里看到了。罗斯柴尔德工厂发生了长期的罢工,街头发生了示威游行。”

这是指发生在2月27日的一次罢工,罗斯柴尔德工厂是个炼油厂。这一天,工人们有组织地进行了罢工,接着由6000多名工人组成示威队伍,前往地方军事长官的办事处请愿。军队接到命令开枪镇压,工人奋起反抗。结果15名工人被当场打



死,54名工人被打伤,另有500余名工人被捕。警察四处搜查,千方百计想找到那个令他们不安的秘密印刷所和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暴力和流血事件的消息很快传开了。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和疯狂的逮捕,柯巴“处在工潮的大海之中,亲自指挥这场运动”,毫不动摇。他一面组织工人把印刷机秘密转移到巴库近郊一个穆斯林居民村庄继续印刷传单和材料,一面进一步加强对工人斗争的领导。与此同时,警察也采取了行动,他们开始了对革命者的搜捕。

1902年4月5日,星期五。这天晚上,在一位工人同志的家里好像在举行一次联欢会,实际上是巴库委员会的会议正在进行。柯巴像往常一样,面貌还那么消瘦,嘴上留着胡须,黑褐色蓬松的头发,透着英俊、坚强;他一边抽着带纸嘴的香烟,一边有条不紊地讲着话,像个“浪漫派大学生”。突然有人发觉,巴库的警卫队不仅包围了这所房子,而且在地下室安了密探。柯巴继续抽着烟,他异常平静地说:“没事儿。”过了一会儿,警察闯进屋里,逮捕了他和其他的人。

这是他第一次被捕。当他把自己献给人民革命事业的时候,似乎早就有这样的准备。

从1902年至1917年二月革命,先后被捕7次、流放6次,从流放地逃出5次。尽管遭受到沙皇反动政府的残酷迫害,但他从未退却,从未间断过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真正的革命者为着改造社会从不胆怯、畏惧,哪怕流血牺牲也在所不辞。他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也肯定会使自己的品格、



精神得到磨砺和升华,从而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并推动社会进步的杰出的英雄人物;崇高而艰苦的斗争时时在考验和造就着每一个革命者,谁也无法逃避……

柯巴在巴库总共呆了4个半月,他进行了紧张而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惊心动魄而且充满“火药味”。可是却引起了巴库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位领导人尼古拉·齐赫泽的害怕和尖锐的批评。

齐赫泽也在第比利斯正教中学上过学,格鲁吉亚人。他知识广博,能说善辩,与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工党内其他幼稚的人一样,也赞成“合法”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反对革命暴力活动。虽然他知道柯巴来巴库的消息后很高兴,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年轻的革命者要和当局针锋相对搞暴力举动。他几次找柯巴谈,还通过朋友谈,一定要柯巴取消或改变计划,可是柯巴认为自己是“对的”,仍坚持要把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齐赫泽的表现是“内心怯懦”。

时间是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

10年以后,1912年,尼古拉·齐赫泽成为沙皇议会中社会主义党团的主席,柯巴则是处于秘密状态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一名中央委员,并受党的委托,领导俄国中央局的工作。15年以后,1917年,齐赫泽因顽固坚持其所谓“合法革命”的立场,激烈攻击列宁不要用暴力毁了党而从党内清洗出去。斯大林在这一年的5月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7—8月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做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和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捍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



俄国获得胜利的学说，阐述并坚持了列宁的武装起义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方针。10月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被选进党领导起义的总部，作为革命军事“中心”的五名领导成员之一，参与并指挥了胜利夺取沙皇政权的革命暴动。十月革命胜利后，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齐赫泽和斯大林同是格鲁吉亚人，又曾在同一个学校上过学。可是，他们由于对革命所采取的实际态度和所表现的精神不同而使他们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七 黑夜风雨中

历史和现实中的伟人，都是经历了无数平常人所无法经历的困境，解决了无数平常人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出众超群，立地顶天，对人类作出了贡献，为人们公认并永久纪念的人。尽管他们也会死去，但却永载史册。——柯巴就是这样的人。他不喜欢吵闹，沉默寡言，能很好地控制自己；性格坚强，凡事胸有成竹，而且总有镇定和清醒的头脑。对于自己的同志来说，他始终是一个耐心的、敏感的和有益的朋友。

1903年3月，当柯巴还被关在监狱的时候，高加索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成立了一个全高加索联盟。柯巴缺席的情况下被选入这个联盟的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这是一件十分特别而



又稀罕的事,说明了大会代表们对他在地下工作中十分突出的作用和成绩是了解和肯定的,对他本人是充分信任的。

这一年的7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特别是大会临近结束选举党的领导机构和《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时,拥护列宁的候选人以两票的多数当选(19票对17票,3票弃权)。从这以后,党开始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党内两派在选举领导机构成员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两派在解决革命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方式、方法不同。这是一个关系到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

就在党内对革命前途等问题认真准备和激烈争论的时候,柯巴正从一座监狱被转到另一座监狱,总共被关了1年零3个月。1903年7月9日,他被判处流放3年,流放地在西伯利亚东部伊尔库茨克州新乌达村。11月27日柯巴到达新乌达村,但这里早已是冰天雪地了。12月,他收到了列宁的一封来信,这封信对柯巴的思想和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3年的流放和寒冷,对于生长在炎热的格鲁吉亚的柯巴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里的冬天,寒风刮起来发出可怕的吼声,好像要把整个天空都撕碎一样,漫天的飞雪淹没了群山、原野和村庄;暴风雪更像疯狂的魔鬼,尽情地发泄它的威力。柯巴的脸和耳朵都冻坏了,但这并没有使他打消逃走的念头,也没有能阻挡住这位不屈不挠的革命者。他要革命,革命也需要他的强烈信念,他决不能容忍、也决不会屈服于同革命斗争隔断3年。

柯巴差点儿冻死在西伯利亚,但终于在1904年1月5日成



功地逃了出来,于2月重新回到了第比利斯,开始了他一生革命活动的新时期。

这时候,正是俄国处在黑暗势力的束缚和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候,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上的争论和斗争也已经传到了高加索党组织里来。因此,柯巴一回来就不可回避地面对党内派别的争吵。他确信列宁的思想是正确的,所以毫不犹豫地站到了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一边,并为此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

1904年12月,斯大林领导了巴库石油工人的大罢工。这次罢工持续了19天,有21个工厂的8300名工人参加。他们提出以召开立宪会议和实行8小时工作制为主的要求。罢工期间,工人们高呼“打倒专制!”和“打倒战争!”的口号,多次举行了示威游行。

沙皇政府企图用煽动巴库地区的民族冲突来破坏罢工,但是最终遭到了失败。

巴库罢工终于胜利了。产生了在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和资本家的集体合同。合同规定了9小时工作制(假日前1天为8小时)等内容。这次罢工,是南高加索和俄国许多区域革命运动高涨的开端。

许多年以后(1924年1月28),斯大林在一次演讲时说:

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1903年。固然,这次认识并不是经过亲自会面,而是通过互相通信。但这次认识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党内工作的整个时期中,这个印象始终都没有消失。那时,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列宁的这一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对于我们党的实际工作给了一个



尖锐的批评,并把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作了一个简略的说明。只有列宁才善于把最纷乱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明了、扼要和大胆,他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一句寻常的话,而是一颗打中目标的子弹。这封简单而大胆的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

列宁的信充分表达了柯巴心头长期盘算的问题,对他的思想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使他第一次正确理解了列宁的思想。从这时起,这两个革命领袖的友谊便开始了。

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柯巴密切地注意着革命的前途,对实际情况有真正的理解,能够预感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感受和听到大革命初来时的隆隆声。他在领导南高加索革命运动的同时,还从事巨大的理论工作。当时高加索所有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几乎都是他发起和组织起来的。他把出版秘密报刊、小册子和传单的工作,扩大到了沙皇统治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他旗帜鲜明地对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及其错误观点坚决回击,勇敢无畏地支持列宁在《怎么办》中的极为重要的革命主张。

从这一年的年底开始,柯巴以《无产阶级斗争报》(这个刊物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用格鲁吉亚文和亚美尼亚文出版的秘密报纸。其前身是《斗争报》)和《高加索工人新闻报》为阵地,以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立场,用俄文、格鲁吉亚文和亚美尼亚文连续发表文章,坚决反对破坏革命的错误和分裂,号召坚持革命斗争和内部团结。

柯巴在激烈的论战中,阐明了许多理论和政治问题,揭露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派别、集团的叛卖阴谋和立场。他写道:

“据布尔什维克看来,要把目前的革命进行到底并以人民专



制来完成它,只有在如下场合才有可能,就是领导这次革命的一定是有觉悟的工人,革命领导权一定要集中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手里,而不是集中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手里。”对这种思想进行攻击的人,如果不是完全发了疯,便是心怀仇恨和敌意。

他在《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一文中坚定地号召人们:

“现在是推翻沙皇政府的时候了!……俄国像一支装上子弹、扣起扳机的枪,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团结在各级党委委员会的周围吧!我们连一分钟也不应该忘记:只有党委员会才能胜任地领导我们,只有党委员会才能指引我们认清敌人,才能把我们组成一支勇猛的大军,并率领我们去和敌人作斗争,才能和我们同甘共苦。”

柯巴的论著不仅在高加索,而且在国外也影响很大,并且得到远在瑞士的列宁的极高评价。1905年7月,列宁的夫人就以列宁的名义写信,要求得到一本斯大林写的《略论党内意见分歧》的小册子(1905年5月用俄文、格鲁吉亚文和亚美尼亚文出版,最初发表于《无产阶级斗争报》),并要求定期寄送俄文版的《无产阶级斗争报》和一份柯巴用格鲁吉亚文阐述列宁观点的文章清单。柯巴以他革命的实践和理论,完全表明了他已经是坚定的列宁主义者,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在沙皇反动统治的黑夜里,柯巴不怕坐牢和流放,迎着极其复杂的斗争风雨奋力拼搏,勇往直前,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极有影响的革命者。他革命生涯中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就要展现出来了,那就是他与列宁直接会面并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



这是 1905 年 12 月,柯巴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代表的资格前往芬兰的坦默福斯,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第一次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他第一次与列宁会面了。

柯巴这时已经 26 岁,除了被沙皇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短暂时期以外,他一直都在外高加索度过。他的成长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起先是勤奋学习、一定要成为在同学中拔尖的学生,接着是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后来又成了职业革命家,1905 年成为一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

他早就渴望见到列宁,相信列宁是党的“山鹰”,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所以,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并直接与列宁会面,柯巴心里是何等的高兴呵!

1924 年 1 月 28 日,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军校学生晚会上作讲演,用朴素的语言,真诚的感情回忆了这次会见:

“我第一次会见列宁,是 1905 年 12 月在芬兰坦默福斯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我本来希望看见我们党的山鹰,看见一个伟人,这个人不仅在政治上是高大的,而且可以说在体格上也是高大的,因为当时列宁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身材匀称相貌堂堂的巨人。当我看见他是一个人毫无区别、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

“通常,‘大人物’照例是开会迟到,让会场的人望眼欲穿地等着他的出现;而且‘大人物’就要出现之前,会场上的人彼此告诫说:‘嘘……静一点……他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一套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它能令人肃然起敬。当我知道列宁比代表们到的更早,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参加代表会议的最普通的代



表们进行最普通的谈话的时候,我是多么的失望呵。老实说,我当时觉得这未免有点违背某些必要的常规……

“后来我才明白,列宁这样质朴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愿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长处,正是他这种群众的新式领袖,即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

19年了,这次会见还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他依然对列宁满怀着崇高的敬意,对这次会见记忆欣然。

他在讲演中真诚地赞扬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缔造者和领袖;着重强调并希望俄国青年学习他勇于献身、严守纪律、谦逊待人等美德,在建设苏维埃国家,战胜国内外敌人的艰苦岁月里,成为激励俄国青年一代献身祖国、英勇奋斗的精神力量。

八 党是运动的最最重要的核心

1908年3月25日,柯巴在巴库被捕,关押在拜洛夫监狱。

他对于监狱的生活条件只能忍耐,并养成了严格控制自己的警觉的能力。他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机会写文章,通过秘密关系传出去在《巴库无产者报》和《汽笛报》上发表。

11月9日柯巴被判处流放沃洛格达省两年。1909年2月8日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患了斑疹伤寒病,于月底到达。四个月后的6月24日,他从流放地逃到了彼得堡(后来到巴库),化



名麦里基安茨,继续从事秘密的工作。但他这时已不再局限于党在当地的活动,而是放眼全国了。

他到了自己熟悉的巴库,发现党员已减少到只有二三百名布尔什维克和一百名孟什维克,而且多数存在心灰意冷的情绪。《巴库无产者报》在他不在期间也没有发行。他于是首先着手《巴库无产者报》的复刊,把这一工作当作不仅在高加索,而且在俄国,在流亡国外的人中间使党重新振作起来的第一步。

在他回来后刚好3周,《巴库无产者报》于1909年8月27日出刊,他为这期报写的《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的社论,分析了党组织削弱的原因,指出了党在当前应采取的行动。他反对任何放弃党的地下工作的建议,认为这样做不是挽救党而是毁了党。为避免党沦于瓦解,他主张各派联合起来进行斗争。他在巴库党委会的一项决议(由《巴库无产者报》发表)中写道,“在布尔什维克派这样一个精神饱满、生气勃勃的政派中,无论过去或将来,这种意见分歧总是会有的”,但决不允许导致分裂。因为,党是领导运动的最最重要的核心。

11—12两个月期间,他撰写了一系列“高加索来信”,在巴黎和日内瓦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这些信中的基本态度与列宁完全一致。

1910年的1月底,巴库委员会作出的另一项由柯巴起草并作为传单散发的决议说,俄国革命动力一个时候有过的“沮丧和麻痹状态”开始消失了。决议提出了紧急建议:

把党的实际领导中心转移到俄国;创办在俄国出版的、由上述中心编辑的全国性报纸;在各个最重要的党的活动中心创办地方机关刊物。决议还建议布尔什维克党团结那些拥护地下工



作的孟什维克。

为了把工人斗争真正纳入党的领导,使党真正成为革命运动的最最重要的核心,斯大林正在付出极大的努力,他为在高加索石油工人中发动一次大罢工而忘我地工作着。但是,3月23日,他又一次被捕,关在拜洛夫监狱。

6个月后,他被判处流放,直到1911年6月27日。当时限定他5年之内不能回高加索,也不准他住在彼得堡或莫斯科。这年的9月6日他前往彼得堡,在那里立即被捕,送回沃洛格达流放3年。

柯巴在高加索的革命活动中受到了实际的锻炼和教育,取得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但他的作用实际上已经超越出了这个舞台。

1912年2月中旬,斯大林(此时他已开始使用这个名字)还在流放期间,但他已直接得到了党的代表会议的消息。这次代表大会,列宁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他还得知他被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列宁决意要在国内建立一个组织中心和创办一种报纸。中央委员会建立了一个俄国局,实际领导全国各地党组织的监督和发展工作,他被任命为这个局的成员。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1898年以前称社会民主党;1898年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起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起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18年七大起称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十四大起称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十九大起称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取消了党的双重名称。



对斯大林来说,这是他献身革命的新时期的开始。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属于全国的党了。

九 《真理报》的诞生

1912年1月15日—17日,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在布拉格召开,将孟什维克清除出党,永远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式上联合在一个党内的局面。从此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代表会议指出了俄国工人运动重新高涨的表现,以及党的工作正在活跃起来的大量事实。在讨论了各地代表的报告后,代表会议指出:“在所有各个地方的社会民主工人中间,都在努力进行秘密巩固地方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和团体的工作。”党的各地方组织,都承认布尔什维克在退却时期所采取的主要策略原则——把秘密工作与党在各种合法团体中进行公开工作相结合的原则是正确的。

代表会议选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当选为中央



委员的有列宁、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斯维尔德洛夫等人。其中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是在本人缺席的情况下被选进中央的,因为当时他们还正在流放地。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的还有加里宁。为加强党对俄国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了由斯大林负责主持的中央机关——俄国中央局。

代表会议还就布尔什维克过去反对机会主义的全部斗争作了总结,并决议将孟什维克驱逐出党。

斯大林对这次代表会议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说:“这次代表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划了一条界线,并把全国各地布尔什维克组织统一成立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从此,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变得更坚强有力了。

为实现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争取将各地方党委会变成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组织的艰巨斗争到来了。这个斗争的成败,首先取决于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积极而有成效的活动。

1912年2月29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斯大林再次从沃洛

格鲁吉亚人,17岁开始革命活动。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协助列宁、斯大林准备和领导了十月革命。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长,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布尔什维克党的卓越活动家,苏维埃政权最初的组织者之一。15岁起在工人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后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主席。

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十月革命后为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1938年后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格达流放地逃了出来,并开始负责领导俄国局的工作。当时,列宁和斯大林认为,俄国局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为此,必须向全国党的组织说明代表会议决议的重大意义,为组织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展开斗争,使他们的工作活跃起来。为此,党中央派斯大林视察了俄国各个重要地区。在南高加索的巴库和第比利斯视察期间,他冒着被沙皇政府逮捕的危险,召集了各区党组织的工作人员会议,亲自撰写工作通讯、组织印发列宁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名义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竞选纲领》,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

这一年的4月4日,位于西伯利亚的连那金矿罢工的工人遭到了沙皇军队的镇压,250人死亡,270人受伤。消息传来,彼得堡、莫斯科及其它工业企业和矿区工人阶级,立刻愤怒地行动起来,纷纷举行罢工、游行示威和群众大会进行强烈抗议。他们通过决议,严厉谴责沙皇政府的血腥暴行。

连那事件“激起了广阔的罢工浪潮”,连那枪声“成了罢工和示威运动的信号”,俄国的革命运动从此真正高涨起来了。

为了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迫切需要有一种全国性的、有权威的报纸,以便统一认识,指导和组织革命运动。斯大林受党中央和列宁的委托,积极参加了《真理报》的创刊工作。在新的革命运动浪潮和党的迫切需要中,《真理报》(日报)于1912年5月5日在彼得堡诞生了。斯大林以中央委员身份,领导制订了《真理报》的编辑方针,并参加了编辑该报创刊号的工作。他实际上是《真理报》的第一任总编辑。

《真理报》的创刊号社论《我们的目的》是由斯大林撰写的。社论确定了该报的战斗任务是向工人运动的敌人宣战,对他们



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社论指出,工人阶级斗争的统一,是使无产阶级已经展开的战斗获得成功的保证。

但在《真理报》创刊那天,斯大林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经过数月监禁之后,被流放到纳赖姆边区,没过多久他就逃了出来。一回到彼得堡,就继续领导《真理报》的出版工作。

当时,沙皇政府千方百计地扼杀《真理报》。自1913年7月起两年半中,《真理报》先后被沙皇政府查封过8次。在工人的支持下,它不断以《工人真理》、《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拥护真理》、《无产阶级真理》、《真理之路》等名称继续复刊出版,成为布尔什维克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坚强有力的阵地。

《真理报》每期上都刊登有工人写的通讯和消息,报道工人们遭受残酷剥削的种种事实和工人的罢工、游行。遇到大规模的长期罢工发生时,《真理报》就在一些企业和工业部门的工人中募捐,用募得的罢工基金援助罢工的工友,培养了工人群众的团结精神,使他们认识到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

每逢发生政治事件,或是取得了胜利,或是遭受了失败时,《真理报》就登载工人的来信、贺词或者抗议书。同时,《真理报》还在自己的文章中,根据布尔什维克党的立场指出斗争的任务、方向。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引导他们注意斗争策略。当然必须是用暗示的方法,而觉悟了的工人们很能理解这种暗示。他们从字里行间知道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就是推翻沙皇制度,成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8小时工作制。

《真理报》也用一定的篇幅报道农民的疾苦和斗争,去唤起农民加入革命斗争。列宁就曾在《真理报》上发表过他的《俄国



地主的大地产和农民的小地产》一文，很清楚地向工农群众指明了有怎样多的地产是掌握在不劳而获的地主手中：

仅仅 3 万个大地主就占有土地 7000 万俄亩(1 俄亩 = 1.093 公顷)，而 1000 万户农民总共只有这么多土地。每个大地主平均占有土地 2300 俄亩，而农民，连富农在内，每户平均不过 7 俄亩。其中有 500 万——占全体农户一半的贫苦农户，他们每户不过 1 至 2 俄亩。

这些事实告诉人们，农民遭受贫困和饥饿的根源是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农民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革命。

由于《真理报》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很快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真理报》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在锻炼、巩固和发展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方面，在争取广大群众拥护布尔什维克主张等方面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成为指导工人运动、准备革命的强有力的战斗武器，“奠定了布尔什维克 1917 年胜利的基础”。

COM
校园之星

十 粮食，燃眉之急

俄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取得了 1917 年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一胜利,立即在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恐慌,更引起了俄国国内已经被推翻但还未放下武器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各种反动派的极大恐慌,他们相互勾结起来,向苏维埃政权发动了疯狂地武装进攻,妄图一举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1918年春,以俄国内部的反革命叛乱为内应,英、法、日、美等14个帝国主义强盗不宣而战,对苏维埃政权发动了大规模地武装干涉。

英、法帝国主义军队从俄国北部摩尔曼斯克登陆,把军舰开进白海,占领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并向彼得罗扎沃茨克推进,并扶持叛乱分子成立了反动的“俄国北方政府”,威胁彼得格勒。日、美帝国主义派兵协助叛军占领了海参威,之后占领了整个远东。在南高加索,英军会同叛军夺取了巴库。德军侵入顿河地区,占领了罗斯托夫和格鲁吉亚,并武装支援哥萨克首领叛乱。德军还乘机夺取了乌克兰和南高加索一部,禁止那里的人民同苏维埃俄国保持联系,以实现其孤立、削弱苏维埃俄国的目的。局势最严重时,曾有四分之三的苏维埃国土陷入敌人手中。1918年3月11日,俄共中央被迫把首都由彼得格勒迁至莫斯科。

这样,到了1918年初夏,苏维埃俄国就几乎完全处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局势严重。但更为严重的是,敌人隔绝了苏维埃国家的燃料、工业原料,特别是粮食的来源。大批工厂因缺乏燃料而停工、停产,交通运输几近瘫痪。工人每天只能领到八分之一磅面包(约合50多克),有时甚至连一点也领不到。斑疹伤寒又使人们大批死亡。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空前严峻的考验。



为了坚决反击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镇压反革命暴乱,保卫苏维埃祖国,斯大林作为列宁组织和领导国家的主要支柱之一,肩负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之职,工作任务重大艰巨。他要对付的不仅是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国内的反革命叛乱,而且还有因此而造成的水、陆交通中断,工厂因原料和燃料缺乏而停工或半停工。更为可怕的是整个国家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只有牢牢地守住察里津,才能得到号称粮仓的伏尔加河下游和北高加索的粮食,从而扭转严重危急的局面。经列宁提议,1918年5月29日,党中央任命斯大林为南俄粮务总监,并作为中央代表担任南方战场的总指挥前往察里津。

斯大林临危受命,迅速行动。他在400名赤卫队和两辆装甲车护送下,穿过敌人的占领区,于6月6日到达察里津并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撤换了那些胆怯不力、腐化堕落官员的职,解散了那些打着革命招牌反对革命的组织,很快征集到大批粮食。同时,任命了一大批政治委员,对运输组织和劳工进行整顿,以确保将粮食安全地运送到首都。他及时向列宁报告了这些情况。列宁得知很受鼓舞。6月11日,他以党和政府的名义在发表的《告全体人民书》中写道:

国内外的帝国主义者企图用饥饿来绞杀革命是注定要失败的。“东南方正在帮助闹饥荒的北方。在察里津领导顿河和库班粮食工作的人民委员斯大林,打电话给我们,说那边有大量贮藏的粮食,他希望于最近数周内将这些粮食运到北方来。”

斯大林在解决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粮食问题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五个月中把大约500万普特(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



的粮食和其他食品运到了共和国最重要的城市和红军手中。

十一 察里津——斯大林格勒

察里津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水陆交通枢纽。是莫斯科与东南部粮食和石油产区联结的咽喉所在，也是由东南通往首都的重要门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因此，在 1918 年春开始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中，它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重要目标。

1918 年 5 月底，斯大林受命指挥整个俄国东南方防务并负责保卫察里津。他深知察里津的重要和自己责任的重大。在紧张的军务和战争环境中，他非常重视抓好正规军队的组建。很快就组建起了新的集团军、正规的骑兵师、军，以及由游击队赤卫军组成的正规师、旅、团，任命英勇善战、政治可靠者为军队指挥员。正规军队迅速建成，对保卫察里津起了重大作用。

在首都莫斯科，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与武装组织“社会革命党人”，这时也趁火打劫。7 月 6 日，他们混入德国驻苏大使馆，开枪打死了德国大使，图谋挑起德国向苏联开战。他们还出动了数千名武装分子企图接管莫斯科市政府，但被布尔什维克部队及时发现并缴了械。

7 月 7 日，列宁电告斯大林，通报了反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的阴谋，并指示说：“必须无情地镇压那些已经成为



反革命手中工具的可鄙的歇斯底里的冒险分子。因此,请无情地镇压反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并经常地保持我们之间的联系。”斯大林回电说:“为防止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将做好一切准备。请放心,我们的手决不发抖。”

但是,反革命的暗杀、恐怖活动并没有停止。8月30日,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领导人被暗杀。列宁也遭暗杀者的枪击而受伤。经过了两天两夜紧张的抢救之后转危为安,9月19日重新开始工作。

在察里津,斯大林经常向列宁报告粮食购集、运输以及前线的局势、军队组建和巩固后方措施等重大问题。但察里津方面的强大压力还没有明显的缓解,特别是粮食运输和该市本身也受到了威胁。

7月17日,斯大林召开了察里津方面军指挥员及党和政府的紧急联席会议,讨论面临的严重局势,确定了必须加强集中领导,提高革命警惕性等措施,并经列宁同意,于19日成立了最高军事委员会北高加索军区委员会,正式任命斯大林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军事委员会和该市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工人和市民被充分动员起来,他们不分昼夜,加班挖战壕修阵地工事,生产武器弹药。生产了11辆装甲车和18辆装甲汽车,还修好了300门大炮。为粉碎顿河哥萨克军队的进攻,又新组建了几个配备有大量机枪和大炮的加强师;原红军骑兵部队也改编为更大的炮兵部队,并组建了新的装甲纵队以配合步兵与骑兵协同作战。增强了察里津的防卫能力。

到了8月,以顿河哥萨克军队为主力的敌人在增援部队的



有力配合下,对察里津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他们沿伏尔加河从西、南、北三个方面把包围圈越收越紧,察里津局势再度告急。

8月11、13两日,斯大林以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告诉人民“察里津被包围了!……”宣布察里津处于戒严状态。号召全体党员、团员、红军指战员和工人阶级紧急行动起来,保卫察里津,保卫苏维埃政权。

在保卫察里津的紧张的日日夜夜里,斯大林高度注视着每个作战区、段的作战情况,经常彻夜不眠,指挥部队与敌人浴血战斗,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地疯狂进攻,终于守住了这座英雄的城市,保证了源源不断的粮食得以畅通无阻地运送出去。为此,列宁于9月19日以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给察里津的斯大林发来贺电说:

“请转达我对奋不顾身的保卫工农政权而战的察里津前线的英雄指战员们,以及全体军队的兄弟般的问候。请转告他们,苏维埃俄国十分赞扬……(他们)所建树的英雄战绩。

“高举红旗,奋勇向前,毫不留情地消灭地主——反革命势力和富农反革命势力,向全世界表明,社会主义的俄国是不可战胜的。”

1920年冬,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平息了,令人难以忘怀的14国武装干涉也被粉碎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经受住了考验,胜利了。

但是,胜利的代价是惊人的。据估计,在1918年春开始到1920年冬结束的战争中,大约有2700万俄国人死亡。其中多数是死于战场及游击战斗中,而有成千上万的人是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



为了表彰和纪念斯大林在察里津保卫战中建立的功勋，1925 苏维埃政府依照人民的请求，把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察里津，命名为斯大林格勒（1961 年改名为伏尔加格勒）。

十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在斯大林钢铁般意志的激励和组织下，被帝国主义和国内战争所破坏的工业和农业生产，到了 1925 年就已经基本得到了恢复。但这时苏联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产品在国民总产值中只占很小的部分，苏联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斯大林高瞻远瞩，告诉党和人民：

如果说 1917 年的十月革命是要在政治上战胜资本主义，那么，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扩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以期在经济上也把资本主义战胜。”

他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的生存，就意味着必须要赶上和超过工业化的西方列强，而决不能满足现状，固步不前。在 1931 年 2 月全苏产业工人第一次代表会议上，他发自内心诚恳地说明了赶上和超过西方的迫切性。他说：

“人们有时间：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我



们对全世界工人阶级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因为它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和土耳其等地的王公贵族、上层人士的尊号。）打过它。瑞典的封建地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

“过去我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祖国。但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而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祖国，而且我们要保卫它的独立。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么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期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我们比先进的国家落后了 50 年至 100 年。我们应当在 10 年内跑完这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这样，一场在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下，把俄国“由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保证国家经济独立自主和加强国防能力的伟大尝试开始了。

苏联实现工业化的方法与资本主义的通常做法不同。它不是先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然后再发展重工业。因为，斯大林感到自己的国家没有这么多时间，而且帝国主义也不允许。

他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

“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



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假如这件事稍迟一着,那就等于失败。党记住了列宁的指示: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因此我们党也就排除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来开始实行国家工业化。”

可是,这需要投入亿万资金,资本主义国家又拒绝向苏联贷款,加之技术力量也极缺乏。工业化面临巨大困难。西方世界嘲笑说,苏联在这种情况下要从重工业开始实现工业化是“莫斯科的一个狂妄荒诞的计划”。

困难并没有压倒斯大林和苏联人民。他把迅速实现工业化,使国家强大起来的立足点放在本国力量的基础上,鼓舞全国人民的建设热情。他指出,苏联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资金和积蓄的来源。我们在十月革命后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消灭了私有财产和制度。土地、工厂和银行都变成了全民的资产。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工人、农民创造出来的积累和储蓄,就是我们的资金来源。我们取消了沙皇政府所借的外债,这些外债每年仅付利息就达数亿卢布。而所有这些收入的源泉,都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中。

为了尽快解决技术问题,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国家和工厂兴办了许多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到1933年,约有20万学生在高等院校攻读,90万学生在中等技术学校学习。工厂办的学校和专业训练班每年训练100万工人。还有相当数量的苏联大学生和工程师去国外受训,他们回来后成了工业的指导者和组织者。而不断由正规学校和训练班培训的学员和技术工人,也逐步满足了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短缺的



需要。

全国的扫盲运动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质,在生产中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又促进了职工的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苏联的工业化终于在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阻力中使西方国家失望了,因为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相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的灾难之中,出现了大倒退。

1933年1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报告中说,苏联由从前落后的农业国已经变成了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工业国。产业工人的数目增加了一倍,工业总产量也增加了一倍。他说:

“我们从前没有钢铁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从前没有拖拉机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从前没有机床制造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从前没有汽车制造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他接着谈到航空工业、农业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以及其它,并且说,“我们不仅创立了这些工业部门,而且它们的规模使欧洲工业相形见绌。”

他使全国人民认识到,如果不能继续保持迅速前进的步伐,不但会推迟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国家的生存就会处在危险之中。因为日本已经从中国东北向苏联边境寻衅,纳粹德国已公开提出要占有乌克兰。

斯大林在报告中说,“我们不得不鞭策我们的国家,因为它落后了100年,并因落后而面临亡国的危险。否则我们就会在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处于手无寸铁的状况。”

英雄的苏联人民在以斯大林为核心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



维克)的正确领导下,克服了巨大的困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和雄厚的经济基础的建立,成为保证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十三 他没有假日和休息

1929年是苏联人民在粉碎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之后,经过九年和平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年。12月21日,举国庆祝斯大林五十寿辰,盛况空前。

国内各种报刊竞相发表赞颂斯大林的文章,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上挂起了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几乎每个主要城镇的广场都矗立着斯大林的全身或半身塑像。斯大林——钢铁的人的名字被用以命名,——苏联最高的帕米尔山地最高峰被命名为斯大林峰。人们把胜利归功于他,真心地、热情地表达他们内心的崇敬。人们热爱党和自己的领袖,献身国家建设的极大力量被焕发起来了。

50岁以前,斯大林在经历过苦难童年后的长期革命生涯中,曾多次被捕、流放,而且也曾成功地从流放地逃走过多次。尽管遭受到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但他始终坚韧不拔、追求真理,从未间断过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成为列宁组织和领导国家的主要支柱之一,肩负着艰巨而繁重的任务,特别是在1924年1月21日



列宁逝世后,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者,继承和捍卫了列宁主义的事业,不仅要领导党和人民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且要把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显示出他迎接更大挑战的勇气和能力,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

50岁以后,斯大林仍将任重道远,担负着继续把捍卫和发展列宁主义的事业推向前进,他依然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己任,他的“个人生活”仍然是工作、事业,工作、事业。而且其复杂性和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对他来说,不存在假日和休息。他还有晚上工作的习惯,不管是星期一还是星期六都是一样:召开政治局会议、接见部长和军队的首脑、会见外国客人等也从不例外。斯大林这种工作起来没有假日的习惯,是在革命和紧张建设的艰苦年代养成的。数不清的文件、便函、命令、电话记录以及他的亲笔批示,都准确地记载和说明了他没有“假日”,也没有“休息”。

斯大林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工作,有报告、情报、各种材料、电报、信件等。几乎在每个文件上都有他写的指示和批示,简洁地表达他对各种问题的态度。他的妻子也习惯了他那永无休止的工作习惯。她认识到丈夫并不是属于她一个人的,而是属于人民、属于人民的事业的。斯大林没有时间去关心和教育自己的孩子,甚至极少见到自己的孩子。

他的住所里没有一件贵重的东西。除了一架公家的钢琴,甚至没有一幅好的、“真正的”画;沙发椅套着布套。房间也没有摆放一件古董。墙上挂的是普通木框镶装的纸印复制画,客厅中心挂了一幅1922年他与列宁合拍的放大照片。地板上铺了



两块地毯,盖的是和战士一样的被子。除了一身元帅服外,他只有两套普通的衣服:一套是帆布袋,一套是一双穿了鞋底的毡靴和一件农民穿的皮袄。

斯大林是一个品德高尚、勤劳朴素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者,他把自己的一切全部献给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十四 听取不同意见

在苏联劳动与国防委员会领导下的一个专门委员会里,科学家和专家们为自己的海军设计了一艘新型的战列舰。从全部主要数据来看,这是当时一流的,而且预计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战列舰。

这艘战列舰按设计总共装有 6 门大口径高射炮。为了审察和批准设计方案,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在斯大林主持下召开会议,首先听取专门委员会作情况报告。报告结束后,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后来的苏联海军元帅伊萨科夫对这艘战列舰只装备 6 门大炮持不同意见。他在这次会议之前曾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未被委员会接受,因此只好在这次会议上说。

伊萨科夫的观点是,威力等级更低些的英国战列舰装备着不少于 12 门火炮,如果我们的战列舰只装备这样少的大口径高射炮,那就无疑使它的对空防御和作战能力大打折扣,就会把它断送,它们将被空军炸沉,数十亿卢布将会付之流水。所以宁肯



多花点钱，一定要改变设计。他也清楚，这是大改而不是小改，增加火炮数量关系到整个战列舰结构的变更，就得重新设计隔舱、改变全舰所有指标的搭配等等。总之，这首先是对设计师的最大不快。但他还是不退让地、而且是慷慨激昂地争。

这时，有一位很有权威的领导说：“他要干什么？关系到整个高加索、外高加索，关系到全部交通线的罗斯托夫大桥我们才设置 8 门高射炮。一艘战列舰上有 6 门他还嫌少！”这就等于给伊萨科夫的“棺材”上钉了最后一颗钉子。

会议上，大家都觉得这很有说服力，其实这与战列舰的火炮没有丝毫关系。可是，它在表面上却令人信服。结果，设计得到肯定，他的意见被否决了。

伊萨科夫垂头丧气地走到一边坐在椅子上，他的思想跑得远远地开了小差。

突然间，意外降临的一片寂静使他清醒过来。伊萨科夫抬起目光，只见斯大林站在他的面前。

“为什么伊萨科夫同志这样闷闷不乐呀？啊？”

会场上更加寂静。

“有意思，”他又说一遍——“为什么伊萨科夫同志这样闷闷不乐呢？”

伊萨科夫赶忙站起来说：

“斯大林同志，我刚才说了我的观点，它没有被接受，但我仍旧认为我的观点是对的。”

“是这样，”斯大林说着，走到发言桌旁，“就是说，我们基本上肯定设计了？”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肯定设计。



斯大林说：

“不过我们要加进一点补充：‘增装 4 门同样口径的高射炮’。这样您该满意了吧，伊萨科夫同志？”

伊萨科夫在心里并不完全满意。但他也知道，这是能指望得到的最大限度了，于是他回答说：

“是的，当然满意。谢谢，斯大林同志。”

“这就是说，我们就这样写上吧。”

他结束了会议。

十五 催人振奋的力量

1941 年 7 月 3 日，是希特勒法西斯德国以空前规模的“闪电战”突然入侵苏联后的第 12 天，斯大林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演讲，是反对法西斯德国侵略战争的总动员，没有华丽的词藻，而是呼唤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保卫祖国的顽强斗志。他以朋友和领导的姿态讲话，这讲话给了人民所期待的信念，他所散发来的信心和力量，驱散了人们的疑虑和恐慌。在收听广播的苏联人中，特别是在武装部队中产生了“巨大的热情和振奋的力量”。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我的朋友们，我在向你们讲话！”



这是他的开头语,与通常讲话的方式截然不同,一下子把听众和他团结在一起了。接着,他用体切人民心情和对敌人无比愤怒的强烈感情,描述了他们所处的困境,把真相告诉人民。一字一句都迸发出他要争取胜利的不可动摇的决心,给人以极大的振奋和力量。他说:

“希特勒德国从6月22日起开始向我们祖国发起的背信弃义的军事进攻,正在继续着。虽然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敌人的精锐师团和他们的精锐空军部队已被击溃,被埋葬在战场上,但是敌人又往前线调来了生力军,继续向前闯进。……我们的祖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他针对人们思想上的疑虑说:“苏联政府决不会同希特勒这样一些背信弃义的人和恶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他们发动的突然袭击占了优势,但他们所占的便宜不会太久。他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自己是血腥的侵略者。”

斯大林用简洁的语言使人民深切地认识到战争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敌人是残酷无情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侵占我们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土地,掠夺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粮食和石油;他们的目的是恢复地主政权,恢复沙皇制度……(把苏联各族人民)德意志化,把我们变成德国王公贵族的奴隶。”

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全国人民,他们正在同一个疯狂的敌人进行着殊死搏斗,必须勇敢地毫不留情地打击侵略者,必须消除后方的混乱和恐慌。“当红军部队不得不撤退时,必须运走全部铁路机车车辆,不给敌人留下一部机车、一节车厢,不给敌人留下一公斤粮食、一公升燃料。集体农庄庄员应当把所有的牲畜赶走,把粮食交给国家保管,以便运到后方。凡是不能运走的一



切贵重物资,其中包括有色金属、粮食和燃料等,都应当绝对销毁……在敌占区,必须建立骑兵和步兵游击队,建立破坏小组,以便向敌军部队斗争,以便遍地燃起游击战争的烽火,以便炸毁桥梁、道路,破坏电话和电报通讯设施,焚毁森林、仓库和辎重。在沦陷区,要造成使敌人及其所有走狗无法安身的条件,步步追击他们、消灭他们,破坏他们的一切活动。”斯大林的广播讲话,成为动员苏联人民粉碎法西斯侵略的战斗纲领,从前线到后方,从敌后到战场,举国上下全力以赴,英勇地投入了战斗。

为了粉碎希特勒德国大规模地、疯狂地迅速入侵,苏维埃国家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采取了非常措施。7月4日国防委员会发布命令,其中之一是把工业特别是把包括1360多个主要的军工厂向东部地区转移。在短期内拆卸和迁移这些规模庞大的工业设备,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和伟大的英雄业绩。到了1942年夏季,这些军工厂就迅速恢复了生产,为保证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0月,莫斯科已经处在德军从西北面、南面和北面三个方向的包围之中,通向莫斯科的所有重要方向都在激烈战斗!敌机的狂轰滥炸也日甚一日。莫斯科西面接近敌军的激烈战斗正在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13日国防委员会命令莫斯科地区所有苏军采取攻势防御措施,削弱和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准备时机给德军以歼灭性打击。命令机关人员向东部地区疏散,大规模的大型工业企业的疏散也在继续进行。

斯大林用行动向人民显示了他决胜的意志。他始终坚守在激烈会战中的莫斯科,鼓舞、指挥着全国的战斗。



大规模的疏散和对于德军即将占领的恐慌引起了混乱，而关于斯大林和政治局已撤离莫斯科的谣言则使恐慌和混乱加剧了。10月7日，莫斯科向全国广播了斯大林本人就是莫斯科，并声明决不会放弃莫斯科。19日宣布莫斯科进入戒严状态，号召不惜一切保卫莫斯科。

“斯大林就在莫斯科！”这消息像激越嘹亮的号角传遍了全国，激起了全国和莫斯科军民“誓死与德寇决一死战”的斗志。混乱秩序迅速地得到了恢复。

为了进一步动员和鼓舞士气，11月6日，在敌军兵临城下，炮声隆隆的日子里，首都人民在莫斯科地下铁道的马雅可夫斯基车站，举行了十月革命24周年的特殊庆祝活动。斯大林接见了代表，并作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的演讲。他说，他对红军的力量和苏联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充满信心。但红军目前还缺乏坦克和飞机，他号召大量增加武器，特别是重型武器的生产。

他宣布，英国和美国已表示支持，但他们还不是真正的朋友。“红军受挫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欧洲没有反对法西斯的第二战场”。他说，“问题在于，现在欧洲大陆上没有任何一支同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的英国或美国的军队，因此德国人不必分散自己的力量，不必在东西两个战场上作战……现在情况是这样：我们是在没有任何军事外援的情况下，单独地进行解放战争，反对德国人、芬兰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的联合进攻力量。”

他愤怒地谴责德国法西斯侵略的狂妄自大和对战俘的惨无人道，激励和宣扬全国同胞的爱国精神，唤起人民同仇敌忾的斗



志,呼吁人民仇恨侵略者并坚决消灭他们。他说:

“这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充满兽性的人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好吧,既然德国人想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侵入我们祖国领土的所有德国人——占领者一个不剩地歼灭掉。对德国侵略者决不留情!消灭德国侵略者。”

第二天上午,雪花飘飘,雾气茫茫。尽管莫斯科近郊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敌人的飞机日夜不停地空袭,但斯大林依然威风凛凛地在红场上举行了庆祝十月革命 24 周年的盛大阅兵式,并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数十万红军战士,迈着坚定的步伐,雄赳赳通过红场,接受检阅,然后直接开赴前线,投入了保卫莫斯科的战斗。来自莫斯科西面隆隆的炮声不绝于耳,使他的讲话更具有真实的、刻不容缓的意义。

在保卫莫斯科的战斗中,苏联军民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筑起了铜墙铁壁,痛击来犯之敌。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1月16日,潘菲洛夫近卫师的 28 名战士,在指导员克洛契科夫的率领下,在杜博谢科沃车站附近,阻击德军向莫斯科进攻。连续击退了德军 50 多辆坦克的多次进攻。在众寡悬殊的激战中一直坚守着阵地。当增援部队赶到时,他们已经全部壮烈牺牲。在持续 4 个多小时的战斗中,这个战斗组击毁了敌人 18 辆坦克,击毙德军数十人,指导员鼓励战士们说:“苏联虽大,但已没有地方可退,后面就是莫斯科!”他带领剩下的战士顽强战斗,宁死也不让敌人通过公路。最后,他们弹尽粮绝,指导员拿了一捆手榴弹,向德军坦克猛扑过去,把德军的一辆坦克炸



毁,尽到了保卫首都的光荣职责。

到 12 月 5 日,在苏军同仇敌忾、奋勇打击下,德国法西斯企图南、北两翼包围,正面突破占领莫斯科的计划破产了。德军环绕莫斯科周围 300 多公里的半圆形攻势被全线阻止,共损失官兵 15.5 万人,坦克 777 辆,大炮迫击炮数百门。敌第四军团司令部参谋长后来回忆说:“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了……我们想在 1941 年打败俄国的希望,已在最后一分钟化成泡影了。”

1941 年 12 月 6 日凌晨,苏军西方方面军的部队在朱可夫指挥下从莫斯科南、北两面转入反攻。德国法西斯军队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撤退。到 1942 年 1 月底,共歼灭德军 50 多万人和大量机械化师团,并把德军赶到莫斯科以西 150—300 公里的地带。

莫斯科会战的胜利,是苏联卫国战争第一年中最重要的事件。它粉碎了希特勒的“闪电战”战略,鼓舞了苏联和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斗志。

苏联军民民族感情的振奋和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坚定决心,和他们对斯大林的真心敬意是分不开的,斯大林就是他们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的力量所在。

十六 一次不寻常的会见

1941 年 7、8 月间,德国军队的进攻来势凶猛,似乎不可阻挡。“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斯大林发出“一切为了前线!一



切为了胜利”的战斗号召。苏联人民投入了奋不顾身的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

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特别关心苏德战场局势的前途。他们的思考不约而同，都集中在苏联人能不能顶住德国军队的进攻，他们正在奋力挽救自己免于失败和崩溃的努力究竟能维持多久？对于这个问题，英国和美国军方的看法很不一致。总的来说，是少数人持乐观态度，多数人认为苏联的抵抗很快就会被粉碎。

为了掌握真实情况，以便形成自己的看法，采取重大决策，罗斯福在这关键时刻，派出了霍普金斯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于1941年7月31日到达莫斯科。

霍普金斯是罗斯福总统最亲密的特别顾问，是个非常出色的人物。他虽然体弱多病，但精力充沛，头脑清醒，全心全意致力于反法西斯的事业。斯大林得知霍普金斯到来十分高兴，他热情地会见了霍普金斯，并对他表示真诚的欢迎。接着，斯大林开诚布公，就苏德战场的形势对霍普金斯进行了说明，他说他对于苏联一定能顶住德军的猛烈进攻深信不疑，充满信心。他希望英国和美国能尽快在欧洲西部向希特勒法西斯发动攻势，使侵略者两面作战，难以应付，这样就可以战胜他们。他向霍普金斯展示了一幅乐观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画卷。对于霍普金斯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斯大林都从容不迫、见解深刻、毫不含糊地给予了回答。他也清晰、简明、直截了当地向霍普金斯提问他所关注的问题，霍普金斯也都作了满意的回答。这样就很快消除了霍普金斯的疑虑。

在整个会见中，斯大林没有作任何闲聊，没有一句多余的



话,没有一个不必要的动作或举止。他很有幽默感,见解深刻,常常笑出声来,有时笑声又瞬息即逝。斯大林以无畏的气概和必胜的信念预言,莫斯科、列宁格勒各条战线都会稳定下来;尽管目前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坚信,反法西斯的人民必胜,希特勒必败。

会见结束了。斯大林站起身和霍普金斯握手道别。目送他离去。

这次会见给霍普金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这位精明的风云人物久久不能忘怀。他后来回忆这次会见时说:

“他很快地说几句俄语欢迎我。他暂短有力和彬彬有礼地握了握我的手。他热情的微笑,他并不向你讨好,他似乎从不怀疑。他对于俄国一定能顶得住德军的猛烈攻击深信不疑,他也认为你和他一样深信不疑。”他站在那里看着我离开,谁也不会忘记他这时的形象——严肃朴实、饱经风霜、意志坚定……”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意义深远的会见。斯大林以临危不惧的气概和要把反侵略战争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极大的感染和鼓舞了这位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使他在后来苏美反法西斯的战争协调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十七 改变自己的主张

1941年7月10日,德国侵略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先头部队,



已经到达距离莫斯科 370 公里的斯摩棱斯克。同日，斯大林建立了莫斯科西方战区，它包括西方方面军，预备方面军和莫斯科方面军，由国防人民委员兼西方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元帅指挥。

德军的意图是，用强大的坦克集团军群突击、分割苏联西方方面军，将其主力合围于斯摩棱斯克地区，然后直取莫斯科。莫斯科西方战区接到的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是，一定要阻截德军坦克的前进，迅速集结兵力，坚决顶住德军的攻势。因为，斯摩棱斯克是德军进攻莫斯科的咽喉所在，一旦陷入敌手，德军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就会畅通无阻。

敌军出动了第二、第三坦克集团军和第二、第九集团军，共 29 个师的兵力，向斯摩棱斯克地区苏军防守阵地发起了强大攻势。

苏军浴血奋战，进行了异常激烈和顽强地抵抗，但由于敌人在兵力、大炮和飞机数量上，特别是坦克的数量上都占了优势，因而阻截不住。

这样，在斯摩棱斯克西北方向上，敌第三坦克集团军前进了 150 公里，占领了 5 座城市，并紧紧地围住了苏军第十六、第十九和第二十集团军的阵地。在西南方向上，敌第二坦克集团军前进了 200 公里，占领了 4 座城市。在斯摩棱斯克市区，苏联守卫部队更是打得艰苦卓绝。守卫部队和城内青壮年一起，英勇地保卫着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幢房屋。但也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于 7 月 16 日夜间，德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

7 月底，斯摩棱斯克地区的战局更加恶化了。

斯大林被失败和迅速呈现出来的不利战局激怒了，下决心



要从撤换前线指挥员入手扭转局势。于是命令朱可夫和铁木辛哥立即到他在莫斯科的办公室。

朱可夫和铁木辛哥以为是要商量战局的,但他们却看见在办公室里,坐着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斯大林穿着一件旧上衣,站在屋子中央,手里拿着点燃的烟斗。

“是这样的,”斯大林说,“政治局讨论了铁木辛哥作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的工作,决定解除他的职务。有人提议,由朱可夫担任这一职务。你们有什么意见?”他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们两人。

铁木辛哥没有说话。朱可夫作了回答。

他首先指出,频繁更换方面军司令员会有不良影响。他说,铁木辛哥担任这一职务还不到4个星期。在保卫斯摩棱斯克的战役中,他熟悉了部队,做了处在他这个地位所能做到的一切,使敌人被阻止在这个地区将近一个月。任何一个人在他所处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而且部队信任铁木辛哥元帅,这是重要的一条。他认为,这个时候撤换铁木辛哥是个不公平的,也是不适当的。

“我倒认为他的意见是对的。”加里宁说。

斯大林点着了烟斗,看了看其他的政治局委员。

“我们同意朱可夫的意见好不好?”他问。

“你说得对,斯大林同志。”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铁木辛哥还能挽救局势。”

就这样,斯大林改变了原定的主张。

铁木辛哥又被派到莫斯科西方方面军,去指挥部队同敌人作战。



斯大林就是这样,每当他意识到作汇报或提建议人熟悉自己所谈的情况时,他总是倾听这些意见,包括与他不同的意见。只要这些意见是有根据的,而且提得清晰、有道理,他总愿意重新考虑自己的意见,总是愿意改变自己的主张。但最后的决定总是由他作出。

十八 有趣的谈话

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 1941 年冬季战役结束后,战场上双方的战线犬牙交错,敌我阵地互有楔入,突出地段最深处达几十公里。双方经过积极准备,于 1942 年 5 月相继展开军事行动,为各自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攻势准备条件。

5 月 12 日,斯大林命令苏军率先转入进攻,一开始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在三昼夜内将战线向前推进了 25 到 50 公里。紧接着,德军第十一集团军对克里米亚东部刻赤半岛上的苏军发起猛烈进攻。由于高级指挥员的原因而缺乏防御准备,致使德军 5 月 16 日占领刻赤(直到 1944 年的 5 月 12 日才收复)。曾在兵力上占有很大优势的苏联克里米亚方面军蒙受了重大失败。这是一次壮烈的失败。斯大林读着战报非常愤怒。

此前,在 3 月份,斯大林派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去协助克里米亚方面军司令员科兹洛夫。但他们没有很好地负起责任,指挥不当。不是亲自接触各集团军司令员,亲自掌握战役进



程,而是在军委会长时间毫无结果的会议中消磨时光。斯大林在给科兹洛夫中将的命令中明确指示:“指挥方面军的是您,不是梅赫利斯。他应协助您,如若不然,您应向我报告……”可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却反其道而行,导致了苏军的重大损失。斯大林下令解除了梅赫利斯国防副人民委员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降为军级政委;解除了陆军中将科兹洛夫方面军司令员和其他一些军官的指挥职务,降级使用。

在莫斯科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斯大林与刚从集团军司令员提升为方面军司令员的罗科索夫斯基的谈话快结束了,罗科索夫斯基已经准备告辞。这时,秘书进来报告说,科兹洛夫来了,他正等着接见。斯大林本打算同罗科索夫斯基告别,但突然又把他留下。他说:

“您稍等一会儿,现在我要同一个人谈话,您可能也会感兴趣的。待一会儿吧。”

他转身对秘书说,让科兹洛夫进来。

科兹洛夫进来了,虽然这是刻赤半岛惨败后不久的事,但他对一切都还记忆犹新。斯大林非常平静地迎接了他,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愤怒和厌恶的样子。握手问候之后,斯大林说:

“您说吧。您要见我,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科兹洛夫开始说,他认为免除他的职务是不公正的,他说他为控制局势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使出了全部的力量。这一切他都是用非常激昂地、歇斯底里的语调说出的。

斯大林平静地听完了他的话,没有打断他。听了很久,然后问道:

“您说完了?”



“是的。”

“您看，您本想做到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是，您没有能够做到应该做的事情。”

为了回答这句心平气和的话，科兹洛夫说起了梅赫利斯。他说梅赫利斯不让他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干预他的工作，对他施加压力，由于梅赫利斯的缘故，他不能够按他的意思指挥。

斯大林平静地打断他，问道：

“请等一等，科兹洛夫同志！请问，你们谁是方面军司令员，是您还是梅赫利斯？”

“是我。”

“就是说，是您指挥方面军。”

“是的。”

“您的命令在前线是不是都必须执行？”

“是的。不过……”

“您身为司令员是不是要为战役的进程负责？”

“是的。不过……”

“您先等等。梅赫利斯不是方面军司令员吧？”

“不是……”

“就是说，您是方面军司令员，梅赫利斯不是方面军司令员？就是说，您应当指挥，而不是梅赫利斯，是吧？”

“是的。不过……”

“请等一等。您是方面军司令员吗？”

“我是，但是他不让我指挥。”

“为什么您当时不打电话、不报告呢？”

“我想打电话，但是不能够。”



“为什么？”

“梅赫利斯老跟我一块，我没法背着 he 打电话。若打电话就只好当着他的面。”

“很好。为什么您不能当着他的面打电话呢？”

科兹洛夫默然不语。

“如果您认为您对，他不对，为什么不能当着他的面打电话呢？科兹洛夫同志，看来您怕梅赫利斯比怕德国人还厉害？”

“斯大林同志，您不了解梅赫利斯，”科兹洛夫大声喊起来。

“科兹洛夫同志，这恐怕未必对吧。我是了解梅赫利斯同志的。现在我想问您：为什么您来抱怨？您是方面军司令员，您为方面军的行为负责，这件事要拿您是问。您是为这个才被免职的。我认为对您的处理全都是正确的，科兹洛夫同志。”

科兹洛夫走了之后，他转身向罗科索夫斯基，一面同他告别，一面说道：

“罗科索夫斯基，您瞧这是多么有趣的谈话。”

十九 善于抓住问题的实质

1942年8月，英国首相丘吉尔赴莫斯科首次会见斯大林。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斯大林亲自说明本年度无法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第一次会晤是在8月12日，长达4个小时。一方是斯大



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另一方是丘吉尔、美国总统代表哈里曼和英国驻苏大使。

会晤中,丘吉尔仔细地解释为什么 1943 年之前英美不可能在法国海岸登陆。斯大林认真地耐心地听着,但他不同意丘吉尔的解释。他认为英美是世界上最高度工业化的两个国家,而且都有强大的海军。如果说,俄国的国防工业——仅在不久前才建立,而且大部分自战争开始后就迁移疏散了——尚且能够克服似乎不可克服的困难,造出越来越多的坦克和武器,那么英美这两个工业大国当然能够生产出在法国海岸登陆所需的东西。斯大林相信,只要他们诚心出力,是能够做到的。英国人是在推诿,是想让俄国人孤军浴血奋战,等待德国人在东部战场削弱以后才采取行动。他愤怒地问丘吉尔,为什么英国人如此害怕德国人。“战争是要流血的,希特勒之所以没有入侵英国,是因为横跨英吉利海峡风险太大,”丘吉尔说。丘吉尔提出的这种理由是说服不了斯大林的,遭到了斯大林的驳斥。

接着,丘吉尔向斯大林透露了英美正在策划的中海发动一次攻势的细节。这一计划称为“火炬”作战计划,在当时仍是机密。斯大林聚精会神地听着,越听越兴奋。“愿这事业成功!”斯大林情不自禁地说。随即,他提出了一些问题,并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这一行动的重要意义。

斯大林的突出见解使丘吉尔感到震惊。他说,显然,斯大林这位俄国的绝对领导者对于一个以前一无所知的问题,已经迅速全面地抓住了它的要领,“没有几个人能在这样短短几分钟内理解我们几个月来一直反复推敲的那些理由。但他却能在一刹那间理解了这一切。”



在第二天晚上的会晤中,双方就开辟第二战场问题进一步交锋。由斯大林签署的一份很长的备忘录指责同盟国不守信用,没有在 1942 年在法国海岸登陆。斯大林还强调英国军队害怕德国人。这使丘吉尔非常生气,他激烈地为他的同胞辩护。他的话还未来得及翻译,斯大林又说,他喜欢丘吉尔这种回答的精神。整个会晤期间有过不少的激烈舌战,但也有两人之间形成一种热情的同志般情谊的许多迹象。

斯大林在会晤中不断流露出打趣的幽默感。当丘吉尔把“火炬”作战计划告诉他,并强调要对计划绝对保密时,斯大林笑嘻嘻地说,他希望英国报纸上一点消息也不走漏。

斯大林能够善于抓住问题的实质,迅速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引向和谐,并且能在许多不同的意见中间指出正确的道路,从而明确奋斗的目标,唤醒和鼓舞人们要求行动的愿望,这大概是他成为一个举世公认的伟人的重要条件之一吧。

二十信任

XYZSTAR.COM
校园之星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1942 年的 7 月到 11 月,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苏德战场敌我力量对比的态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斯大林格勒战区双方对峙的形势是:法西斯军队 100 万人,大炮和迫击炮 10290 门,坦克 675 辆,飞机 1216 架。而苏军已有三个方面军,共 110 万人,15500 门大炮和迫击炮,1463



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350架作战飞机。无论兵力兵器，苏军都占有明显的优势。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大反攻条件成熟了。他亲自批准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制定的大反攻战役计划。这个计划预定的大反攻时间是1942年11月19日早晨。

11月中旬，各作战部队全部隐蔽地到达指定位置并完成了大反攻的一切准备。

一场风吼雷鸣、歼敌雪耻的大搏杀就在眼前。

11月17日，傍晚。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刚从前线部队回到指挥所，突然，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来了电话。斯大林要他。

“您好。有件急事找您。你必须到莫斯科来。”

“怎么能去莫斯科，斯大林同志？后天就开始进攻了，我不能离开！”

他是这次负责协调三个方面军反攻的战区指挥。大战在即，听到斯大林要他此时离开，心里着了急。

“这种事需要你到莫斯科来。你来得及赶回前线的。需要同你商量一下……”

华西列夫斯基想再解释说他此时不能离开，但斯大林也再次强调说需要他回到莫斯科。

他只好服从命令。于第二天早上乘飞机，上午11时左右到了莫斯科。

华西列夫斯基才思过人、反应敏捷是有名的。他是在斯大林和各个方面军司令员之间起桥梁作用的高级将领之一，他对待一些复杂问题往往不用特别费劲，有时甚至不必采取紧急措



施就能达到预期的或良好的效果，一直很受斯大林的信赖。但这一次例外。他对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如此紧急地要他回莫斯科竟是毫无所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国防委员会正在开会，在座的有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等。斯大林向华西列夫斯基问了好，让他坐下。然后走到自己的办公桌旁，他拿起一封信，坐到桌后，把信从桌面上推给华西列夫斯基。

“你先看一看吧，我们在这儿继续‘打自己的内战’……”

他和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们继续讨论问题。

华西列夫斯基取出信，不看则已，一看大吃一惊。

是第四坦克军军长沃尔斯基将军写给斯大林的亲笔信。沃尔斯基曾指挥骑兵第三十七团英勇作战，是一位出名的和受人尊敬的指挥官。他正在指挥的是一个装备精良、拥有使法西斯侵略者胆寒的 T—34 型新式坦克的训练有素的混成坦克军，是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区攻击敌人的主要突击力量。华西列夫斯基因此也特别重视这个军，特别频繁地去检查他的训练和准备工作，并多次和给他印象良好的沃尔斯基谈话。他昨天就是同这个沃尔斯基分手，从他的第四坦克军回到方面军指挥所后接到斯大林打来的电话。

这封信的大致内容是：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告诉您，我不相信即将开始的进攻会取得胜利，我们的兵力和战争手段不足。我确信我们无力突破德国人的防线，完成我们面临的任務。整个战役可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而这种失败则将引起无穷后果，给我们带来损失，给全国的形势带来不良影响。这以后，德国人将不



仅会推进到伏尔加河,甚至会跨过伏尔加河……

签名:沃尔斯基。

读着这封信,华西列夫斯基的心在震颤,同时他又大惑不解。他迅速而仔细地回忆沃尔斯基的举止行为以及情绪,他的部队的士气,没有,绝对没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人相信这封信会是他写的。

华西列夫斯基把信缓缓地装进信封里。等了几分钟,他终于弄明白了斯大林为什么紧急要他来莫斯科面谈。

这时,斯大林从会议桌旁走过来问道:

“怎么样,你对这封信怎么看。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这封信使他非常吃惊。

“你对这封信的作者评价怎样?”

华西列夫斯基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认为沃尔斯基是个优秀的军长,有能力完成交给他的任务。”他还坚定地说,“这次攻势计划周密,应当发动。”

“现在呢,读了这封信之后呢?”斯大林又问,“你认为还能让他当军长吗?”

华西列夫斯基考虑了几分钟,然后说:

“我个人认为在进攻的前夕撤换军长是不能同意的,正确的做法是让沃尔斯基继续当军长。不过,当然得同他谈一谈。”

“您能给我接通沃尔斯基的电话吗?”斯大林问道。“我同他谈谈。”他说。

华西列夫斯基通过高频电话接通了方面军指挥所,命令他们找到沃尔斯基军长,要他同莫斯科讲话。

过了一会儿,电话接通了。



斯大林拿起了听筒。

“您好，沃尔斯基。您的信我读了。我没有把它给任何人看，谁也不知道。我认为您对我们以及您自己的条件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我相信您能胜任得了交给您的任务，相信您会尽全力使您的坦克军完成所有的任务并取得胜利。您愿意……完成您面临的任务吗？”

显然，沃尔斯基的回答是愿意。

斯大林于是说：

“我相信您会完成您的任务，沃尔斯基同志，祝您成功。再说一遍，除了我和华西列夫斯基，谁也不知道您写了这封信，我只给华西列夫斯基看过。祝您成功。再见。”

斯大林给沃尔斯基打电话，“使在场的人都感到惊奇”。他没有解除他的职务，也没有训斥他的信心不足，而是以和气的口吻消除他的疑虑，信任和鼓舞他。

接着，斯大林告诉华西列夫斯基，不必把此事放在心上。并补充说，“有关沃尔斯基的最后决定，将根据他在今后几天的表现来作出”。然后对华西列夫斯基说，“您可以回到前线去了。”

斯大林格勒的大反攻开始了。

19日晨，在斯大林格勒西北方向，苏军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以威武雄壮的强大坦克集团军为先导，在数千门大炮和成千架飞机的掩护下，兵分两路，首先向罗马尼亚及第三集团军的阵地猛烈冲击。20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西南也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沃尔斯基的第四坦克军在他的坚决果断指挥下，勇猛无敌，进展顺利，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华西列夫斯基在前线用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了大反攻战役的



进展情况，斯大林向他询问沃尔斯基和他的坦克军打得怎样。华西列夫斯基据实报告说，第四坦克军和它的军长表现得很出色。

“这样吧，华西列夫斯基同志，”斯大林说，“既然如此，那我请您在那儿，在前线，暂时随便找个什么礼物，立刻以我的名义奖给他。请向他转达我的感谢，以我的名义奖赏他，对他以及对其他人的另外奖赏将来再说。”

华西列夫斯基放下电话。他想，用什么东西奖赏沃尔斯基呢？忽然想到了自己有一支缴获的德国瓦尔特手枪。于是吩咐下面的人给手枪配个小木牌，上面写上相应的题词。华西列夫斯基向沃尔斯基祝贺了他的胜利，感谢他的战绩。他转达了斯大林的话，并以斯大林的名义把手枪奖给了他。沃尔斯基与华西列夫斯基相视而立，“他激动得如此厉害，”以致当着华西列夫斯基的面像孩子那样大哭起来。他后来被任命为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的司令员。

在激烈的残酷战争中，人们强烈的责任感和恐惧往往会十分尖锐地遇到一起，产生了把一切都“押”上去之后，突然实现不了国家所期待的胜利的担心：我们的设想能实现吗？战前的紧张、激动——这是战争中的人经常发生的事。对还没有打过一次胜利的进攻战的人，这种感觉特别强烈。而曾经参加过莫斯科会战，进攻过并赶走过德国人的高级将领和指挥员，在这次战役开始前信心就比较足。

看来，因在斯大林格勒大反攻这样的大战前夕过度紧张而突然对胜利丧失信心，就是促使沃尔斯基给斯大林写这封信的原因了。



二十一 “见鬼，调去吧！”

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在苏德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的身份在前线激烈战役指挥中执行斯大林的直接指示，小部分时间在莫斯科的总参谋部直接处理工作事务。他的这种工作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独特的工作作风。

通常，斯大林在进行最重要的战役准备工作或前线出现危急情况时，就一定不是派朱可夫、就是派华西列夫斯基前往。有时候，比如保卫斯大林格勒的重要战役，就把他们两人都派去。华西列夫斯基既具有司令员的才干，又具有参谋长的素养，是一位全面的统帅和将领。他使斯大林感到，不论在防御战斗的危急形势下，还是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时；也不论在制定战略计划和担任大本营的代表或是任方面军司令员时，他都同样能够充满信心地进行工作。

有一次，斯大林问华西列夫斯基：

“您是否从教会教育中学到一点东西？您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华西列夫斯基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一时摸不着头脑。但他很快地找到了办法，并明智地回答斯大林：

“没有用处的知识是没有的……知识在军事生涯中总是用



得着的……”

斯大林非常好奇地看看华西列夫斯基。接着话题一转说，“你应当把……方面军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过去，他总把类似大量部队的指挥和监督权交给朱可夫。

斯大林的谈话以及对战略战役问题的处置方式是多样的，而且始终是实际的和有效的。但有时十分有效和正确的意见或指示，其表现的方式却叫人难堪。

1942年8月23日，斯大林格勒遭到敌人的猛烈进攻和空中轰炸，形势十分危急，斯大林当即派华西列夫斯基前往督战。

遭到德国燃烧弹和重炮攻击的整个斯大林格勒一片火海，方面军与莫斯科的通讯联络已经中断。直到24日夜间才得以恢复。27日，局势越来越严重。斯大林又紧急从西线战场召回朱可夫，任命他为最高统帅部副最高统帅前往斯大林格勒。他每天得到朱可夫和前线其他司令员的报告，密切注视着斯大林格勒的战况，批准调集增援部队，命令进行反击。

9月12日，他把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召回莫斯科大本营讨论局势。朱可夫报告了敌人阵地上的力量，华西列夫斯基谈了德军从其它战区增调新的精锐部队到达斯大林格勒战区的情况。

“为了能粉碎敌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需要些什么？”斯大林问。

“至少要增加1个满员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1个坦克军，3个坦克旅；至少还要400门榴弹炮。此外，在采取行动时，还需要再集中不少于1个集团军的空军部队。”朱可夫回答说，华西列夫斯基同意他的估计。



斯大林仔细地倾听着。他尊重这两个人的意见，拿出了标明统帅部战略预备部队位置的地图，默默地研究着。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从桌旁走开，两人轻声地交换意见，认为他们自己得“另找解决办法”。

“还有什么解决办法？”斯大林突然问，从地图上抬起头来。

朱可夫吃了一惊，不知道斯大林的耳朵这么尖。他们回到桌子旁，扼要地谈了大规模的作战计划。斯大林听后让他们回总参谋部制定一个计划，第二天晚上9点向他汇报。

朱可夫说，这次大反攻称作“天王星”作战计划。计划由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在北，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南，两支主力装甲部队向前，形成钳形攻势实施突击。华西列夫斯基也同意。

这样，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乘飞机在斯大林格勒——顿河地区与莫斯科之间来来去去，同斯大林磋商，向有关司令员吹风，而斯大林由于看到了德国空军的威力，所以他亲自掌握空军的编组和后备力量，对于斯大林格勒苏军攻势中的空中支援给予了最高度的重视。短短的几个月里，苏军在斯大林格勒——顿河地区集中了100万军队，13500门大炮和迫击炮，300多组火箭炮，1100架飞机。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任务是协调各方面军的进攻。但11月17日，斯大林又派朱可夫去准备指挥由两个方面军在北面担负的支援攻势，其目的是阻止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去增援在斯大林格勒的保罗斯和在南面的德国陆军元帅曼施泰因。

19、20两日，按预定作战计划，苏军从北面和南面向德军发动了攻势，23日完成了对德军保罗斯的第六集团军和第四装甲集团军一个军的合围。



德国军队受到了挫折。于是在南面重新加紧组织他们的力量,建立了顿河集团军群,由曼施泰因指挥,以巧妙的战术一直打到了接近保罗斯防线 40 公里的地方。

华西列夫斯基的压力骤然而至。

必须阻止曼施泰因与保罗斯的会合。他们一旦会合,不仅使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包围圈崩溃,歼灭保罗斯军团于包围圈内的计划破灭,还会给整个军事行动留下无穷的后患。因为仅城下就围着敌军 30 万人。

眼看再过一昼夜,最多两昼夜,这两股凶恶的敌人就要会合了。可是,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现有的力量,要阻止和反击曼施泰因的进攻显然有很大困难。华西列夫斯基火速赶到西南方面军指挥所向斯大林打电话,请求速调第二近卫集团军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这个集团军的原定任务是用来加强罗斯托夫方向进攻,以阻止、切断德军高加索军团与被围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德军的联系的。但在火烧眉毛的危急形势下,华西列夫斯基却不得不坚持请求斯大林把这个集团军调到斯大林格勒战线。

斯大林坚决不愿改变原定计划。但在华西列夫斯基不妥协的固执地请求下,他答应说考虑考虑,然后给予答复。华西列夫斯基等不及了。他不惜个人承担风险,向第二近卫集团军司令员下达了命令,要他立即派部队开进新的作战地区并在那儿反击曼施泰因;命令他迅速解决通讯联络问题,以便进行对后续部队的指挥。

发出这个命令时已是深夜,可斯大林还没有答复。

原来,斯大林这天夜里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讨论华西列夫斯基的请求时,出现了各种意见,争论太久。



华西列夫斯基不安地在西南方面军指挥部里来回踱步，等待着最高统帅的答复，因为他实际上已经调动了第二近卫集团军。

凌晨 5 点，斯大林终于打来电话，他狠狠地、恼怒地总共说了五个字：

“见鬼，调去吧！”说完就放下了听筒。

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由于有了及时的精锐生力军的增援，苏军一直把曼施泰因向东南赶了将近 100 公里。曼施泰因企图为城下解围的努力化成了泡影，只好集中力量去守罗斯托夫地区一带的防线，以便使高加索和库班的德军部队能够撤退。到了 12 月，斯大林格勒战场上，苏军就完全实现了对德军“钳形攻势”的包围。

二十二 我的儿子决不会给苏维埃祖国丢脸！

斯大林的一生充满着坎坷。他结过两次婚，共有 3 个孩子。长子雅可夫·朱加施维里是前妻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所生。由于母亲早逝，他由慈爱的祖母和外祖母养大。他的第二个妻子阿利卢耶娃非常年轻，她中学毕业，后来入了党。曾任列宁的值班秘书，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过。她生了一儿一女，儿子瓦西里生于 1920 年。女儿斯维特兰娜生于 1926 年。

雅可夫长大后来到了莫斯科，同他的继母和两个弟妹住在一



起。继母非常同情并爱护雅可夫。和两个弟妹一样，由于父亲忙于工作，他们不能经常见到他，只是在偶尔星期天例外。但父亲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雅可夫得到父亲的同意，上完莫斯科的铁路运输工程学院，就在斯大林工厂发电站工作。后来他希望成为一名军人，为祖国立功。这样，经过他的努力，他又进了工农红军炮兵学院学习。

斯大林对儿子要求十分严格，除了要求他功课优秀，体格健壮以外，还要求他具有坚强的性格和不被困难压倒的勇气。他终于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以优异的成绩从炮兵学院毕业，被任命为上尉军官，并加入了共产党。他在学校刻苦学习和训练，决不给父亲丢脸，是个正派、诚实的学员。

1941年6月23日，雅可夫作为第十四榴弹炮团的一名上尉，和他的部队一起开赴白俄罗斯反击希特勒法西斯侵略、保卫苏维埃祖国的前线作战。他作战勇敢，在7月15日的战斗中，他所在部队受到德国军队第三坦克集团军的猛烈攻击并陷入了重重包围。他和战友们一起紧握着冲锋枪在炮弹的呼啸、爆炸声中呐喊着向敌人冲击。不幸有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被炮弹爆炸的气浪掀起好几米远摔倒在地，失去了知觉，被德国军队俘获。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知道了他是斯大林的儿子，多次对他严刑逼供，进行审讯。但他坚信自己的同胞们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一定能够战胜法西斯而坚强不屈。

尽管敌人不断施展阴谋诡计，甚至把审讯的人不断变换升级，由团长一直换到元帅，他始终毫不动摇，决不向侵略者屈服。

希特勒这个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不得不亲自出马，他直接



下令把雅可夫关进死亡的集中营,并哄骗他说,只要写一封信或发表一个声明投降他们,或者表示不再反抗德国的侵略,就可以给他一条出路。但雅可夫决不让敌人的诡计得逞,他坚贞不屈,宁死不从。

战争结束后,在德国人的档案材料中发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上面是一群希特勒的军官围着雅可夫·朱加施维里上尉,他们带着毫不掩饰的好奇心打量着这位斯大林的儿子。而雅可夫则紧握着双拳,充满仇恨地瞪着他们。

法西斯企图用雅可夫的被俘来达到宣传的目的,他们把印有雅可夫照片的传单到处散发,但当时苏联人却认为这是他们的敌人故意伪造的。

雅可夫在敌人的集中营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不论敌人用什么残酷、卑鄙的手段,严刑拷打、心理或药物手段,他决不能背叛自己的祖国。如果让父亲和祖国人民看到他成为叛徒,这比死还要可怕。他熬过了3个集中营对他的百般折磨。他不能让父亲和祖国人民失望。

1943年1月31日,英勇的苏联红军在战场上俘虏了德国军队的元帅保罗斯。希特勒放出风声,想以雅可夫换回保罗斯。但为了祖国利益和尊严,尽管当时年已64岁的斯大林十分关心自己儿子的生命,却毅然拒绝交换战俘。他铿锵有力地说:“我相信我的儿子决不会给苏维埃祖国丢脸!”

法西斯们恼羞成怒,他们决定用最严酷的办法处死雅可夫,还准备好了要把全部过程拍摄下来,对斯大林进行“报复”。法西斯的本性决定了他们的残忍。1943年4月14日,法西斯的反动头目在集中营里拉起了电网,并在近处放好了桌子,准备了



刑具,桌子上架着摄像机。接着他们把折磨得遍体鳞伤的雅可夫带到了行刑现场。但他马上就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他不顾一切迅速扑向了带电的铁丝网。惊慌的法西斯匪徒向他连连开枪。就这样,36岁的雅可夫——斯大林的长子牺牲了。

雅可夫没有辜负自己的父亲,没有给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丢脸。

二十三 主持会议

斯大林在军事会议上总是先非常用心地、从容地听取大家的发言,不中断别人的话,也不使人心慌意乱。他大体上按长幼顺序来安排发言,使前面一个人的发言不至于束缚后边的人。只是在最后从大家的发言中理出所有实质性的意见,进行归纳,作出结论。有时在会议开始,还没有完全确定观点时,往往是这样的情形。

他在倾听人们的议论、倾听不同意见时,实际上也在细心地检验着自己的想法并进行核实对照。如果他预先感到在总的方向上问题应当这样解决,而不应当那样解决时,他就召见有关的人,与他们交换意见,集思广益,以便正确解决。但即便是讨论这样的问题时,他也同样从容不迫,不中断、不阻止别人说出另外的观点。有时候,这些不同的观点以某些局部、侧面落入他的思维后,进入他的归纳和制定的决议中。



1943年7月,在苏军即将发动库尔斯克大反攻的前夕,斯大林在他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一次总参谋部、各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司令员会议。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安东诺夫讲解了这次作战计划后,斯大林问了几个问题,对计划表示同意。

这时,指挥近卫第十一集团军的巴格拉米扬想对计划提出点修改意见,因为原计划影响到他在左翼作用的发挥。他在最高统帅面前犹豫不决,欲语又停。大家卷起地图,会议似乎已经结束了。斯大林突然问是否有人还有不同意见。巴格拉米扬立即说他有。斯大林看着他,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

巴格拉米扬紧张得不得了,他竭力控制住自己。

在场的人又都推开了他们的地图。

巴格拉米扬说明了在即将到来的攻势中,他认为他的集团军应起的作用,并对计划提出了自己的修改建议。

接着是沉默。

巴格拉米扬想,他这位集团军司令员的建议可能是无足轻重的,一定会遭到最高统帅、总参谋长和方面军司令员的否决。

斯大林和其他的人对着地图进行了研究。过了一会儿,斯大林向巴格拉米扬说:“您的建议被接受了,只要稍作修改。”

斯大林总能冷静地对待每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会议上,他对自己认为是重大的每一个问题,都能进行全面、透彻地分析,作出稳妥的结论。



二十四 他曾经这样正确“提示”

苏德战场上残酷地厮杀持续到 1943 年，德军开始感到兵力不足了。他们在全国动员，号召参加战争。1 月 30 日，希特勒宣布授予被困在斯大林格勒的保罗斯以“元帅”军衔。这一年的前半年，德军在军事上屡次遭到沉重打击，显得很不得景气。而苏军在顽强防守中的反攻却频频得手，不断取得重大胜利。

10 月的第聂伯河下游，寒风停止了呼啸，皑皑白雪在暖日里发出耀眼的光芒，怪扎人眼的，但却很舒服。就是这个时候，托尔布欣司令员指挥的第四乌克兰方面军和马利诺夫斯基司令员指挥的第三乌克兰方面军出现在这里，悄悄地、迅速地包围了德军重兵占领下的克里木半岛。于是在这一广大区域里，德军所占领的就是第聂伯河下游东岸的一个尼科波尔基地。它的暂时存在，已经对苏军没有太大的威胁了。

指挥这次行动的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和各个方面军司令员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东岸的尼科波尔基地并不构成对苏军的直接威胁。决定对克里木半岛从两翼往纵深楔入进攻，同时迫使这个基地的德军自己撤走。

华西列夫斯基不止一次把这个计划报告斯大林。斯大林却不这样看，他非常担心德国人会在那个基地集结兵力，由那里突然杀出来向东南进攻，从而切断第四乌克兰军的海路。他要求



华西列夫斯基无论如何要从德国人手里夺回这个基地。但在几次夺取这个基地的进攻中苏军都遭到损失而毫无成效。之后，斯大林问华西列夫斯基对即将开始的进攻有什么打算，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呈报说：现有的兵力不太够，特别是在几次进攻遭到损失后，所以要求大大增加兵力和战争手段，并说这是保证进攻所必需的。

这个报告送到大本营后，斯大林打来了电话：

“我是斯大林。是华西列夫斯基吗？”

“是的。请讲吧，斯大林同志。”

“告诉我，华西列夫斯基，我们的总参谋长是谁？”

华西列夫斯基犹豫了一下，回答说，“到今天为止，正式的总参谋长是我。”

斯大林说：

“到现在为止我也这样认为。可是，您既然是总参谋长，为什么要在您写的命令草案里对大本营说那样的胡话呢？总参谋长无权说那样的胡话。您向大本营要这个，要那个，可您自己作为总参谋长应当知道，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无处去讨您所要的东西。”

华西列夫斯基说，“我们所要的东西是进攻所需，我认为，至少其中一部分可以从其它方面军抽调。”

“其它方面军也要进攻，”斯大林回答说，“您作为总参谋长是知道这一点的。却写这样的胡话。”

华西列夫斯基沉默了几秒钟，斯大林也不吭声，后来斯大林说：

“您自己想办法找出路吧。去掠夺托尔布欣。他有一个空



军师,有一个机械化军,后方的第二梯队还有一个集团军。把这些都从他手里拿过来,把他洗劫一空。让第四乌克兰军转入防御,而把这一切交给马利诺夫斯基。您自己不久前就曾提出要解决第聂伯河西岸的问题,那就解决吧。别让两个方面军同时上,而要一个一个地上。先把托尔布欣洗劫一空,让他转入防御,把他所有兵力都交给马利诺夫斯基,让马利诺夫斯基进攻。别拖到春天,现在就进攻;冬天就进攻,愈早愈好。等取得胜利,等马利诺夫斯基向前推进一段之后,又让他转入防御,把他洗劫一空,把所有兵力都交给托尔布欣,全力投入克里木半岛。”

斯大林有时的确是这样。谈话的方式不能令人满意,但他的内容却使你不能不同意。他在很多情况下,都很善于正确而透彻地解决一些战略战术问题,向指挥员们提示最正确的决定,并通过他们实现获得战役胜利的目的。

二十五 斯大林拒穿大元帅服

XYZ STAR COM
校园之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领导苏联军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受到人民的拥戴,他享有苏联唯一的大元帅军衔。但他一直穿的都是同其他元帅一样的元帅服,从未穿大元帅服。为什么呢?这里面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45年6月,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不久的一天,苏军后勤部长赫鲁列夫大将同军衔部长德拉切夫上将来到克里姆林宫。



赫鲁列夫大将先向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进行了汇报,尔后他请求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向在座的领导们展示一下新军服。当时,斯大林的情绪很好,他说:“好吧,正好让总参谋部的同志也看一看。”

等在接待室里的德拉切夫上将身穿崭新的军服兴致勃勃地走了进来,斯大林朝他扫了一眼后,脸色马上阴沉下来。很明显,他已经猜到了这是什么服装。德拉切夫穿的是一身新式的华丽服装,上衣是按库图佐夫时代的服装样式裁制的,衣领高耸;裤子是现代式样的,有金光闪闪的镶条。斯大林猜得没错,这正是后勤部长和军衔部长挖空心思,特意为他制作的大元帅军服。

赫鲁列夫大将还没张口,斯大林就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把他俩打发走了。尔后,当着众多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批评了这种盲目抬高他个人的做法,他说这种做法是极不聪明的,整个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提大元帅服的事情了。

二十六 最高统帅和他的最高统帅部

斯大林和他的最高统帅部在反对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期间(1941年6月22日—1945年5月8日),始终坚守在莫斯科,鼓舞,组织和指挥着整个战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1941年6月22日夜,希特勒德国向苏联发起了蓄谋已久的突然侵略,拉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苏德战争的序幕。

6月30日,苏联建立了斯大林领导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作为战时集中全部国家权力的国防领导机关,全国各人民团体、党的组织以及苏维埃组织和武装力量,都必须服从它的一切决定和命令。

这时,斯大林身兼五职。除担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外,他还担任着党中央总书记、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

为了检查决定和命令的执行情况,国防委员会最高统帅部还在各边区、州和各军事工业人民委员部以及各主要企业和基建工程单位都派有自己的代表。

最高统帅部的日常工作机关是它的总参谋部。它的主要工作是掌握有关战争的各种情报、情况,研究和解决战役、战略问题,具体实现最高统帅部所定下的决心,并从组织上保证其贯彻执行。

最高统帅部的活动与作用,是与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的。

通常,各次战略性战役和战局的意图以及计划,是先由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参战国家潜在的政治力量和军事能力等共同性问题讨论研究之后,再由最高统帅部的有关成员参加,在总参谋部进行准备,最后由委员制和单一首长制负责的最高统帅部作出政治和军事判断,形成决定。当然,最后的决定权在一切情况下都属于最高统帅。

任何一次新的战役在开始准备时,斯大林总是和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一起,对整个战局的战略、战役情况进行仔细的研究。



究,包括各个方面军的状况,各种情报及各兵种预备队的准备情况。然后又召集红军总后勤部长、各兵种司令和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保障的各个主要首长进行研究讨论,最后再由总参谋部协同方面军根据最高统帅的意图制定出实施战役计划。

最高统帅部的会议都在斯大林的主持下召开,讨论并决定各种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军事行动的战役计划均由中央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共同审议,并邀请负责战役保障的人民委员参加。从而保证了在重大的军事行动上集中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战略指导上执行统一的方针,同时通过有组织的后方支援,使军队的作战行动与全国的力量紧密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

战争开始的几个月里,德军以大量的坦克和轰炸机、战斗机为先导猛烈进攻,迅速向前推进,最高统帅部建立了三个方面总指挥部,协助最高统帅部更好地指挥部队迎击敌人,但很快就证明了这种组织形式起不到这样的作用,终于撤消了。

在紧张复杂的战争指导过程中,斯大林逐渐总结、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战略领导制度,那就是向最重要最紧急的战区或战役派出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制度,保证了对方面军的领导。担任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军事首长,都是最有军事素养,能迅速对部队和战况透彻了解、坚定果断,他们通常都直接参与制定和解决当前战役的重大计划,并对战役实施具体领导和全权负责。其中有伏罗希洛夫、朱可夫和铁木辛哥等。此外,最高统帅部在方面军的常驻代表则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

斯大林除了向某个战役直接派出负责贯彻最高统帅部决定的全权代表外,有时还派出军兵种代表。他们的任务是协助方



面军指挥员和最高统帅部代表,主要负责组织不同兵种的协同作战。

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斯大林一直是最高统帅,亲自掌握着空军的编组和后备力量。每天听取派向空军的最高统帅部代表的汇报,经常检查飞机的生产,亲自给空军部队调配装备,“每天在他的笔记本上记下”新飞机的交货数量。他时刻密切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不断频繁地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他们磋商,并通过他们贯彻最高统帅部的决定,指挥战争,决胜战役。他在残酷而激烈的艰苦年代和战争岁月里,养成了超人的记忆力和敏锐的思考力,这使他很快了解了战争的严密逻辑、防御和进攻中部队成梯次配置的意义,战略预备队在战役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实战问题。他以自己深刻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成为精通重大战略问题、迅速抓住最主要问题的实质,采取相应的正确对策,组织和实施相应的进攻战役的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从而成功地驾驭着埋葬侵略者的战争。

1941年10月初,向莫斯科方向进攻的德军包围了苏军四个集团军,并使苏军损伤60万人。斯大林即急电在列宁格勒前线的朱可夫返回莫斯科扭转危局。

由于朱可夫采取了非常措施,终于稳定了局势。

斯大林很快就明白了,不仅是朱可夫的信心、坚决和果断能使战斗的组织情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谁也看不出朱可夫有张皇失措的表现。恰恰相反,在那一切都看起来完蛋了,天塌地陷了,因而可能陷入绝望的时刻,他却精神抖擞,精力充沛,坚决果断。危难压不倒他,反而使他更坚强,他就像压紧的弹簧,就像一只准备同暴风雨搏击的雄鹰。在这样的时刻,常常发现



他习惯用拳头顶紧下颏……如果情况需要,他会断然采取措施。

斯大林非常赞赏朱可夫,任命他为副最高统帅,他感觉到朱可夫思维灵活大胆,处理问题非常果断,在指挥人员、政工人员和士兵中很有影响力。他不仅具有卓越的指挥才能,也能够开诚布公地和斯大林交换意见;不仅善于解决战场上的问题,还善于说服斯大林改变他在盛怒之下所作的了的不适当的决定。

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战争后期,1942年12月经华西列夫斯基请求和斯大林同意,他任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部长、第一副总参谋长,但他不是元帅)等也都对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战争的最后日子里,难忘的胜利到来了,斯大林毫不犹豫地决定赋予朱可夫全权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电文言简意赅,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既有已经成为过去的一种悲剧的苦涩,也有将要体验到一种胜利的欣慰:

副最高统帅、苏联元帅

格·康·朱可夫: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授权您签署德国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书。

最高统帅、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二十七 世界最大力量的首次聚会

1943年2月2日,苏军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一次战役——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整个战役从1942年7月17日德军开始猛攻斯大林格勒,到11月9日苏军转入反攻,再到次年2月2日将德军全部歼灭,共历时200天。在整个战役中,法西斯德国军队共损失150万人,3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200门大炮和迫击炮,3000架飞机和其它的兵器。改变了战争的全部形势,迫使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停止了战略进攻。这一会战既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斯大林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的方针,纵横捭阖,促成了苏、美、英三国首脑的首次会晤,讨论了对德作战中的一致行动和战后和平等问题。显示了斯大林坚定、卓越的政治斗争策略和高超的外交艺术。

这次聚会,是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商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史称德黑兰会议。通常人们也叫它“三巨头”会谈或“三巨头”首次会晤。

1943年11月25日,斯大林携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及翻译帕夫洛夫,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由孔策沃附近的傍轨登上火车,经斯大林格勒至巴库,然后乘飞机去德黑兰。随同斯大林的总参谋部联络军官什



捷缅科随身携带着所有战区的地图。在旅途隙间便同莫斯科的总参谋部通话,负责把获得的最新情况标入图中,并在每天早晨和晚上向斯大林报告前线要况。在德黑兰为斯大林安排的住所,是苏联大使馆的院落里。

英美方面参加会议的共有二三十人之多,还带着三军参谋长和参谋人员。会议于11月28日在苏联大使馆开幕,共开了4个下午。斯大林在整个会议期间,由什捷缅科负责用电话或电报与莫斯科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联系,经斯大林签署、批准命令或文件后,再由什捷缅科发回莫斯科,始终保持着对国内战场行动的直接指挥。

“三巨头”第一次全体会议11月28日16时开始,到19时30分结束,由美国总统罗斯福主持。他说:“作为在座的政府首脑中最年轻的一个,我冒昧地第一个发言。我愿意向我们这个新家庭的成员们——聚集在会议桌周围的全体与会者保证: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尽快地赢得战争的胜利……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任何东西都不打算发表,但我们彼此之间要像朋友一样开诚布公。”会议参加者们都得到了不发表会议上讨论的任何东西的保证。这对于相互之间自由地交换意见,更好地了解各方的立场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对会议的程序,各代表团的参谋人员可以单独讨论军事问题。罗斯福说:“我想这次会议将会是成功的,在这次战争中联合起来的三个国家将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并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紧密合作创造条件。”

就要开始讨论实质性问题了。作为主持人,罗斯福询问丘吉尔和斯大林,是否愿意就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及其对全人类的



意义讲几句话。

丘吉尔立即举手要求发言。为了强调这一时刻是极庄严的,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并把圈椅往旁边推了推,给他那肥胖而笨重的身子让出了地方。“这次会晤,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世界力量的最伟大的集会,”丘吉尔从容、清晰而又有节奏地说。“我们的手里握有缩短战争,赢得战争和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等问题的决定权。我愿为我们无愧于上帝赐给我们造福于人类的良机而祈祷。”他环视了在座的所有人,然后拉回圈椅,慢条斯理地坐下去。

罗斯福和丘吉尔看了看斯大林,他们大概在想:他会讲些什么呢?

“我想,我们是历史的宠儿,”斯大林坐在那里,出人意料地说。“历史把最大的力量和最有利的条件交给了我们。我希望我们能想方设法在这次会议上本着合作的精神,充分利用我们的人民赋予我们的力量和权力。现在我们开始工作吧。”当斯大林发言的时候,大厅里一片寂静,也许是在座的多数人是第一次听他的讲话吧。

会议接着对实质性问题开始讨论。

罗斯福介绍了美、日在太平洋区域的战况后,斯大林着重讲苏德战场的情况。他通过这些情况告诉人们,德军的主要兵力都在对苏联作战,而它之所以能集中最大兵力对苏联作战,是因为没有另一个重要的战争行动牵制它。要想有效地支援红军,缓解苏德战场苏联一方的压力,以便准备战略大反攻,最好由英美开辟西线第二战场,迅速进军法国北部。

这是苏联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三巨头”会议的主要议题。



罗斯福的态度是,这个问题很迫切,盟国一年半来都在制定相应的计划,但困难很多。应当实施的这个战役计划的理想时间还无法确定。而丘吉尔则竭力回避、躲闪,表现出了他设法和企图改变议题的顽固态度。他扯起了牛皮筋。斯大林接连向丘吉尔提出问题,而丘吉尔一味不作正面答复,并不断和斯大林争辩着,会议气氛很紧张。

第二天上午举行了三国军事代表会。英国三军参谋长布鲁克重复了丘吉尔的立场。美国代表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明确表示,如果准备不足而要实施法国南部登陆战役,可能会延误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计划实现。三国军事代表各执己见,不仅在何处发动登陆战役上不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最终没有解决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问题。

在会议发言中,斯大林语气平缓,常常很简短。他思维周密,表达准确。他恼火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有好几次表现出了不耐烦。丘吉尔这个人往往是闪烁的灵感一冒头,就会情不自禁地高谈阔论起来。有一次,丘吉尔实在讲的太长了,斯大林吼道:“这会还得开多长时间?”不过他确实是尽量克制自己,尽力地表现得友好。

在会上以及每天非正式的午餐和晚宴上,讨论的问题很广泛。“三巨头”间也不时地个别探讨、交换看法。

11月29日全体会议开始前,在苏联大使馆里,举行了一个显示同盟国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团结一致的、赠授“斯大林格勒荣誉剑”的隆重而简短的仪式。

仪式还未开始,大厅里已是座无虚席。斯大林身穿佩带大元帅肩章的浅灰色军服,丘吉尔也穿着统帅军服。军乐队奏过



苏、英国歌后，指挥仪仗队的英国中尉把华丽的宝剑交给丘吉尔。丘吉尔转身双手将宝剑高举，对斯大林说，他奉国王之命将这柄荣誉宝剑交给斯大林，托他转交给斯大林格勒市民，“以表英国人民的敬意。”斯大林接过宝剑，在剑柄上吻了一下，然后把剑递给伏罗希洛夫，最后交给苏联方面指挥仪仗队的中尉。斯大林简短地说了几句话表示感谢，并同丘吉尔握了握手。

接着会议就开始了。关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依然议而不决，英国首相丘吉尔模棱两可，不痛不痒地态度极大地刺伤了斯大林。他耸了耸肩，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会谈实在是希望渺茫。但他仍然以极大的毅力克制自己。他以平静的口气说，“如丘吉尔首相所说，在8月份实施‘霸王’计划，这期间天气不好……4月和5月却是实施‘霸王’计划最合适的月份。”丘吉尔继续坚持强调所谓客观困难，说那时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不具备。继续会谈看来已毫无意义了，斯大林从座位上突然站起，对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说：“我们走吧，我们在这儿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好干了，我们前线还有很多事要做呢！”

丘吉尔满面通红。他嘟囔说：“你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罗斯福适时地建议说：“我认为现在我們都很饿了，所以我提议休会。去出席今天斯大林元帅招待我们的午宴。”

在宴会上，丘吉尔说：“我认为，上帝在我们这一边，无论如何我已竭尽所能使其成为我们的忠实朋友。”

斯大林抬起头，看了丘吉尔一眼，微微一笑说：“那么说魔鬼自然在我们这一边。因为毫无疑问，人们都知道，魔鬼就是共产党。而上帝自然是行为端正的保守党人了。”这一取笑给宴会又增加了不少情趣。



宴会一结束,斯大林趁着余兴又邀丘吉尔会谈。在斯大林紧追不舍的“攻势”下,丘吉尔无法躲闪了,他只好说:“我对登陆本身并不担心。我担心的是过30天至40天后会发生情况。”

斯大林敏锐地感到有了转机。他暗示说,英、美即便在法国北部登陆成功,但要进一步进攻德国领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如果英、美拖下去,那么苏联军队将会首先攻入德国领土。这样的暗示,显然对丘吉尔有很大触动。当斯大林又一次重提关于实施“霸王”计划的日期时,丘吉尔就不再回避了。他想了一下,认真地说,会有满意答案的。

在第二战场这个主要问题上,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第二天“三巨头”共进早餐的时候,罗斯福满面笑容,他一面打开餐巾一面向斯大林说:“在英国首相和我本人的参与下,联合参谋部已作出决议:‘霸王’战役定于1944年5月进行,并将得到在法国南部登陆作战的配合。”

“这项决议,我很满意。”——斯大林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说,“但我也想告诉丘吉尔先生和罗斯福先生,我们的部队也在作准备,到……登陆战役开始时,要给予德国人强大的打击。”

至此,这个全世界关注的、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定下来了。可以说,这是德黑兰会议最重要的成果。

斯大林在这次会谈中支配了会议,赢得了成功,也展示了自己的才能和风度。罗斯福说他说话言简意赅,目的明确,为达到目的既耐心而又坚韧不拔。布鲁克认为斯大林具有杰出的军事头脑,每次发言都是以他那敏锐而又准确的洞察力来弄清局势的各种含义,“在这方面他比罗斯福和丘吉尔突出。”

12月1日,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的三国宣言中说:



“我们怀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我们作为事实上的朋友、精神上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在这里分手。”

世界历史上最大力量的首次聚会——“三巨头”会议画上了句号，为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十八 克里姆林宫御医的故事： 斯大林可是个好病人

在我面前的是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多伊尼科夫，1953—1984年，他是苏联卫生部四局（专为领导人看病）的口腔科主治医师。他看过的病人有斯大林、卡冈诺维奇、贝利亚、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如今他是莫斯科口腔医科大学的教授。

“1953年，‘反革命医生案’（历史冤案，多名医生因被指控谋害国家领导人而被判刑——编者注）闹得正凶，我被派到克里姆林宫医疗局工作。”

一天凌晨两点半左右，一辆黑色加长轿车开到我的住处，来人是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编者注）。

“谁是医生？”卡冈诺维奇生硬地问道。“我”，多伊尼科夫怯声回答。卡冈诺维奇毫不留情地说：“我对你不放心！你太年轻。”说着转身就走。多伊尼科夫吓得魂儿都要丢了。“不过，我妻子牙也不好，老疼。如果她说你行，那我再来。”卡冈诺维奇最



后说。

后半夜,多伊尼科夫根本没睡着。第二天一早,他那头浓密的黑发中首次出现了白头发。他知道,自己随时有可能成为“反革命医生”。好在给卡冈诺维奇夫人看牙很顺利。这才平安无事。

“给领导人看牙可不是闹着玩的,千万不能把他们弄疼了。”

“斯大林怎么样了?”

“斯大林可是个好病人,他不怕疼。而且奇怪的是,他非常信任医生,总是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只是别用什么稀奇古怪的招儿。’每次看完牙,他总要向医生道谢。”

“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也非常信任医生。他总是工作到深夜,在凌晨时分到诊所看牙,而且常常躺在诊所的椅子上就睡着了。”

“许多病人很怕牙医。您的病人当中有这样的吗?”

“勃列日涅夫一点不适的感觉都受不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也一样。文化部长福尔采娃看牙时甚至要全身麻醉。第一位女宇航员捷列什科娃也是我的病人,她对我说:‘我是个勇敢的人,但我很怕疼。’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和朱可夫从来不怕疼。有一次朱可夫元帅的一颗牙松动了,得拔掉。我建议给他上点止痛药,元帅一摆手:‘上什么止痛药啊!就这么拔!’”

“给斯大林或贝利亚看牙时,你不害怕吗?要知道一提他们的名字,死人的心脏也会吓得跳动起来……”

“尽管大多数领导人在我的诊所里都和普通病人没什么两样,但我每次还是非常紧张。我最害怕贝利亚。只有他来看牙时还带着警卫。每次给他看完牙,我都要吓瘫了。他的牙很不



好,不过我只给他看了三四个疗程,之后他就被抓起来了。”

“讲讲勃列日涅夫吧。据说他把自己发音不清楚归咎于牙医,说牙医给他镶的假牙质量不好。”

“勃列日涅夫是个相当挑剔的人。他60年代得过脑梗,后来又中风。他口齿不清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而不是因为假牙不好。他常常谈论赫鲁晓夫,表面上看他们矛盾很大,但我却觉得他内心深处很尊重赫鲁晓夫。”

“您休假时也得工作吗?”

“在克宫工作30多年中,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得随时待命。不管我在哪儿,四局的人都能找到我。有一次我到德国出差,第二天要在国际会议上做报告,突然来了加急电报:‘已派车去接你。专机已备好。’是勃列日涅夫牙疼病犯了。”

“您一定碰到过不少有趣的事。”

“当然啦。比方说勃列日涅夫,他总喜欢穿奇装异服,又酷爱枪支。有一次,他单独接见的两名美国西部牛仔送给他一套牛仔装和两支柯尔特式手枪。勃列日涅夫穿着这套行头就来到了诊所:‘我今天是美国牛仔。’”

二十九 永别,“3月5日”

1953年2月28日,中国人的元宵节。虽说立春已过去了24天,但莫斯科依然寒气逼人。



这是一个星期六。74岁高龄的斯大林起得比平常晚一会，尽管他患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症，但却精神矍铄，兴致很好。他阅读了来自朝鲜的情况通报以及其它的文件。晚上，像往常一样，他、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在他的住处吃晚饭，讨论和决定了很多问题。布尔加宁详细地说明了朝鲜的军事形势，斯大林再次确信，朝鲜的局势已是逼和的局面，决定第二天由莫洛托夫向中国人和朝鲜人建议在谈判中“争到底”，但最终要停止军事行动。整个晚上斯大林的情绪一直很好，过得很愉快。直到凌晨4时，他还一边高声说笑，一边步入走廊送走了他的“客人”。

3月1日是星期天，不幸就在这天晚上降临了——斯大林患了脑溢血，昏迷不醒。对他的抢救治疗一直持续到3月5日。晚上，9时50分就溘然长逝了。

3月6日凌晨，莫斯科电台宣布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大批群众冒着刺骨的寒冷开始拥到红场，无数的人都在默默地哭泣。到了傍晚，人群剧增。来自莫斯科和远处成千上万的人，不分清晨和夜晚，满怀爱戴和悲痛的心情汇成了一条长河，蜿蜒流淌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源源不断地注入圆柱大厅，列成没有尽头的队伍缓慢地从棺材旁边走过，向他们的领袖告别。

在整个苏联的国土上，家家户户的房子和门窗上都挂起了红旗，悬上了黑纱。拥有两亿多人口的苏联，举国一致在庄严肃穆中向他们的领袖表示哀悼。他曾引导和鞭策他们经历了各种

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国防部长，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严峻的考验和一场反对最凶恶敌人法西斯德国的残酷战争。他们知道,他们和俄国已经鞠躬尽瘁。

斯大林的逝世使他的历史“一挥而就”。今天,各国以至世界的局势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但他的历史“写得”工工整整。他在列宁逝世后,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者,领导苏联近30年,走过了苏联历史上一段最艰难曲折的路,一切成就和失败都和他不能分开。至少,当他开始的时候,俄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世界包围着的落后的农业国;当他结束的时候,俄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他两度这样地建设了俄国:一次是在反对14国武装干涉、国内反革命叛乱的战争废墟上;一次是在反对法西斯德国侵略战争的废墟上。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下,在国内异常艰难的环境中,是他继承和捍卫了列宁主义的事业,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发展了科学、文化。在大半个欧洲处于法西斯的铁蹄之下,如同一只风雨飘摇中的破船时,是他领导英雄的苏联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歼灭了法西斯德国的主力,起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曾经长时期得到斯大林的关怀和支持,对于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他也曾给了慷慨无私的援助。尽管其中有过分歧和矛盾,但却是同志之间在前进中的矛盾。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对全苏联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绩。他的一生中也有缺点、错误,但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则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



到未来“旅行”是艰难的、没有把握的；到过去“旅行”也并不轻松些。在社会进步的阶梯上能留下足迹的人，并不是都有同等的价值、同等的意义，但他们也属于现在和未来，他必将使重视今天和明天的人们对他不断地作出评价。

XYZSTAR.COM
校园之星



隐瞒多年的养子开口

讲述真实的斯大林

退役将军阿尔乔姆·费奥多罗维奇·谢尔盖耶夫是斯大林的养子,他将此事隐瞒了一辈子。如今他终于承认了这一秘密,并且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斯大林。

世界上最好的人

阿尔乔姆的生父名叫费奥多尔·谢尔盖耶夫,其别名“阿尔乔姆”更为人所熟知。老阿尔乔姆是党中央委员,曾任莫斯科市委书记,长期与斯大林并肩工作,二人结下深厚友谊。1921年6月,老阿尔乔姆在莫斯科郊区牺牲。中央政治局当时曾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其家属的安置问题,由于老阿尔乔姆的妻子身体状况恶化,斯大林领养了战友的儿子。小阿尔乔姆开始了幸福的童年生活。

“当时我还不到5个月大。妈妈很放心地把我托付给斯大林家抚养。她和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斯大林的妻子——



编者注)是好朋友,对斯大林也很信任。斯大林一家把我养育到11岁。我和瓦西里(斯大林的二儿子——编者注)同吃同住,成了好朋友,他比我小19天。我后来虽然回到母亲身边,但差不多仍然天天都到斯大林家里去玩。对我来说,斯大林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谈到斯大林一家的生活时,阿尔乔姆说,斯大林一家生活简朴,先前的房子很小,他和瓦西里住一间房,雅沙(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的小名——编者注)住在餐厅的角落,斯大林没有工作室。后来搬了家,宽敞了些。斯大林和阿利卢耶娃都有了各自的房间,但他们仍然住在一起。

“那时家具都是公家的,”阿尔乔姆回忆道,“没有花草植物,更没有宠物。不过,在位于索契的别墅,我亲眼看到斯大林拿着锹,给果树培土浇水。他搞了一个真正的果园,有梨树、桃树、杏树……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他让人养了一群鸡鸭鹅。斯大林在别墅时,常去‘探望’它们。”

阿利卢耶娃之死

改革之后出版了许多有关斯大林的回忆录,大多将斯大林描绘成暴君,冷酷无情,对子女漠不关心,甚至说阿利卢耶娃是因不堪忍受斯大林的折磨而自杀的。阿尔乔姆对此断然否认。

“斯大林对阿利卢耶娃很好。他甚至常常当着孩子们的面拥抱她,吻她。斯大林很在乎她。”



“斯韦特兰娜(斯大林的女儿——一边者注)在其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母亲自杀的情况。您同意她的说法吗?”

“我不同意。悲剧发生时她不在莫斯科,她也没有参加葬礼。当时她还不到7岁。她是在四个月后才知母亲去世的。”

“您母亲是阿利卢耶娃的好朋友,她对后者自杀作何解释?”

“她认为可能是头痛导致的。阿利卢耶娃经常头痛欲裂。所有办法都试过了,但都无济于事。我还清楚地记得,每当阿利卢耶娃的房门紧闭,那就表明她头痛病又犯了。所以我的解释只有一个:她是因为再也无法忍受长期头痛的折磨而自杀的。”

“许多回忆录中称她是被斯大林逼死的。”

“一派胡言。他们怎么不写斯大林在妻子死后的痛苦呢?我参加了葬礼。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斯大林不仅流了泪,而且是痛哭失声。瓦西里搂着他的脖子,不停地安慰他:‘爸爸不哭,爸爸别这样……’在棺材入土时,斯大林亲自撒土安葬。不久后斯大林换了一处住宅,还是在克里姆林宫。他为什么要搬家?就是因为老宅子里的一切都让他想起过世的妻子……”

COM
校园之星

斯大林和孩子们

“众所周知,斯大林是个严厉的人,甚至很冷酷。那么他在家里表现如何?”

“他从不训斥我,即使他对我的行为和学习成绩不满。他只是平心静气地教导我,告诉我为什么做得不对。我不怕他,但是我很尊敬他。”



“他看你们的作业本吗？会不会因为得了二分而惩罚你们？”

“斯大林有时会检查我们的作业本。瓦西里有一次作业不及格，还让我帮他把手子藏起来。不过即使不及格，斯大林也从未责罚过我们。他总对我们说：‘成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问题弄懂。’”“斯大林的母亲有时从格鲁吉亚寄来核桃酱，那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简直是过节。我还记得斯大林将邮包放在饭桌上，掏出一瓶瓶美味的核桃酱，微笑着说：‘快看奶奶寄来了什么！’”“我讲个细节，你自己判断。每当斯大林下班回家，孩子们都会跑上前去迎接他。他会轮流抱我们，把我们举得高高的，都要顶到天花板了。然后他会边脱外衣边问：‘怎么样，孩子们，今天干什么了？又学了哪些新东西？’”

“您不是斯大林的亲生儿子，他对您怎么样？”

“他很宠我。记得在我过7岁生日前一天，他眯缝着眼睛，亲切地对我说：‘就要过生日了，想要什么礼物？’我不好意思地说：‘什么都不要。’他伸手递给我一本书——《鲁滨逊漂流记》。我太高兴了。打开扉页，上面有斯大林的亲笔赠言：‘送给小朋友汤米克，祝你快快成长，早日成为一名有觉悟的、坚强无畏的布尔什维克。’”阿尔乔姆后来上学、参军，参加了卫国战争。他从未对人说过自己是斯大林的养子。他上大学二年级时，斯大林曾给校长打电话说：“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是在您的学校上学吗？请您对他要求严格些。”阿尔乔姆是在20年后才从一个好朋友那里知道这件事的。

阿尔乔姆现在是退役将军。不过他并没闲着，他在写回忆录。他说，他会在书中讲述斯大林一家许多有趣的事情。



斯大林的智力

斯大林的智力(1)

古罗马神话留给我们一个弥涅尔瓦的形象——智慧女神。古人把她描绘成一个从朱庇特脑袋里出来的身着戎装的苗条妇女：头戴盔甲，一手拿梭镖，一手拿盾牌。在女神的脚边立着一只猫头鹰——神鹰，无声的奔放的想象力的化身。按照远古人的迷信说法，想象力总是凌驾于人之上，凌驾于历史之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话——“弥涅尔瓦的猫头鹰只在夜间飞出来”，他把这句话解释成意识必然落后于现实存在。

我在试图说明斯大林智力特征之前，先谈谈这个概念的含义。心理学家们常常把智力当作智能；哲学家们则把智力看作思维过程；在各种科学文章中这一术语指的是人的思维能力、智慧、创造因素、认识能力等等。这基本上反映了智力的各个方



面。众所周知,人的个人意识是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的:理性(理论)部分和感性(感觉)部分。如果智力概念同个人意识的内容完全吻合,那么个人意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依我看,智力是对人的创造思维活动能力的概括评价。智力不是个人意识中某种特殊的独立成分,而是以能积极合理地反映现实的形式出现的人类心理的整体表现。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属性。马克思写道:如果失去了理智方面,“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看来,可以说,智力无非是表示一个人能够创造性地掌握现实的理性认识水平。“掌握”周围世界是依靠达到理性思维(“健全的理性”)、智慧(最高思维能力)和直观水平的智力来实现的。在基本特征相同的基础上,每个人的智力又是独一无二的、不重复的、有自己特点的。

近年来,大概由于对斯大林、对他的生平、活动反面报道越来越多,形成一种印象,好像这个人的智力水平并不比平常人高。有时说的更绝对,认为托洛茨基关于斯大林是“杰出的庸人”这个评价实质上是正确的。未必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出色智慧的人能够从1912年起就进入党的领导机构,列宁会称他为“杰出的领袖”之一,能够在20年代极其错综复杂的政治矛盾和冲突中,在同那些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他的人的残酷斗争中成为胜利者。

全部问题在于,当我们评价斯大林个人的时候,常常有意无意地首先(这是很自然的)提出他的犯罪行为、阴谋诡计和对他认为敌人的人的残酷无情。所有这些都只是间接地反映一个人的智力,而更多的则是反映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从这种意义



上说,斯大林超群的智力(我想,他具有这样的智力)似乎带有很多反人道主义的特征。斯大林的智力由于同罪恶表现有着有机联系而在整个人类道德方面失去了价值。如果可以扼要说明斯大林的智力特点,那么,说他具有“超群的罪恶的智慧”,似乎比较符合事实。我认为,道德缺陷本身就是智力不健全。这是智力在道德方面的衰落,也就是说,不见善良之光闪烁。甚至可以说,在人性结构中,道德上的缺陷能够将很高的智力降低到只能发挥计算机即逻辑机械的功能,降低到合理的但却残酷无情的机器的水平。

革命前斯大林在同论敌进行斗智的辩论中经常被弄得很难堪,有时甚至受到侮辱,他不甘心在这些辩论中充当不说话的小角色,努力尽可能扩大自己政治理论知识的范围。尽管工作异常繁忙(这的确是真的),斯大林仍然为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作了很大的努力。在斯大林个人档案馆中保存着一份有趣的文件。尽管很长,我还是把它全文引用。

1925年5月斯大林委托助手托夫斯图哈为他建立一个像样的个人图书馆。托夫斯图哈犹豫了一下,问道:

“图书馆中都要哪些书?”

斯大林正准备口述,突然又停了,坐到桌旁,当着助手的面,几乎不加思考地用了10—15分钟时间,在笔记本的一张纸上用普通铅笔写着:

给图书馆馆员的便条。我的建议(和请求)。

1. 不按作者,而按问题将书分类:

(1) 哲学;



- (2) 心理学；
- (3) 社会学；
- (4) 政治经济学；
- (5) 金融；
- (6) 工业；
- (7) 农业；
- (8) 合作社；
- (9) 俄国历史；
- (10) 其他国的历史；
- (11) 外交；
- (12) 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
- (13) 军事；
- (14) 民族问题；
- (15) 党的、共产国际的以及其他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及决议)(不要法令和法典)；
- (16) 工人状况；
- (17) 农民状况；
- (18) 共青团(所有关于共青团的单独的出版物)；
- (19) 其他国家的革命史；
- (20) 关于 1905 年；
- (21) 关于 1917 年二月革命；
- (22) 关于 1917 年十月革命；
- (23) 关于列宁和列宁主义；
- (24) 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历史；



- (25) 关于俄国共产党内的辩论情况(文章、小册子);
- (26) 工会;
- (27) 小说;
- (28) 文艺批评;
- (29) 政治杂志;
- (30) 自然科学杂志;
- (31) 各种字典;
- (32) 回忆录;

2. 从这些分类中将下列书拿出(单放):

- (1) 列宁的书(单放)
- (2) 马克思的书(——)
- (3) 恩格斯的书(——)
- (4) 考茨基的书(——)
- (5) 普列汉诺夫的书(——)
- (6) 托洛茨基的书(——)
- (7) 布哈林的书(——)
- (8) 季诺维也夫的书(——)
- (9) 加米涅夫的书(——)
- (10) 拉法格的书(——)
- (11) 卢森堡的书(——)
- (12) 拉狄克的书(——)



3.所有其他书均按作者分类(各种教科书、小杂志、反宗教作品等等不用分类放在一边)。

约·斯大林

1925年5月29日

考虑到,这实际上是匆忙写成,而且注意到当时“书的文明”水平,我们不能不承认斯大林观点具有一定的广度。可以看出,斯大林认为最重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历史、首先同政治活动和同反对派斗争有关的某些具体知识领域。人名很少,在名单中除列宁以外,还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以及他与之辩论过和将要与之辩论的人。名单中没有思想巨匠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卢梭、笛卡儿、狄德罗以及很多其他社会主义理论家。

我已经讲过,对已经熄灭的理智及其隐私是很难加以推断的。但是,具体表现在行动和行为中的能够判断智力“秘密”和特点的事情和思想保留下来了。在研究斯大林的过程中,他的图书馆、图书馆中斯大林本人的“痕迹”为思考提供了很多素材。在克里姆林宫图书馆、在孔策沃住宅中的很多书的页边上都有着重号、记号、批注。在很多书中都有“约·维·斯大林图书馆第x号”的藏书签。请注意,在第一版《列宁全集》所有卷次的页边上都标满了着重号、钩号和惊叹号。有些文章斯大林大概看了不止一次,因为文章的有些句子他不仅用红笔,而且用蓝笔和普通铅笔多次划过。斯大林最感兴趣的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列宁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在各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在自己的同时代人中，斯大林最经常读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书。例如，1932年出版的布哈林的小册子《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全书被“领袖”用红铅笔划满了，特别是布哈林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论点。1921年柏林出版的斯摩棱斯基的书《托洛茨基》，上面所有以批评态度评价斯大林不可调和的论敌的地方都划了着重线：“托洛茨基爱挖苦人，不能容忍”，“这是一种好发号施令的性格”，“政治上的贪权者”，“托洛茨基是天才的政治冒险家”等等。斯大林竭力去寻找反对自己对手的论据。看得出，斯大林从1920年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恐怖分子和共产主义》中找到了很多同托洛茨基斗争的论据。他还仔细研究了季诺维也夫的《战争和社会主义的危机》一书、加米涅夫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布勃诺夫的《共产党在俄国发展中的关键时刻》一书、纳尔夫斯基的《布尔什维主义同卢森堡主义斗争的历史》一书、扬·斯泰恩的《论资本主义稳定的问题》一书等等。所有涉及“斗争”的书他都很关心。

斯大林始终对历史著作、首先是对皇帝传记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兴趣。·别利亚尔米诺夫的《俄国历史教程》、维珀的《罗马帝国概述》、阿·托尔斯泰的《伊凡雷帝》、《罗曼诺夫王朝》文集等书他都认真研究过。30年代和40年代在他的图书馆中收集有中学和大学的各种历史教科书，并且所有书上都有他的批注。不难看出，斯大林认为用适当方式描述祖国历史也是实行独裁、形成社会意识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助手们从定期刊物上、“厚厚的”杂志中将所有他们认为有趣的资料报告给斯大林。“领袖”在处理公文的间隙，有时抽出



30—40 分钟时间,读读文学新作品,翻阅杂志中的文章。有时读完后按电铃,助手进来,斯大林让他打电话给某个作家、某创作协会领导人转达他的要求和意见。有时他也亲自动笔。他翻阅完考涅楚克的《在乌克兰的草原上》一书,立即写了一封短信:

尊敬的亚历山大·叶夫多基莫维奇!

我读了您的《在乌克兰的草原上》一书。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是一本艺术上完整的、使人开心的、非常开心的书。我只是担心,这本书太使人开心了;有一种危险:在喜剧中使人过分开心会使读者或观众忽略剧的内容。

随告:我在第 68 页上加了几句话。这样做是为了更清楚。

敬礼!

约·斯大林

1925 年 5 月 29 日

斯大林的智力(2)

XYZSTAR.COM
校园之星

下面是斯大林增补的几句话:

1:“今后将不是根据牲畜的数量、而是根据集体农庄土地公顷数征税……”

2:“不论集体农庄牲畜繁殖多少,税额数不变……”

斯大林的实用主义头脑在这里也表现出来,他没有放过机会借考涅楚克之口说明中央委员会最近的一个决定,还说,并不



全都喜欢……

读完埃尔德曼的剧本《自杀》之后，他写信给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尊敬的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

我对剧本《自杀》(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评价不高。我最亲近的同志们认为，该剧本内容浮浅，甚至有害……我并不排除剧院会达到目的。文化和宣传部(斯捷茨基同志)会帮助你办这件事的。会有一些懂艺术的人。我在这方面只是一知半解。

敬礼！

约·斯大林

1931年11月9日

斯大林努力在创作界扮演“自由主义者”角色，同时故作姿态，说自己只是一知半解。然而我们知道，他不仅对剧本，而且对书、电影、音乐、建筑提出的意见是多么绝对。国家第一号人物的地位使他即使不是知道所有知识，也应该知道很多，这确实使斯大林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一知半解者”。有时他的一知半解是为了证明领袖的“无所不知”。

斯大林对国外出版的书籍也很注意。几乎所有托洛茨基写的东西都给他翻译出来(一份)。斯大林也浏览侨民的出版物。1935年12月中央委员会报刊出版部主任·塔尔通知政治局委员：

“请告知，在下列1936年白俄侨民的出版物中您订阅哪些：

- 1.《最近消息》
- 2.《复兴》杂志



- 3.《社会主义通报》
- 4.《俄罗斯旗帜》
- 5.《普罗柯波维奇经济办公室公报》
- 6.《哈尔滨时报》
- 7.《新俄罗斯言论报》
- 8.《现代纪事》杂志
- 9.《俄罗斯画报》”

斯大林看了这个目录后,对助手说:“全部,全部都订!”

在斯大林办公室的一个专门橱柜里存放着很多白俄的“反动”书籍。他确实保存了托洛茨基的全部书籍,并在书中夹着大量书签,划了着重号。托洛茨基发表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的答记者问、声明等马上翻译出来并报告给斯大林。需要指出的是,他十分细心地注视着他的敌人在国外写的全部东西。

斯大林对反宗教书籍的态度惹人注目,他直言不讳地称其为“废纸”。不管怎么说,宗教教育对他一生都有影响。斯大林的书面和口头发言中经常流露出宗教的成分。让我们回忆一下1941年7月3日他在电台发表的动人演说,当时他用“兄弟姐妹们!”这样一句对许多苏联人来说不寻常的词句来称呼人民。1929年在庆祝完自己的50大寿之后,斯大林亲笔给《真理报》写了一个便条,以《圣经》中的口吻对祝贺表示感谢:“我把你们的祝贺和问候看作是对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和问候,因为是党按照自己的模式(黑体是我加的。——本书作者注)生育和培养了我。”1942年8月斯大林和丘吉尔在莫斯科谈论时谈到劳合·乔治——国内战争时期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武装干涉的倡议者之一。斯大林沉思了一下,喘了一口气,好像是在对目前来说已遥远的年代的回忆作总结,他说:“所有这些都已过去,而



过去的事是属于上帝的。”

当然,我并不认为,斯大林的世界观中宗教成分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智力上明显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有其宗教根源,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

斯大林是公式和僵化定义的辩护士。他能花费数小时在经典作家那儿寻找需要的词句和说法,以便像他打算的那样,来“不容辩驳地训斥”并战胜自己的论敌。例如,在1929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4月全会上,斯大林揭穿布哈林“不了解列宁”。这样做对他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布哈林作为理论家的声望是众所周知的。

布哈林在全会之前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合理意见:把资金过多地从农业投向工业,这对农民来说,将是“一项负担不了的贡款”。斯大林马上暗暗记下了关于“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关于“贡款”的话,晚上同托夫斯图哈一起在他的图书馆翻了很长时间列宁著作。翻了一阵,找到了。他马上觉得找到了一些“可以致人于死命”的论据。斯大林在全会上发言时声明:“……布哈林在这里‘大喊大叫’,说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能容忍‘贡款’这个字眼。他对于党中央和一般马克思主义者竟敢使用‘贡款’这个字眼感到气愤和奇怪。但是,斯大林得意地环顾一下大厅,“既然已经证明这个字眼在列宁同志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早已广泛地使用,那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他沉思了一会儿后,以胜利者的口吻补充道:“或许在布哈林看来,列宁不合乎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吧?”

斯大林在这里援引了列宁的著作《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论粮食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其实,列宁完全是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贡款”一词的。当下边有人喊



“反正对中农从来没有使用过‘贡款’这个概念”时，斯大林立即进行反驳：

“你是不是以为中农比工人阶级更靠近党？你真是一个糟糕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场大笑）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既然对于工人阶级可以说‘贡款’，为什么对于不过是我们的同盟者的中农就不能这样说呢？”

斯大林并不在意他已经把争论变得无内容了：只争论列宁是否讲过“贡款”一词，至于问题的实质方面，他已经认为是次要的了。

斯大林通过参加大量辩论，“磨炼”了自己的论战头脑。是的，他总是采用同一种办法，即总要把对手置于窘境，而他总是把自己“扮演成”列宁的“捍卫者”；他武断地认为，只有他能够正确地、准确地解释列宁的思想。几乎针对对手的任何论据，斯大林都能迅速找到列宁的引文、语录，有时这些话完全是针对别的问题讲的。斯大林早就发现，用列宁引文作的铠甲可以使他实际上无懈可击。季诺维也夫有一次同斯大林讨论共产国际问题（这时他同斯大林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了），在争论中他对斯大林说：

“对于您来说，列宁的引文是您绝对正确的护身符。但是应该看到引文的实质！”

“难道作社会主义的‘护身符’的想法不好吗？”斯大林立刻应付过去了。

斯大林的直率、攻势、好战、粗暴终于帮助他战胜了自己的对手。奇怪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那些往往更有力的、有时甚至精彩的论据得不到听众的支持！而斯大林那些密切与“捍卫列宁”、党的总方针、中央的统一等等相



联系的有点粗暴的、浮浅的、常常是非常简单的指责性演说却会迅速被人们理解。他的头脑是实用主义的，他既不像托洛茨基那样关心体裁的“优美”，也不像季诺维也夫那样爱用格言警句；既不像加米涅夫那样善于作知识分子式的推理，也不像布哈林那样注重科学的论据。斯大林在无数次争论和辩论中所以能战胜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想“修正列宁主义”，而他是“捍卫”列宁主义的。这种解释从30年代初起就成了官方的解释了。

斯大林的思维方式是公式化的。他喜欢把一切都摆在一个个小格子里，喜欢“反复咀嚼”，解释得非常通俗。如果论敌以不同的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斯大林会非常严厉地认为这是“非马克思主义态度”、“小资产阶级性的表现”、“无政府主义的烦琐哲学”。他的报告、讲话、决定总是严格限制在列举现象、讲明特点、划定界限、提出要求、指出方向、明确任务的范围。一切都非常简单明了，而这正是斯大林著作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基本的“特点”和“界限”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这种思维方式使斯大林思想很容易得以实现，但却严重束缚了人们的创造积极性。斯大林的这种简单化倾向所造成的后果是不能深入地分析、揭示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性的。

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在自己写的《十二恺撒传》中指出，虽然尼禄童年时就学过“贵族科学”，但他拒绝掌握哲学，认为“这对未来的统治者来说是一种障碍”。斯大林未必这样想，但他僵化的智力使他无法在哲学方面达到哪怕是相对的深度。斯大林智力中最薄弱的环节是他不能掌握辩证法，“领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想扩大自己哲学方面的知识。根据红色教授学院领导的推荐，斯大林邀请当时著名的苏联哲学家、老布尔什维克扬·斯泰恩来给他讲授“辩证法课”。斯泰



恩当时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副院长,后来是中央机关的一位负责干部,多次当选党代表大会代表,是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有独到的见解。斯泰恩成了斯大林的“哲学老师”,制定了专门的学习计划,包括研究德国经典作家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费希特、谢林以及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布拉德莱的著作。斯泰恩每周两次按规定时间到斯大林住处,耐心地给身居高位的学生讲解黑格尔关于实体、异化、存在和思维的统一性——把现实世界理解为观念的表现——等概念。而抽象的概念使斯大林很恼火,但他克制自己,继续听着斯泰恩单调的嗓音,时而用不满的反问打断他:“这对搞阶级斗争有什么用?”“谁在实践中用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斯泰恩提醒,同其他德国思想家一样,黑格尔的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他平静地继续讲道:“黑格尔哲学就其实质来说是‘头脚颠倒了’的唯物主义,因此,有很深的矛盾。哲学家的天才就在于,他把一些唯物主义原理吸收到自己的体系中来。但这实质上从总体来说还是唯心主义的。在他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天才地研究了辩证法。马克思说: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用头着地的,应该让它用脚着地,以便看清它的合理的内核……”斯大林已经开始急躁了,他严厉地问道:“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意义?”

斯大林的智力(3)

斯泰恩又继续耐心地加以解释,力图把“领袖”理解不了的



哲学的深奥道理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斯大林只能断断续续地听懂一点量变转变为质变的规律,但是没能掌握辩证否定、对立统一的实质。尽管斯泰恩想尽一切办法,斯大林还是不能掌握关于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统一的论点,对斯大林的“哲学著作”进行的分析表明了这一点。也许正因为如此,“学生”对“老师”只有一种恶感。斯泰恩同卡列夫、卢波尔以及许多其他哲学家——德波林的学生们一样,被宣布为理论上是“托洛茨基的走卒”,于1937年被捕并死去了。看来,等待着20年代末同布哈林关系非常密切的德波林的,会是同样的命运。但是,斯大林只是长期让这位大学者戴一顶“好战的唯心主义者——孟什维克”的帽子,不让他从事积极的社会和科研工作。

1930年10月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哲学战线的分歧”问题。会议实质上是批德波林,批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列宁主义阶段的估计不足”。德波林拼命为自己辩护,但是米柳亭、米丁、麦罗诺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出来“揭发”他,同时也“揭发”斯泰恩、卡列夫、卢波尔对唯物主义辩证法“估计不足”。主席团会议结束后,风波并未平息。科学家们不能容忍把警察方式运用到科学中来。看来,哲学是斯大林“科学学”的第一个牺牲品。斯大林明确表示,在社会科学中只能有一个领袖,那就是担任政治领袖的人。同年12月,总书记作了一个关于“哲学战线”的状况的报告。形式上这是已经提到的在德波林任院长的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斯大林发言是很严厉、很坚决的。这个发言非常雄辩地证明斯大林哲学思维水平、他的智力合理性水平以及起码的分寸:

“必须挖出积藏在哲学界的全部污泥浊水。必须摧毁德波



林集团所写的全部著作。可以把斯泰恩、卡列夫驱逐出去。斯泰恩神气得很,可他是卡列夫的学生。斯泰恩是一个十足的懒汉。他只会讲话。卡列夫装腔作势,徒有虚名。我认为,德波林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但必须把他留在编辑部(这里说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本书作者注),以便有人供我们攻击。编辑部内部将有两条战线,但我们将是多数……”

发言结束后,接二连三地向报告人提出了一些问题:

“是否可以把理论界的斗争同政治倾向联系起来?”

“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这样。”斯大林教导说。

“‘左派’是怎么回事?‘右派’已经谈到了……”

“在左倾的掩护下搞形式主义,”总书记评论说,“把自己的材料浇上些左的调味汁。青年人喜欢左倾。而这些先生们都是好厨师。”

“学院在哲学方面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哪里?”又一个新问题。

“主要问题是打击。四处出击,向没有出击过的地方出击。对德波林分子来说,黑格尔是一尊圣像。应该揭露普列汉诺夫。他一直藐视列宁。恩格斯并非全都正确。他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意见中有一个地方谈到长入社会主义。布哈林就企图利用这一点。如果我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有什么地方触犯了恩格斯,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就是斯大林对哲学家的“教导”,可是他对哲学几乎分辨不清。主要是“打击”……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专门章节中作了阐述。他用简略的、零碎的语句把全部哲学分成几个基本特征,就像士兵排队一样,如此而已!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而斯大林却把它叫作辩证法。如果用来扫盲,在有其他著作的情况下,这个《哲学



基础知识课本》还是可以用的。但是最可怕的是，斯大林的著作出版后，谁也不敢写这个题目了。哲学家也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只能进行注释、解释、吹捧……斯大林时代是哲学思想停滞的时代。难道仅仅是哲学吗？斯大林参加“哲学辩论”这一举动是对他智力的合理性程度的写照。

众所周知，智力的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能力，特别是积极地、创造性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能力。斯大林的头脑对世界、现实的反映当然不是明净如镜的、直观的反映，而是有目的性的、“有选择的”反映，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斯大林根据政治观点、自己的“指示”和“命令”的阶级性来研究、分析所有社会过程。

不过，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他对哲学家们的讲话。斯大林作完报告回答问题时，就已经想好了：必须将自己的指示用特别决议的形式迫使这些哲学家们接受。下一个月，中央果然通过了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专门决议。联合在出版物周围的德波林的拥护者们被说成“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集团”。

斯大林的头脑、他的思维可以说逐渐具有一种“命令”性质。他早就懂得这样一个真理：头脑不会因“磨损”而衰老，只会因思想懒惰、不努力工作而“生锈”。这完全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

这个人把上帝的理智给予了我们，
不是为了让它白白地发霉。

· · 巴拉绍夫对我讲，斯大林每天要处理大量工作：报告、情报、各种材料、电报、密码电报、信件，几乎在每个文件上都要写下批示和指示，简洁地表达自己对各种问题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往往被看作是最后决定。每天读完厚厚的一叠写给他的信



件,匆匆写完言简意赅的批语:“请代为致谢”、“请帮助某人”、“简直是胡说八道”,他经常从信件中拣出一二封信来作详细答复。

例如,列宁格勒什内尔的信。老布尔什维克询问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询问政治局里有无各种倾向……

斯大林从大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工工整整地写道:

什内尔同志!

我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右倾过低估计资本主义的力量。“左的”倾向否认在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他们决心以和农民决裂为代价来实行其幻想的工业化计划。

政治局内既没有右倾,也没有左倾。

致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1928年10月27日

又如30年代的一个文件。在斯达汉诺夫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他和格兰特向政府提出关于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每六天脱产一至二天参加“工程技术人员培训”的问题。许多人支持这项建议,认为这是革命化的新建议。这都在各报上发表了。

斯大林审阅了文件,简短地写道:

致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此事并不重要。

约·斯大林

在斯大林的智力中,很难看出他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他总是根据现成的公式、教条、公设、固定的概念来做事情。同时,斯大林也能进行直觉思维,当作出一些结论和决定时,他好像是在跨越几个认识阶段、阶梯。在这种情况下,看不



出思想的“过程”，只突出地表现了思维的结果、结论、推测、猜疑。在直觉思维过程中，智力似乎越过了逻辑推理，一下子“得出了”结果、概要。当然，毫无根据的猜疑常常是由于意识中缺少某些道德成分所造成的。斯大林正是这样。他能够看着自己任何一个战友说：“你为什么总躲避我的视线？”在这种情况下，过分的多疑主要不是直觉思维的表现，因为斯大林的推测没有现实根据，而是观点有严重缺陷的表现：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潜在的敌人。

还应该指出斯大林智力的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其肖像中占据非常突出的位置。我们知道，知识使人成为内行，感情使人高尚。意志则能使信念、智力构思具体体现在行动中。意志就如同大脑的“筋肉”，这是智力的动力。在生活中常见的是，自己软弱就如同别人有力量一样可怕。坚强的意志会使智力变得积极、活跃、有目的性。一般说来，军事长官、统帅都具有这种智力。正是这些人最先指出斯大林具有非凡的智力，这不是偶然的。

我将用单独的一章来描写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但现在评价他的智力时，我只是从苏联杰出的统帅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许多战争期间同斯大林共同工作过的人那里引一些证据。朱可夫元帅指出，斯大林具有“明确表达思想的能力、天生的分析头脑、渊博的知识和非凡的记忆力”。接着，这位最著名的苏联统帅写道，斯大林“读了许多书，是一位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他具有非凡的工作能力，善于迅速抓住问题的实质，因此他才能在一天中审阅和掌握那样多的各种材料……这只有非凡的人才能做到……他具有坚强的意志、不外露但爱冲动的性格。在通常情况下他很冷静，通情达理，有时又突然大发雷霆。这时，他



往往缺乏客观性,他的眼睛在不停地变化,脸色越来越苍白,目光变得严厉可怕”。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谈到斯大林的许多性格特点时,特别强调他有“惊人的记忆力。我没碰到过有谁像他那样记得那么多事情。斯大林不仅知道所有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司令(这就有100多人),而且还知道一些军、师的指挥员……在整个战争期间,斯大林都能记住战略后备力量的组成,能够随时说出某个编制”。

再谈一个反映斯大林智力特点的例证,这是丘吉尔提供的。英国首相写道,当我讲完“胜利”计划时,斯大林却立即指出了这一计划的战略长处。“这个很好的声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表明,俄国独裁者迅速彻底地掌握了一个对他来说是新鲜的问题。在生命力很强的人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够在几分钟之内理解我们用几个月时间研讨出来的方案。他闪电般地对一切都作了自己的评价。”

我引用了几个在战争期间同斯大林经常接触的人的证明。他们的论断能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这个人的智力特点。很难否定斯大林有很强的“思维能力”、坚定的目的性和坚强的意志。我想,不仅是偶然的的机会和各种情况的巧合使他在革命时期和国内战争年代成了列宁的战友。需要强调的是,斯大林一般都能够特别需要的时候表现出他那些最强的特点——意志和目的性。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这些特点才能在当时被发现;也许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本人才相信自己;也许正因为如此,许多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做的事情,他都做到了。但有一点要补充的是,当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写斯大林时,很多内幕他们还不知道,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很多事当时还不能讲。



我还想请大家注意斯大林智力中的另一个特点：他没有掌握作出长期预测的能力。对于尚未认识、尚不了解的东西，他的认识是有限的。这一点党内同志早就觉察到了。20年代中期，联共(布)图拉州委会书记伊万·卡巴诺夫(后被镇压)有一次说：“斯大林当然是一个伟大的人、非常聪明的人、杰出的组织家，但他的头脑是不擅长分析的，是公式化的。他能够出色地分析过去的问题，因为这对大家都是清楚的。但他却不能对前途作出预测。他还不习惯这样做。”这种观察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正确的。

斯大林的智力在很多方面是非凡的，但绝不是“天才的”，甚至也不是“杰出的”，在估计本人的潜力时，他的智力缺少合理的“制动器”。斯大林对几乎所有知识领域都可以武断地进行评价，从政治经济学到语言学，可以教训电影和农业方面的专家，可以在军事和历史学领域作出决定性的结论。这些多方面的议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很浮浅，可是它们立即被那些歌功颂德者吹捧成最重大的发现。

举这样一个例子。众所周知，根据一些为追求虚荣不惜破坏古物的建筑学家的建议，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推荐的建造苏维埃宫(根据1922年通过的决议)的地点，恰好是著名的大基督教堂所在地。斯大林很快就同意了这个方案。他的智力缺陷在这个事实中表现得最充分：总书记无法估计俄罗斯文化遗址的历史价值。早在向斯大林报告之前，建筑学会就曾在会议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确定了苏维埃宫的建设地点。当时提出三块地方：中国城、猎人市场和矗立着俄罗斯引以为骄傲的宏伟的大基督教堂的地方。参加投票表决的有建设局局长克留柯夫、约凡、克拉辛、拉甫罗夫、波波夫、别谢达、克鲁季科夫、



莫尔德维诺夫、奥尔洛夫,以及应邀的舒谢夫、柳德维克、巴尔辛、波扎尔利茨基(文件中没有这些人的全称)。靠人民的捐献建造了这个基督教堂,可是他们谁也没想到问问人民。1931年12月5日,这座用将近半个世纪时间建造起来的教堂被毁掉了。当响起爆炸声时,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工作的斯大林颤抖了一下。他不安地问助手:

“这是什么声音?哪里在爆炸?”

斯大林的智力(4)

波斯克列贝舍夫报告说,根据您批准的关于确定苏维埃宫建设地点的七月决议,现在正在拆除基督教堂。斯大林放心了。在持续一小时的爆破时间里他再也没有理会这件事,又专心地阅读各地送来的关于集体化进程的报告。斯大林未必知道,这个民族圣地是人民用自己的钱建造的。参加教堂内部装修和雕塑的有韦列夏金、马科夫斯基、苏里科夫、普里亚尼什尼科夫、克洛特、拉马扎诺夫以及其他赫赫有名的大师。由于无神论和建筑方面的考虑,这座永久性的教堂被拆除了。记载着教堂被炸的罕见的、绝无仅有的镜头,反映了心灵上的伤痛。看了电影,使我们又想起了1931年那个寒冷的12月。炸掉的不仅是一座教堂,炸掉的是文化,炸掉的是过去。在过去的东西中,斯大林珍惜的只是那些在目前能够肯定他的东西。

被批准的大厦建设方案的作者,建筑学院士·约凡是这样描述准备拆除的教堂外貌和斯大林的意见的:“1931年,基督



教堂还矗立在莫斯科河畔一个宽阔的广场中央。它庞大、笨重，镀金的顶部闪烁着光辉，既像圆柱形大甜面包，又像俄罗斯茶炉，那公式化的、冷漠的、死气沉沉的建筑风格压迫着它周围的房屋和人们的意识，代表着俄国无能的专制制度和它的‘上层’建筑师们，是他们建造了这个地主—商人的神庙……无产阶级革命勇敢地向这座象征着旧莫斯科王公贵族势力和情趣的笨拙的建筑物举起了手。”院士还兴致勃勃地描述了斯大林对大厦模型方案提出的“天才意见”。他“大胆”建议大厦高度超过400米。斯大林建议建筑物顶部的列宁塑像高达100米。总之，贪大求全始终是总书记的天性：大礼堂——一定要有21000个座位。主席团的位置为什么这么低？要知道领袖要坐在那里的！高些，再高些！不要装吊灯：要靠反射光照明。大厦的主要格调应该反映出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誓言的六个部分……斯大林明确示意，这不是普通的苏维埃宫，这是一座使他这个领袖永世流芳的宫殿。这座宏伟的公共建筑要表现出“亿万人民的苏维埃民主制度取得胜利的思想”。

“民主”，在这种民主下，大厦的轮廓、饰面、灯光、圆柱的高度、雕塑群的内容、镶嵌图案、比例以及其他专业化很强的问题，都要由一个人决定，他认为凭着自己的“天才”，对建筑领域的问题作决定性的结论是正常现象。

每当谈到历史、文化、艺术时，政治总是第一位的。由于智力方面严重的实用主义，斯大林不能把具体的历史的和文化的珍品同永恒、时代、时间加以对照。例如，赫鲁晓夫在1937年2至3月全会上声明：“我们在改造莫斯科时，不应害怕砍掉树木、拆除教堂或某个寺庙。”

他的这个声明得到了斯大林的默许。他的智力只能把文化



珍品看作某种次要的东西。“领袖”在这方面也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是最高审判员和鉴赏家。作品、创作的命运如何、大师或整个集体的构思是否能够实现,往往取决于斯大林的一句话。

斯大林的智力在具体问题上没有“涂上”人道主义、博爱的高尚色彩。而且,他的智力表现得非常不道德。请读者自己评价一下。1946年7月贝利亚报告斯大林,战争期间内务部劳改营“积聚”了10万多名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犯人,他们的生活费用占用了大量物资。内务部建议释放这些无法医治的病人,其中包括精神病人。斯大林补充道:最危险的罪犯——已经判处服苦役的敌人要除外。对“领袖”来说,这些不幸的人如何死去,不是无所谓的。

斯大林的智力中不具有求知欲、好奇、怀疑的能力。这些感觉也可以象征性地称作“智力”感觉,它们始终伴随着人的创作思维表现过程。列宁指出,没有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他所讲的正是感觉的这一方面。斯大林善于“隐藏”直接的感觉。他的智力是冷酷的,常常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而这正是所有那些把“伟大领袖”神化的那些人的悲剧的根源之一。



斯大林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1)

力量和智慧和谐共存,那是很理想的。但是很遗憾,这种现象极少,未来往往属于强者,而不一定属于智者。通常总有一种因素在某段历史道路上占据上风。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现象,它总是与其他现象同时并存。在这种历史的选择关头,智慧和力量的比例往往有各种各样。斯大林不了解也没读过古代思想家们的著作。苏格拉底好像表述过这样一个思想:“哲学家应该成为统治者,统治者应该成为哲学家。”这个思想不仅仅对他那个时代来说是现实的。力量永远需要智慧。斯大林有力量,但没有智慧(虽然我们长期以来把他的计谋、手腕、诡诈误认为是智慧)。这在他选择实现伟大思想的手段和道路时起了悲剧性作用。

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群众力量获得了解放。如何引导它去实现目的、理想,达到连列宁都感到很近的顶峰呢?如何建



设社会主义？党的刊物上充满了老的和新的理论家的文章，他们提出各种建议，说明应如何继续前进。当时一切都是新的。常常令人感到：只要有个正确的口号，事业就会前进。

我要提一件事：1924年底托洛茨基在基斯洛沃茨克写成了那篇《十月的教训》。他在该文中再次企图贬低其他革命领袖的作用，以便“从理论上”论证他追求领袖地位的奢望。正像《布尔什维克》杂志（1924年第14期）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中从“年鉴编纂者”的立场转到了有偏见的检查官的立场。他证明说，在革命过程中，“中央委员会在它赞同托洛茨基的意见时往往是正确的，而列宁在他不赞同托洛茨基的意见时往往是错误的……”托洛茨基写道，在革命中常常会出现一股“洪流”，如果放走它，那将不会再有洪流或革命。他说，他托洛茨基善于抓住“洪峰”……革命“实现了”，因为不管大部分“老布尔什维克”是否愿意，领导了革命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这就是前孟什维克对历史的解释。

托洛茨基再次提出，俄国革命的命运主要取决于“欧洲各国将要如何连续不断地发生革命……”他在自己的《不断革命》一书中说得更肯定：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完成，“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一种暂时状态——尽管像苏联的经验所表明的是——一种长时期的暂时状态”。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实质上说，托洛茨基的回答是：“等待世界革命”，推动世界革命。托洛茨基相信，“十月革命”将会接二连三地在世界各国发生，红军应该帮助其他国家完成这一伟大变革。这是明显的“左倾”观点，但是，这当然不是“犯罪”，就像后来所认定的那样。撇开别的不说，托洛茨基富有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斯大林却总是与此格格不入。



关于“不断革命”论问题,托洛茨基写道:“不言而喻,俄国不可能单独达到社会主义。但是,它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纪元,会推动欧洲的社会主义发展,并因此借助先进国家的帮助达到社会主义。”这就是托洛茨基 1917 年前的看法。革命后他部分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托洛茨基在想象中同斯大林辩论时,用这样的对话形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斯大林:那么,你否认我们的革命能够导致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我仍旧认为,我们的革命如果具有国际性……那就能够而且必定导致社会主义。

接着他解释这些理论分歧的原因:“我们理论上的矛盾的秘密在于,您长期落后于历史进程,而现在企图超越它。顺便说一下,这也是您在经济上的错误的秘密。”

托洛茨基认为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同“不断革命”论是不相容的。支持托洛茨基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道,只有靠牺牲农民经济成分的超级工业化才能为国家创造工业基础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

斯大林对经济学的了解十分肤浅,但是他看到了国家正处于非常艰难的状况。持续了近 10 年的党内争论时期不仅是为确定民主社会的水平和性质而斗争、而且是为寻求发展经济的途径而斗争的时期。如果斯大林具有敏锐的经济眼光,他就会从列宁最后几篇文章中看到社会主义概念的轮廓,这就是必须实行国家工业化和自愿合作化,大力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完善社会关系,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中的民主因素。列宁曾预言:新经济政策把许多这样的问题,如城乡结合、经济杠杆的“解放”、自由贸易、生意人素有的进取心等等结合在一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这些话,斯大林从来没有



真正弄懂过。

最初几年，斯大林对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特卢米林、列昂季耶夫、布鲁德内等人的经济观点很感兴趣，但是他很难领会经济术语、经济规律、经济趋势的错综复杂的实质。这个从未参加过生产、没有闻过春天耕地的气息、连基本的经济政治常识也不具备的人，最后赞同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不足”是不可避免的观点。这种商品不足至今还伴随着我们。诚然，斯大林是想在经济学方面弄懂一点东西的。例如，在他的图书馆里藏有奥·叶尔曼斯基的《科学组织劳动与泰罗制》一书。大家知道，列宁曾称赞作者叙述了“泰罗制，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即叙述了泰罗制的肯定的一面，也叙述了泰罗制的否定的一面……”斯大林也许就是因此而读这本书的吧？

然而，根据他的著作、便条、意见，而主要的是根据他的实际行动，可以确信，斯大林的经济信条极为简单：国家应当强大，不，不是一般的强大，而是要非常强大。首先是竭尽一切可能实现工业化。其次是最大限度地使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实现这一切的途径、方法、手段是最广泛地依靠无产阶级专政。而斯大林只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暴力”的一面。有一次他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样一个公式：“我们面临的任务愈重，困难也愈多。”《布尔什维克》杂志（1926年第9—10期）对这一思想的表述是：“我们给自己提出了愈来愈重大的任务，解决这些任务会保证我们愈来愈顺利地走向社会主义，但是，随着任务的扩大，困难也将不断增多。”这一切同后来的“阶级斗争随着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速度的加快而激化”这一预示着不幸和灾难的公式何其相似！20年代中期，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设想还非常模糊，但是方法他无疑已经有了，这就是暴力、命令、指令、指示。



难道这与无产阶级专政相悖吗？

斯大林在阅读党的一些著名活动家的大量发言时感到，对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所以有大量看法，不仅是由于其作者的思想立场和理论观点各不相同，而且由于现实情况比布尔什维克原先估计的要复杂得多。布哈林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正确地写道：“……从前我们是这样设想我们的事业的，我们先夺取政权，把一切东西几乎都掌握在我们手中，然后就立即实行计划经济；至于某些小小的障碍，我们惩办一部分，克服一部分，事情也就完了。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事情将远非如此。”

的确，事情的发展“远非如此”……斯大林在浏览文章、阅读报告和情况资料时感到，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最危险的是托洛茨基。斯大林甚至一想起这个名字，心里就充满厌恶情绪，这种情绪逐渐变为愤恨。几天前有人告诉斯大林：托洛茨基在对自己的追随者发表讲话时说，“党内某些新的达官显贵”不能原谅他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起的”历史作用。当然，托洛茨基说的“达官显贵”指的就是斯大林。总书记还听到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针对自己的其他一些更令人不快的形容语。

虽然斯大林表面上仍然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保持着良好关系，但他感到，他的直爽和逐渐加强的影响不合这两位“二重唱者”的心意。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尤为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斯大林在给县委书记训练班作的报告中批评了加米涅夫关于存在着“党专政”的意见。最后，斯大林在学员们的欢呼声中说，要知道，同志们，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党专政。公正地说：当时连布哈林也赞同“党专政”的思想。他曾在1924年中央一月全会上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看到两种危险：第一是来自我们机关的集中制的危险；第二是政治民主化的危



险,如果民主走到极端,这种危险就会发生。而反对派只看到一种危险——官僚主义。他们看不到官僚主义危险背后的政治民主化的危险。但这是孟什维主义。要想维持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维持党专政。”拉狄克补充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国家中的专政党。”

但是斯大林批评的只是加米涅夫。他完全没有必要去同许多人“作战”。最重要的是一步一步地按顺序进行,即所谓各有其时。当时政治上的两驾马车立即作出了反应。斯大林对加米涅夫的批评,在政治局会议上遭到指责,说他的批评是“非同志式的”,没有准确反映出“被批评者立场的实质”。斯大林立即提出辞职,这是他当上总书记后的第二次但不是最后一次辞职。这次辞职也被劝阻了……是加米涅夫自己在季诺维也夫支持下劝阻的。斯大林从这件事中感到自己的对手已更加没有信心,他们依旧害怕托洛茨基。总书记再次确信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思维“反复无常”。单是季诺维也夫那本《列宁主义》就够说明问题了!事实上,季诺维也夫是再次企图为自己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为自己同列宁的分歧披上伪装和进行辩护。斯大林是不忘旧怨的人,他以后必定会利用这些事实的。后来,当他对托洛茨基实行惊人的打击时,接下去就该轮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了,如果他们不顺从的话。而这些事实应当暂时留着,记录在案,保存起来。下面就是记录在文件中的这些事实:

应当保护我们对临时政府和战争的立场,使之“既不受‘革命护国主义’的腐蚀性影响,也不受列宁同志的批评”;

“至于列宁同志的总纲,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规定立即将这一革命变



为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的(四月)提纲只字未提和平。因为列宁的建议——“向广大群众说明资本同帝国主义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根本没有说明任何问题……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2)

斯大林那时就已下定决心：一俟解决了托洛茨基这个潜在的竞争者，就收拾这些“无原则的空谈家”。季诺维也夫的武断有时甚至使斯大林这个把自己的粗暴变为优点的人也感到厌恶。在1924年1月14日中央全会的一次晚间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就《争论专页》发言时，对许多中央委员和参加争论的其他布尔什维克作了随意的评价，俨如一个骑兵连长评价自己的部下。季诺维也夫自信地说：“皮达可夫是个布尔什维克，但他的布尔什维主义还不成熟。幼稚，不成熟。”就在几小时前，在谈到皮达可夫对经济问题决议提出的修正案时，季诺维也夫还断然声明：“这不是一个修正案，而是一个纲领，它与好纲领的区别就在于，这是一个糟糕的纲领。仅此而已。”谈到萨普龙诺夫，季诺维也夫称他是“富有乡土气的人。他两脚站在地上，什么都可以想，就是不想列宁主义”。奥新斯基则是“与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有更多知识分子倾向的代表”。季诺维也夫甚至也没有忘记踢上托洛茨基一脚（这显然使斯大林高兴，虽然这之间没有什么有形的联系）：“当年，当我们来到哥本哈根参加国际代表大会时，我们得到一份《前进报》，上面载有一篇匿名文



章,说列宁及其小组所有成员都是刑事犯、抢劫者。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托洛茨基。”

斯大林一边听一边想:他已经把自己看作是“领袖”了。好一个爱出风头的人,饶舌的家伙!当然,斯大林在那次全会上对季诺维也夫的发言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但是两年之后,他在争论中彻底摧毁了季诺维也夫的立场。例如,1926年5月斯大林在研究季诺维也夫一个例行声明时,给参加共产国际的联共(布)代表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曼努伊尔斯基、皮亚特尼茨基、洛佐夫斯基、布哈林、罗米那兹和季诺维也夫本人写了一个便条,其中写道,他“无意中发现了季诺维也夫同志整整八条诽谤言论和一个可笑的声明”。对这些诽谤:关于红色工会国际、关于共产国际中的极左倾向等等,总书记逐条作了斩钉截铁的评价,而对季诺维也夫本人,则以下述(致命的)方式作了概括:

季诺维也夫同志引证自己17年的作家生涯,自吹自擂地声明说,不该是斯大林同志和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教导他必须反对极左倾向。至于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自己是伟大人物,这当然无需证明。但是,如果要求党也认为季诺维也夫同志是伟大人物,那就值得怀疑了。

在从1898年至1917年二月革命这段时期里,我们这些老地下工作者的工作和行踪遍及俄国各个地区,但是无论是在地下活动中,还是在监狱或流放地,我们都没遇见过季诺维也夫同志……

我们老的地下工作者不能不知道,党内有大批比季诺维也夫同志入党早得多、曾为建党默默无闻地工作的老工作人员。同我们老的地下工作者在20年的地下活动时期付出的劳动相比,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所谓作家生涯算得了什么呢?



20年代中期,斯大林的主要对手们已经明白,这个“杰出的庸才”是个非凡的政治家:严厉、狡猾、诡诈、坚定。不久,他的所有反对者都将明白这一点,而几年之后,与他共事的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会全都明白。

读者可能会得出一种印象,作者对选择过程中的个人斗争描述得太多了。很遗憾,一切本来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会发觉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历史选择的主要问题往往被“领袖们”的野心排挤到次要地位。

列宁逝世后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方法问题的斗争,由于个人竞争和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而变得非常复杂化。卷入这场斗争的首先是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当然,斗争的背后是一些具体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如对农民的态度、工业化的途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有时候,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分歧是次要的,这些分歧很容易找到“共同点”。但是,一些人特别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个人野心、个人竞争、好斗的不妥协性,使这一斗争带上了悲剧性质。结果,凡是与斯大林的观点不同的思想、观点、立场,都被看作是“敌对阶级的”、“投降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背叛的”等等。

斯大林一贯“捍卫”列宁,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一贯正确。那些反对斯大林的反对派也“捍卫”列宁,——全部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列宁的思想、列宁的方针。我国历史学界长期以来盛行一种看法,说斯大林“没有背离”列宁的观点,至少在20年代没有背离。情况并非如此。仅仅提一下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在新经济政策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问题上的错误方针,在党和国家内推行官僚主义管理作风等等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早在20年代,斯大林就在许多问题上背离了列宁主义。如果不十分



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就会以为斯大林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情况当然远非如此,而在许多场合绝非如此。

如果有人认为只是反对派错了,而党和斯大林始终是对的,我想这也是不正确的。斯大林的许多错误决定,很遗憾,都是以党的文件的形式作出的。如果党真的没有错误并始终作出正确决定,那就不会发生个人迷信、血腥镇压、领导中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就不会出现多年的停滞,今天我们就不会宣布迫切需要革新:“要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和更充分的民主!”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其决定和实际步骤都不可能一贯绝对正确无误。生活是在矛盾、冲突和克服过程中前进的。现实生活总是要比斯大林十分喜欢的公式丰富多彩。因此,建设新社会的道路和方法的选择,在这条道路上的成就和错误,不能只是和斯大林联在一起。至于斯大林是行政官僚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化身和这种模式的主要捍卫者,那是另一回事。

还有一种看法。斯大林不是一下子选定某种确定的建设新社会的概念的。他并不总是明白,或许也不赞同列宁的观点,特别是列宁在他最后几封信和文章中陈述的观点。斯大林常常回想起“战时共产主义”,但他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容忍“新经济政策”,因为他明白,没有紧密的、非偶然性的工农联盟,苏联的许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逐渐滑向恺撒主义和独裁、专制,不让人民管理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的选择的标志。斯大林不是理论家,他的结论多是依靠引证加上意志冲动作出的。从内心说,托洛茨基的“暴力”方法更合斯大林的心意。实质上,他在这方面接近托洛茨基甚于接近其他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袖。而这种带有个人的不可调和色彩的内在相似,使两个极端自负的人不断“疏远”,关系紧张。



斯大林逐一回想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杰作，冷笑道：“这两人也配写列宁主义！”他要写文章论述列宁主义，而且要写得使大家都感到，斯大林与其暂时的同路人对列宁主义的理解根本不同。而暂时需要打击托洛茨基。斯大林对他计划于1924年11月19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作了精心准备。在加米涅夫的报告之后，他作了题为《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

总书记的整个演说都是为了无情地批判托洛茨基，的确，顺便保护了（暂时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把这两位活动家的十月事件说成是偶然的：“意见分歧所以只延续了几天，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列宁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他这是昧着良心说的，因为他既不认为他们是列宁主义者，也不认为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只不过他暂时需要他们来对付托洛茨基和巩固自己的地位罢了。斯大林向全体与会者提出一连串问题：

托洛茨基为什么要发表那些反党的新著作呢？现在，当党不愿意进行争论的时候，当党正为一大堆紧急任务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当党需要团结一致地进行恢复经济的工作，而不是要对老问题进行新斗争的时候，这些著作的用意、任务和目的何在呢？托洛茨基为什么要把党拉回去进行新的争论呢？

斯大林讲完这一大段话后，两眼环视了一下会场，用低沉平稳的声音斩钉截铁地答道：

根据一切材料来看，这个“用心”就是：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中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企图，想准备条件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托洛茨基所以“急切”需要破坏党的威信，破坏举行起义的党的干部的威信，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到破坏列宁



主义的威信。

这里倒是有几分真理：托洛茨基一方面给列宁和列宁主义冠以许多并不需要的评价很高的形容词，另一方面却一步一步地、反复多次地对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论断提出怀疑。托洛茨基认为，没有其他国家的支持，俄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只能靠牺牲农民的利益；新经济政策是投降的开始；合作社计划为时过早；十月革命不过是二月革命的继续；居民不经过“劳动军”的教育，就不会明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等。鉴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迎合托洛茨基，并组成旨在“包围”斯大林的所谓“新反对派”，斯大林起先反对托洛茨基、后来也反对其“新的”盟友的演说在这段时期可以被认为是“捍卫列宁主义”的。斯大林暂时还是用合法的方法进行斗争的，但他常常是“捍卫”引文，对它们并没有创造性的理解。他的言论中建设性的新东西很少，何况托洛茨基也并非全是错的，特别是在谈起官僚主义危险时。斯大林在这一时期的全部讲话满篇都是引文。斯大林在结束自己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时毫不含糊地说：“有人谈到惩罚反对派和分裂的可能性。同志们，这是胡说。我们党是坚强有力的。它不容许任何分裂。至于惩罚，我是坚决反对的。”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3)

斯大林暂时“饶恕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没有批判他们，甚至还保护他们不受托洛茨基的攻击。然而“新反对派”的



创始人不接受总书记的橄榄枝。1925年初,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加米涅夫在其同伙的支持下声明说,苏联在技术和经济上的落后,加上资本主义的包围,正在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实质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主要问题上已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而在几个月前,他们还因为同一个论点,对托洛茨基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必须对“新反对派”反对俄共(布)的政策的行为给予回击,就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的进一步行动制定出对全党的指示。在这方面,1925年4月底举行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占有重要地位。斯大林在会上既没有作报告,也没有在辩论时发言。会议的中心问题有:关于合作社(报告人李可夫)、关于冶金工业(捷尔任斯基)、关于农业税(瞿鲁巴)、关于党的建设(莫洛托夫)、关于革命法制(索尔茨)、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召开而产生的任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按照惯例(或是由于习惯?)主持了会议,就像他通常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政治局会议一样。但这是最后一次。此后他同季诺维也夫再没有担任过这种会议的主席……看来,代表会议决定的主要东西,就是与季诺维也夫的提纲初稿相反,提出了甚至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速度延缓条件下社会主义在苏联也可能取得胜利的论点。然而,代表会议得出结论说,只有具备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国际保障,社会主义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对革命法制问题的讨论十分重要。报告人是曾经同斯大林一起在图鲁汉斯克流放的索尔茨,他指出,革命胜利之后,我们“迫切感到改善我国经济比建立革命法制更重要”。而现在,索尔茨明确地说:“所有党员、所有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人都应当明白,我们的各种法律也在确立和巩固我们想实现和巩固的建设



事业,破坏我们的法律就是破坏这一建设事业。”只是很遗憾,这些写进了代表会议决议的正确思想大约 10 年之后将被忘得一干二净。

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以后不几天,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总书记在他的报告中分出专门一节,题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他再次辛辣地批判了托洛茨基,列举了托洛茨基的许多著作,嘲笑(已是多少次了!)他的“不断革命”论。斯大林慷慨激昂、满怀信心地向党的积极分子们阐明了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实质,但同时已开始出现了强调自己在党内的特殊作用和特殊地位的最初迹象。例如,他不再保持谦虚,认为可以大段地引用自己的话了。斯大林陈述着(暂时地!)基本正确的论点,逐渐使党相信,他具有掌握真理的特殊权利。

斯大林不仅在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在报刊上,而且在极其少有的会见工人的场合,都试图验证一下自己对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理解。斯大林的助手托夫斯图哈记下了总书记 1927 年 3 月 1 日在斯大林十月铁路修配厂发表的一次讲话。

工人们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不大熟悉的人。斯大林扫视了一下几百张脸,合着讲话的节拍挥动着手臂,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们不靠外来援助,正在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其他国家是如何走过这条道路的呢?

英国用了整整 200 年靠掠夺殖民地建立了自己的工业。我们根本不可能走这条道路。

德国从战败的法国勒索了 50 亿法郎。但这种掠夺战败国的道路对我们也不合适。我们的事业是和平政策。

还有第三条道路,即俄国沙皇政府所走的道路。这就是举



借外债和签订牺牲工人农民利益的奴役性条约的道路。我们不能走这条道路。

我们有自己的道路,这就是靠自己积累的道路。这里不能没有错误,我们将会有一些缺点。但是,我们建设的大厦是如此巨大,以致使这些错误、这些缺点归根结底没有重大意义。

第二天,《工人莫斯科报》作了报道:“掌声像炒爆豆一般。一个身穿草绿色军服、手握烟斗、脚穿磨歪了后跟的皮靴的人站到了台前。‘斯大林万岁!联共(布)中央万岁!’人们给斯大林递上一些字条,他不时捻捻黑色的胡须,全神贯注地研究着字条。大厅里静下来了,斯大林,这个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修配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开始了他同工人的谈话……”顺便指出,这是十分罕见的。斯大林更喜欢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在中央全会上演说。后来,他在人民面前“露面”就更少了——神秘莫测的领袖总是引起许多传闻。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在经济和文化建设取得初步成就的条件下进行的。1925年农业方面已经达到而且许多指标已超过战前水平。例如,农产品总量超过战前水平的112%。这个成就是十分显著的。作为城乡结合的新经济政策开始结果了。曾有五年多完全处于崩溃状态的工业生产,达到战前的3/4。出现了第一批新建筑物,这首先是发电站。而外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曾预言,至少需要15至20年才能达到战前水平!扫盲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学校网扩大,特别是在各民族共和国。在建立全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国家文教工作的重要决定。俄罗斯科学院改组为苏联科学院。那时就已经出版了像弗·伊·维尔纳茨基、尼·伊·瓦维洛夫、瓦·罗·威廉斯、尼·德·



泽林斯基、伊·米·古布金、米·尼·波克罗夫斯基、阿·费·约费、阿·叶·费斯曼以及其他许多苏联科学先驱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红军顺利地转入和平状态,同时实行军事改革。特别是在1925年1月中央全会解除了托洛茨基的陆海军人民委员职务、任命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龙芝为陆海军人民委员之后,这一工作进展尤为迅速。

看来,值得提一下这次全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走出了出人意料的一着棋。加米涅夫提议……斯大林接替托洛茨基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对于此举可以有各种看法。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斯大林的影响在不可遏制地增长,决定把他推上荣誉的负责位置,以便他们能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重新“提出”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撤下来。也可能,这两驾政治马车想通过这一步骤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彻底排除托洛茨基和打击斯大林。但是可惜,如果说托洛茨基充当了“双雕”之一,那么斯大林是不会同意充当这一角色的。总书记当众流露出对加米涅夫这个建议的惊奇和不满情绪,这一点许多中央委员在会上都觉察出来了。加米涅夫的“倡议”遭到了多数的否决。

问题是在托洛茨基缺席的情况下决定的——他称病不参加会议。在斗争的最关键时刻这位政治家走了几着极其失策的棋,从而减轻了斯大林“各个击破敌人”的任务。总的来说,这次全会对斯大林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托洛茨基的地位进一步削弱了。全会实质上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失去了支持。在“玩弄计谋”方面,总书记做到了他的反对者没能做到的事:一箭双雕,不,是削弱了托洛茨基和一对老二重唱者。由斯大林、季诺



维也夫、加米涅夫组成的有影响的三驾马车实质上分裂了——总书记用不着它了。

全国都在为迎接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作准备，这次大会将成为选择国民经济工业化途径的关键时刻。但到 1925 年 12 月，当代表大会已经举行的时候，还很难相信报上写的东西将会实现。第聂伯河水平静地流着，暂时还没有被大坝截住；在土西铁路 * 延伸的地方，沙暴卷着铺天盖地的黄沙横行肆虐；在未来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厂址上还是一片空地；谁也没想到，经过了一个五年计划，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的高炉就在古老的山脚下拔地而起；谁能想到，火箭的发明者加快了宇宙飞行纪元的来临——30 年代初，苏联的第一枚“ - ”号火箭发射成功……

的确，形势在逐渐好转。新经济政策给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历史性的成功机会。实质上，这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初级模型，它有助于在新的条件下保持进取的动力。新经济政策使农业产量迅速提高，工业接近战前水平。具有远见的人们把全俄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不单看作是全国电气化的途径，而且看作是把社会主义经济提到新的政治制度高度的方法。但这仅仅是开始，还有很多困难有待克服。

工业托拉斯开始按照商业原则经营，自行定价，出现了倾斜。例如，为买一块肥皂、一俄尺印花布、一桶煤油，农民要比 1913 年多卖 2—3 倍的粮食。不满情绪逐渐增长。这是一个警报信号。发展租让企业的希望落空了：预期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的借款未能得到，而对外贸易额还不及战前水平的一半。向职业介绍所登记的失业者有 150 万。每两个成人中就有一个目不识丁。没有钱买机床和机器。几乎没有新的大型建筑。但



是,留心报纸的人们感到:国家正处于巨变前夕。看来,年轻的国家没有别的选择,为了在这个复杂危险的世界里生存下去,必须加快速度。可是如何加速?靠什么加速?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4)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在这次大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斯大林,这首先是因为由总书记作的政治报告在代表们的工作中占了主要地位。代表大会批准了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关于可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决议。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总之,社会主义一定能够在一国取得胜利(这里指的不是最终胜利)。”代表大会宣布向工业化过渡,认为这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任务。代表们意识到,这一方针要求作出特别努力和牺牲。会上提出了速度问题。很多人,其中包括领导人,对这个问题都不十分清楚。

除了审议主要的经济性问题外,对“新反对派”的斗争问题也再次成为大会工作的中心。大家知道,反对派的主要力量是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列宁格勒代表团。正是他代表反对派作了副报告。但大会对他的讲话反应冷淡。季诺维也夫及其同伙的论据软弱无力,不能令人信服。但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不无根据地警告党的官僚化危险。他们认为,这种危险已经开始产生。然而,为了给代表们留下应有的印象,他们的发言带有过多的个人特点。正像前面指出的那样,加米涅夫在代表大会上第一次直截了当地说,他“确信斯大林同志不能胜任



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统一者的角色”。但是,当加米涅夫说出这句话时,大多数代表开始一字一顿地喊道:“斯大林!斯大林!”实际上形成了对总书记的欢呼。斯大林感到,他不停地重复的“捍卫列宁主义”的路线,得到了全党愈来愈大的支持。总书记赢得声望的“秘密”就在于他拥有“捍卫列宁主义”和解释列宁主义的垄断权,加上许多党员的政治素养不高……斯大林的威信不知不觉地逐渐扩及全党。我想,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还有下述情况:从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一直以“集体领导”的名义行事,为实现群众最易理解的列宁遗嘱而斗争,这就是恢复国家的经济、发展合作社、活跃商业、普及文化。

斯大林似乎一次也没有“倒向”某个反对派。所以形成这种印象,是因为斯大林把自己的任何步骤、决定、批评、建议全都冒充为列宁的!尽管对斯大林的实际活动的分析证明,他犯过不少各种各样的错误,经常是一会儿支持这个集团,一会儿支持那个集团,但是他善于比其他人更快地“修正”自己的立场。斯大林最善于在口头上把自己的路线、政策同列宁的等同起来。这也是(再强调一次)斯大林得到全党支持的秘密之一。当然,在许多(但不是全部!)问题上斯大林确实捍卫了列宁的思想,可是愈往后愈明显,他,斯大林,对这些思想的想法愈来愈具有独裁性。许多布尔什维克常常把党的方针、中央的工作同具体的人联系起来。由于在列宁逝世后没有公认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统一者”斯大林就成了取得第一批国民经济成就和实现党的统一以及靠粮食税来实现农业振兴的方针的代表者。大部分代表都清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引人注意的托洛茨基向中央及其方针全力发动进攻,首先是出于自己争夺领袖地位的野心。但是反对派彻底失败了。



党内斗争的下一个阶段表现在组织问题上。联共(布)(党现在开始用这个名称)中央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召回了季诺维也夫,不久,根据苏联代表团的倡议,取消了这个职位。基洛夫成了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加米涅夫被解除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不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委员还保留了一段时间。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第一次进入政治局,这大大加强了斯大林的地位。

斯大林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结论中再次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拉舍维奇以及他们的拥护者进行了毁灭性批判。结论着重肯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和加强党的队伍的统一的方针。同时,留心的人也注意到,斯大林经常引用自己的文章、便条、号召,他这样做时丝毫没有一点难为情。具有高度政治修养的人——可惜这样的人当时为数不多——不能不觉察到斯大林在进行批判分析时表现出的毫无礼貌。例如,斯大林以侮辱性的语调评论克鲁普斯卡娅的发言,称她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说法”。而后他再次提到克鲁普斯卡娅,以煽动和侮辱的语调说:“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究竟和其他任何的负责同志有什么区别呢?你们是不是认为个别同志的利益应该放在党的利益之上,应该放在党的统一的利益之上呢?”在我们布尔什维克看来,“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而党的实际利益才是一切”,斯大林在一片掌声中以蛊惑性的口吻结束了他这段长篇大论。他称拉舍维奇是“进行阴谋活动的人”,索柯里尼柯夫喜欢在谈话时没有限度地“瞎扯一通”,加米涅夫“头脑不清”,季诺维也夫“歇斯底里”等等。看来,斯大林那时就已开始滑向这样的立场,非形式上的民主对于他也将是“空



洞的”。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的不可饶恕的粗暴态度，不仅仅是在政治上对克鲁普斯卡娅和已故的伊里奇的不尊敬，而且是由于列宁在世时克鲁普斯卡娅与那些难忘的信件、电话、谈话有关而对她的暗中报复。斯大林从来是什么都不饶恕的。

看来，斯大林感到他在结论中作的许多评价“过头了”、“过重了”，就耍弄手段，这种方法他后来还用过多次。他在解释自己对季诺维也夫的一篇小文章《时代哲学》的粗暴批评时说，他的粗暴只是对敌对分子和异己分子，而这是由于他的性格直率。总书记逐渐把自己可憎的性格特点变成了全党的美德，几乎成了革命品质。但是很遗憾，这时，在1925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除加米涅夫外，竟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大会代表、中央委员能够冷静、正确地评价斯大林的个性和他这种严厉斥责似的批评倾向，而到后来，这种批评将意味着判决。就像江河起源于涓涓细流一样，人的某种思想品质也是从个别行为和周围的人对这种行为的态度开始形成的。

斯大林对许多反对派分子进行了彻底批判，当然也没有放过托洛茨基。总书记感到大多数代表的情绪对他有利，就批驳了加米涅夫关于把书记处变为单纯的技术机关的建议，同时指出，他反对把个别领导成员“割除”出中央委员会。他自恃得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认为正是再次提出辞职的时候，说是如果同志们坚持的话，他“情愿让出位置来，决不声张”。斯大林像个老练的政治家一样侃侃而谈，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代表们的支持，使人觉得他没有个人私心，只关心全党的利益。总书记在嘲笑、批判派别分子时，会巧妙地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常在自己的讲话中加上“好吧，让上帝保佑他吧”一类词语。虽然斯大林已经决定，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该一刀两断了”，但他仍然显示



自己爱好和平：“我们主张统一，我们反对割除办法。割除政策是同我们不相容的。党要求统一，如果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愿意这样，党就和他们一起去达到这种统一，如果他们不愿意，党没有他们也要达到这种统一。”

应当指出，斯大林在结论中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如果这些原则实现的话，就会防止我党历史上出现最困难的时期。斯大林在代表们的掌声和明显的赞同声中说道：“在我们这里全会决定一切，当领袖们开始失常的时候，它就来纠正他们……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想肆意妄为，那人们就会来制止我们，——这是必要的，这是必需的。离开集体来领导党是办不到的。在伊里奇逝世以后，谁要幻想这点，那是愚蠢的，谁要讲到这点，那也是愚蠢的。

“集体工作，集体领导，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条件下保持党的统一，保持中央各机关中的统一，——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这些话无疑都是正确的。如果这些关于集体领导的思想配以实际措施和民主准则，就会防止未来滥用权力的现象。但是全部问题在于，正确的论点没有用关于领导轮换制、总书记和党的其他高级领袖的任期、领导人的报告制等等的章程条例固定下来。而列宁关于完善党的机关、巩固党内和社会中的民主因素的思想正是要确立这些原则。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大概是斯大林生前最后一次可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是大会气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后来的代表大会上批评就愈来愈少了。以后，只有斯大林或由他授意才能进行批评。而不能自由表达思想和观点的现象，必然导致停滞、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



这次代表大会由于批准了社会主义建设即工业化的方针，它也就成了这条道路上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党内的民主原则没有得到发展。伟大的东西未必料到，随着它的产生，对它的否定也同时产生。也就是在这些原则的斗争中包含着“领袖”的未来的“胜利”和人民的“悲剧”的根源。并非所有的人当时都明白，为了强大，他们不得不付出个人自由的代价。这不是奇谈怪论，而是专权的规律。

XYZSTAR.COM
校园之星



统 治 人 物

“ 统治人物 ”(1)

依我看,普列汉诺夫这个用语恰如其分地说明了30年代初国内开始形成的局势,即一个人如何上升为至高无上的领袖,如何确立了独裁政治。这种状况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党(不管说出这一点是多么痛苦)允许、赞同了这种当代独裁政治。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增强”党在我们活动的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但是,无论是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还是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那个著名决议中,以及其他正式文件中,都没有讲到党在个人崇拜这种反常现象中有过,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有过错误。但是,在个人崇拜产生的诸多原因中,这是主要原因之一。对自己的领导人的无条件服从、无人监督、职务终身制,造成一种环境,使朱加施维里-斯大林这种具有凶狠、敏锐、狡猾的头脑、不知道妥协的人成了“统治人物”。他可以主宰一切,即主宰社会和经济生活,也主宰



人的头脑。党已不可能制定出使党和人民避免独裁的保护措施。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神圣家族》中有一个深刻的思想：“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

斯大林发表过很多意见，正确地解释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没有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了党内集体领导的意义。例如：1931年12月他说：“个人的决定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片面的。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都有发表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也都有发表不正确的意见的人……我们的领导机关，即领导我们所有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大约有70个委员。在这70个中央委员中有我们优秀的工业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我们优秀的供应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军人、我们优秀的宣传家、我们优秀的鼓动家、我们优秀的办国营农场的专家、我们优秀的办集体农庄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个体农民经济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苏联各民族和民族政策的专家。”斯大林接着说：“在这个最高机构里，集中了我们党的智慧。每个人都有可能提供自己的经验，如果不这样，如果由个人来作决定，那么我们在工作中就会犯极严重的错误。”不论斯大林是否愿意，但是，他最后这句话不自觉地承认了一个思想：在集体化、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在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极严重的错误”中有很多正是由于变为“统治人物”的这个人的个人决定造成的。

这首先表现在，逐步取消中央委员会工作中列宁极其重视的集体领导原则。众所周知，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六年中，根据党的准则和政治需要共召开了6次代表大会、5次代表会议和



43次中央全会。在所有这些党的会议上没有权威的压力,共产党员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阐明对某个问题的立场。通常,党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都是集体力量和智慧的成果。在制定决议的过程中注意(或者了解)各种态度和意见。就党内和党外政策的某些关键问题进行的热烈争论、妥协和大量辩论就是证明。

而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当开始突出地宣传对这个要人的个人迷信时,“领袖”采取了在制定决议中明显限制集体领导的措施。他已经不需要其他人的意见了。从1934年(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这一年),在20年时间里,基本上是在战前,总共只召开了2次党代表大会、1次代表会议、22次中央全会。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间隔时间长达13年!有些年——1941、1942、1943、1945、1946、1948、1950、1951年中央委员会竟没有召开一次会议!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斯大林的决定和行动方针中可以看出,他已经不把中央委员会看成他1931年所称呼的“最高智慧机构”,而只是把它当作党的办公厅、一个执行他的决定的方便的常设机构。事实上,党成了一架执行“统治人物”指示的听话的机器。然而,在1925年筹备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并审订联共(布)章程草案(修改稿)时,斯大林还强调了下面的话的特殊重要性:“例行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每两个月至少召开一次全会。”当然,生活本身作了修正。发生了一场战争,使国家变成了军营,不允许认真执行既定的准则。是可以这样来解释的,但实际上是没有重视这些准则……

列宁早在1905年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革命人民力求建立人民的专



制制度(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而一切反动分子则捍卫沙皇的专制制度。因此,成功的变革不可能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早在本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很久,列宁就只允许“民主专政”形式的“人民的专制制度”。对斯大林来说,现在所有这些关于民主、人民代表制度、集体智慧的老话仿佛一下子变得不重要了,甚至是太天真了。难道他不代表人民的利益?难道他想为自己个人谋取些什么?难道马克思主义否定领袖的作用?……惟一的领袖把一切都往自己手中抓:思想、政治意志、社会仲裁,这就逐步形成了类似政治专制的体制。

斯大林对党的统一的特殊理解加剧了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众所周知,20年代党在执行自己政策时遇到了某些党员的非常积极的反对。这些人并非始终都是“敌人”。一些与通过的决议不同的特殊观点、立场及“方针”、“行动纲领”常常是由于对形势的别出心裁的评价、对运动前途的与众不同的理解造成的,有时则是由于一些人的性格特点造成的。但是,今天来分析一下“反对派”、“派别集团”斗争的全部特点,你就会更加相信,分歧和激烈争吵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选择具体发展民主的道路、“领袖和政党”的关系、群众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有时似乎被其他动机和词句掩盖起来了。在很多情况下,“反对派分子”只是不赞成专权、不赞成把观点一致作为精神外衣,而斯大林总是力求观点一致。我们辩证论者虽然知道,生活是在矛盾中向前运动的,可还是常常有人把不同意见当成敌对的表现。然而不正是在不同意见中反映出寻找最佳选择的愿望吗?难道盲目的意见一致不会产生教条主义者、无个性的和冷漠的人吗?

当然,在那些年中也有不少人有意地给自己提出一些没



有载入党的纲领性方针中的目标,他们信奉的通常是其他理想,在社会问题上另有所钟。在经济破坏、外部帝国主义威胁、各种反对派集团不断强大的情况下,按照列宁的提议,在1921年3月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著名决议。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完报告之后,代表大会要求立即解散所有派别组织。决议中明确指出,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相互之间的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这个方针在党的团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个方针不是反对不同意见和不同意见之间的斗争,而是反对那些其政治纲领同党的纲领和章程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派别组织。

斯大林常常利用这个决议来“打击”“反对派”和“不同倾向”。在他的嘴里“反对派”、“反对派分子”这些词逐渐地具有了完全固定的意思,和“敌对分子”、“敌人”这些概念等同了起来。后来,党的某些领导人同党的政策的任何分歧,哪怕是偶然的分歧,更不用说同领袖立场的分歧,都被“领袖”认定是“反党斗争”、“敌对活动”。斯大林主张统一,但不是辩证地而是教条式地去理解统一,他逐步完全取消了不同意见之间的健康斗争,共产党员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不能批评上级党的机关。党内出现了“不动脑筋的一言堂现象”。在为党的“团结一致”而奋斗的旗帜下,斯大林渐渐地、逐步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在党内生活中抛弃了民主原则。斯大林认为,统一就是执行、无条件服从指示、决心拥护上级机关的任何决定,就进一步巩固了党内的教条式思维,根除了群众的主动创造精神。对上边下达的旨意稍有违背,常常不只是遭到谴责。1938年马林科夫在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上发言时引用了一个例子:当时卡尔梅金的萨雷钦党



组织将共产党员库谢夫开除出党。在政治常识课上给库谢夫提了一个问题：

“我们能否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里可以建成，我们也一定能把它建成。”库谢夫回答。

“那我们能否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呢？”

“我们能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

“而完全的共产主义呢？”

“我们能够建成。”

“我们能够建成彻底的共产主义吗？”

“彻底的共产主义，”库谢夫思索了一下，“没有世界革命未必能建成。不过，我要看看《列宁主义问题》，看看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是怎么写的。”

就这样，由于最后一个回答，由于自己的疑问，库谢夫被开除出党并撤销职务。但是，马林科夫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教条主义的表现，不是要求宗教式的政治观点一致这种个人崇拜现象，而是暗藏在“每个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的“敌人的阴谋诡计”。库谢夫在观点一致中犯了一点“偏离”的错误，而“敌人”立即利用这一点，把他开除出党。这就是马林科夫的逻辑。

“统治人物”(2)

这样的解释歪曲了对统一的民主的理解，即在要求统一集体意志的同时也允许自由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第十次代表



大会在关于统一的决议中规定：“党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如果试图发表新的建议和倡议，或者对党的政策的某些方面提出不同意见，就会遭到侮辱，或者干脆被划入“敌人”之列。对于共产党员，越来越要求他们只是“拥护”和“赞成”，而他们实际参与讨论党和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的机会则越来越少。所有这些不知不觉地使“领袖”更加高高地凌驾于党之上，使他变成了“统治人物”。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工作有监督权的机构。新建的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转变为对党组织执行中央机关的决议的情况、首先是执行“统治人物”指示的情况实行监督。

逐渐地，斯大林的决定开始被所有的人当作党的决定加以接受。30年代中期他的指示就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或通令下达。党的“领袖”的权力实际上已变得毫无限制。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当领导人办公室中实行“昼夜值班”制度时，斯大林经常让政治局一些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孔策沃他的别墅去“吃饭”。最经常到他别墅去的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日丹诺夫。间或也邀请安德列耶夫、加里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沃兹涅先斯基来参加晚宴。在进餐时决定国家、党和军事政策的各种问题。斯大林经常对“谈话”进行总结，而马林科夫，有时是日丹诺夫就把这些“会议”作为政治局会议记录下来。没有出现争论和辩论。斯大林的战友常常竭力去猜测“领袖”的意见或者及时随声附和。同斯大林从来也没有原则性分歧。甚至连“君主”本人有时也对此感到厌烦了。例如，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前夕，有一次吃饭时，话题谈



到准备好的斯大林的报告时，所有人一齐对报告大肆颂扬起来。斯大林听着、听着，突然生硬地说道：

“我给你们报告稿是我已经淘汰了的，你们还在唱赞歌……我准备讲的稿子全都改写过了！”

所有人都打住话头，难堪地沉默起来。但是贝利亚却很快想出来了摆脱困境的办法：

“但是就在这一稿中已经显示了您的手笔。如果您把这一稿再加以改写，可以想象得出，报告将是多么精彩！”

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之后选入政治局的有：安德列耶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基洛夫、柯秀尔、古比雪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尚能定期开会，但并不总是全体出席。决定问题常常是在小范围内：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后来还加上日丹诺夫或贝利亚。斯大林在政治局内部逐渐建立了各种委员会，被称作所谓“五人委员会”、“六人委员会”、“七人委员会”、“九人委员会”……正如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像扑克牌中用数字命名的制度是由政治局的专门决议固定下来的。当然，生活是复杂的，问题很多，列宁还在世时，就在中央委员会中经常建立各种委员会。但是，无论委员会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所有原则性决定都应该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通过。如果把党的管理职能归结为“五人委员会”的意见，而且在这个委员会中自然也只是“一种意见”——“统治人物”的意见，那么集体领导制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喜欢先听战友们的意见，自己最后讲几句，而这最后几句话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决定性的。

在审阅的诸多文件上，斯大林一般都指示“同意”、“赞同”、“可以”，有时，他也把一些文件送给自己的战友，征求他们的意



见,但是通常别人的意见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斯大林在文件上似乎是在征询意见,他写道:

伏罗希洛夫同志:

怎么办?

约·斯大林 PIJH

伏罗希洛夫答复:

斯大林同志。我想,可以批准。

克·伏罗希洛夫

1936年4月7日

在下面,还是在这个文件上,接着是一个坚决的批示:

我反对。

约·斯大林

在结论中不提出任何理由就否定他人意见、只是自己说了算数的武断态度逐渐造成了一种局面,使很多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力图首先去猜测斯大林的意见。很多人做得很成功,特别是贝利亚。

虽然斯大林继续公开强调中央委员会工作中集体领导的意义,但是在30年代中期谁也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对“斯大林政策”的正确性有丝毫怀疑。集体领导变成了由集体对“领袖”的决定、结论、方针表示机械的赞同,从而奠定了官僚专制政体的基础。

我在了解很多记名调查结果以及对某个问题的缺席表决结果时,从未碰到一例这样的情况,即某人哪怕是间接地对斯大林明显错误的、有时甚至是罪恶的建议提出异议。关于这一点下章中再谈。但是,在这里还想再重复一下前面不止一次谈到的思想:中央委员会领导中谁也不打算对说实话的机会加以利用,



哪怕是最最后一次机会。谁也不愿意(或不可能)反对斯大林,哪怕是用最温和的形式。很多已经处在生死线上的人也常常顺从地赞同“领袖”的意见,甚至意识到,这样做并不能减轻对他们的判决。要知道,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并不是都是斯大林坚决提拔起来的“应声虫”。

30年代和40年代党的文件证明,讨论任何问题都必须根据“领袖”的指示和观点进行。各种会议、全体会议的成员在提出往往是正确的经济、社会、技术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必须用斯大林在不同时期讲过的“思想”、“论点”、“结论”加以论证。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到“领袖”逝世之前,已经没有人能够公开对他提出的论点发表某些“补充”或“充实”的意见了。实际上在党内逐步确立了阐明教义的家长制原则。

古代就有人指出,绝对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会变成灾难。在古罗马历史学家萨柳斯蒂致恺撒的“信件”中有这样一句格言:“谁也不会自愿把权力让给别人。不论站在势力顶峰的人如何善良和慈悲,他都可能会因滥用自己的权力而引起担忧。”遗憾的是,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段话是有远见的。

斯大林认为,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应该在全体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容易接受的群众性出版物中固定下来。这些出版物是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十年后出版的“领袖”的《传略》。在1937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9期上斯大林发表了《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信》。斯大林写道,《党史》要把重点放在党同各种派别和集团、同各种反布尔什维主义倾向进行的斗争上。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样一来,党史的中心必然是斯大林,因为正是他——斯大林“击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他们领导的集团和“倾



向”。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即首先通过同“反对派”的斗争来描写党的历史，当然占首要地位的就是斗争的胜利者——斯大林。毫无疑问，当时，确有不少各种派别组织，但多半不是反列宁主义的，而毋宁说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同它们的斗争在党内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党的历史当然不能仅仅归结为、也不应该仅仅归结为这一斗争。

斯大林毫不客气地“指示”（我们知道，他早已习惯于这样做）教科书编者更多地引用他的思想。例如，他建议利用“1882年恩格斯给伯恩施坦的那封有名的信和我对这封信的评论。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联共（布）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第一章中，曾经引用了这封信。如果不作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派别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无谓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无谓纠纷和好打架的人”。全体编者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简明教程》的编写工作，这本书长期以来成了亿万苏联人民思想和理论教育的主要的、常常是惟一的教材。在我国发行的总印数近4300万册的这本书通篇是对斯大林的“天才”、“英明”、“高瞻远瞩”的赞美。在该书第一版中指出：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及亲自积极参加下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但是，斯大林不满意这一措词。在后来出版的经斯大林亲自审订、补充、修改的斯大林《传略》中，出现了新的提法：

“1938年由斯大林同志编写并得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赞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了。”

纵情歌颂他本人的这本书也说成是他写的，对于这种情况，



斯大林已不感到难为情。就这样，“领袖”的绝对作用、他对党和国家的监督也有了思想根据。此外，斯大林这时实际上已经除掉了所有著名的列宁的战友，把他们从历史中“抹去”。在《简明教程》中，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事实上没有具体的人——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战士。只有“敌人”。

共产党员、大专院校的学生、党的教育和政治教育整个体系必须阅读的这本书反复阐述斯大林的几个“定理”：在革命中只有两个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功绩属于斯大林；列宁逝世后党内过去和现在只有一个领袖——“英明的”、“有远见的”、“勇敢的”、“坚定的”领袖……就这样，斯大林的“领袖就是党”的公式通过这本大量发行的教科书深入到全体人民心中。叙述通俗易懂、浅显易懂的公式使《简明教程》一书实际上成为每个人都能读的通俗教材。在30年代形成的对苏联人民进行教育的整个体系中，这本书占据了中心位置。该书出版后，1938年10月1日召开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宣传工作者会议，斯大林在会上作了报告。不妨引证几段他的讲话摘录。

“统治人物”(3)

斯大林说：“本书的任务之一就是消除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脱节现象。”接着他又暗示，目前只有一本书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报告人丝毫不难为情地继续说：“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阐述了列宁给马克思



主义加进去的新的和特殊的东西。我不是说,书中对各方面都作了阐述,但斯大林的书把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主要的东西都说到了。”斯大林一点也没有他喜欢讲的谦虚精神,对自己的著作作出了最高的评价。从这时起,他已经深信自己不仅是惟一的英明领袖,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这就是在党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组织中实行专权和一长制后必然造成的结果。

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在描述罗马皇帝提比略生平时要人们相信,独裁者事先知道自己的未来,他“早就预见到前面等待他的是怎样的仇恨和耻辱”。而斯大林却没有想过这些。他的档案——笔记、决议、信件、照片、新闻影片、讲话速记记录都证实,“领袖”相信他自己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中。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直至他逝世时为止,他始终没有提比略那样的远见,一直在巩固自己的“名望”,想使之千秋万代永存。在同党和人民的关系方面,“领袖的专制”地位逐渐在众多的个人崇拜活动和“仪式”中巩固下来。例如,设立了斯大林奖学金、斯大林奖金。(1925年8月在斯大林参加下通过的关于设立列宁奖金的政府决议简直被忘却了)由斯大林亲自审订的国歌也反映了他在祖国命运中的作用:

斯大林教育我们要忠于人民,鼓舞我们要热爱劳动,建立功勋。

谢·米哈尔科夫和格·埃尔·列吉斯坦根据领袖的指示创作了国歌歌词,把它送交斯大林。斯大林认真审阅,作了修改。在斯大林档案中保存着这些“笔迹”。

斯大林将“各自由民族的崇高联盟”一句改成“各自由共和国牢不可破的联盟”。

第二段四行词作了较多的修改。这段诗最初是这样的:



暴雨过后自由的阳光照耀我们，列宁为我们照亮未来的道路，人民的代表斯大林教育我们，鼓舞我们要热爱劳动、建立功勋。

经斯大林用铅笔改动后的歌词第二、三行词就变成了：

伟大的列宁为我们照亮道路，斯大林教育我们要忠于人民……斯大林有点不喜欢“人民的代表”这句话。虽然，如果想想就知道了，人民确实没有选举过他。他成了广大人民的首领、领袖、独裁者，但却不是人民选举的！不仅米哈尔科夫和埃尔·列吉斯坦立即就同意了斯大林对歌词的这一重大修改，而且1943年10月28日晚上在斯大林住处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谢尔巴科夫也赞成斯大林的修改意见。所以，斯大林不只是“批准”国歌歌词。例如，作者提出的副歌：

社会主义国家永远蒸蒸日上，让我们高举世界和平的旗帜，让光荣的祖国日益繁荣昌盛，我们伟大的人民在保护着你——

斯大林马上就删去了这一段，甚至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不喜欢。大概，他不满意“世界和平”的提法吧？

国歌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党，但是关于领袖的词却是那么必需……在苏联人民心目中逐渐确立了一个思想——斯大林不仅是党的领袖，而且是全体人民的领袖。1949年12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就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公开表达了这一思想：“苏联各族人民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朋友、父亲和领袖。”

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朋友，他平易近人。

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父亲，他热爱人民。

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领袖，他具有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斗争的智慧。

斯大林主义的御用注释者之一叶·雅罗斯拉夫斯基自己写



的《论斯大林同志》一书中有一章叫作《各族人民的领袖》。这一章的主要思想是：“从19世纪90年代末起，斯大林同志就同列宁在一起，总是同列宁在一起，总是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从来也没有偏离过这条道路。”不过，在这本唱赞歌的书中，作者大概也不由自主地表达了一些正确的思想。例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一些地方强调“斯大林对敌人毫不留情”。完全正确。“领袖”对所有他认为是敌人的人都毫不留情。

斯大林读这类“作品”时，愈来愈坚信，他不会很快达到命运的顶峰，“赞美”看来是无止境的。人们还从来没有像赞美他那样赞美过任何一个俄国沙皇！最后他终于相信自己扮演着绝对正确、洞察一切、权力无限的救世主的角色。对“领袖”的胜利吹捧得越厉害，人民悲剧的根子就在社会土壤中扎得越深。

在指出所有这些把“领袖”作用绝对化的个人崇拜现象的同时，还应该指出，它们也起了稳定和团结的作用，虽然是在教条主义基础上。今天我们知道，人民的团结及其道德政治上的统一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达到。但是当时，国家在列宁逝世后没有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而是特别注意树立对领袖、对领袖的智慧和绝对正确的信仰，这样做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尽管30年代末实行了骇人听闻的镇压、国家发展中存在极权主义倾向和“领袖”的独裁作用，但社会及其社会基础还是很牢固的。

今天，在斯大林去世几十年后，虽然公布了大量关于他、关于他那个时代、关于他的罪行的材料，还有很多人由于精神方面、社会方面、道德方面的习惯而继续把斯大林当作伟大的缔造者、“铁腕式”的英明领袖。我想，这种怀念的感情长久不衰的“秘密”不仅同时间的、年龄的状况（“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时代、“自己的”偶像）有关，而且首先由于从总书记开始通过宣传、



教育、社会生活的整个体系长期以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就是斯大林”这样一种信念。因此，对斯大林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过去那个联系着青春时代的思想的忠诚。过去为这个思想作出了很多的奉献，现在却突然发现，体现社会主义的这个象征原来是假的……然而否定“假造的神”不是简单的事；因为他们毕竟是神……

问题不仅仅在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他个人不可能如此改变社会的精神结构和社会结构，即使是借助于自己无限的权力和影响也不可能。社会实践本身，对一个人进行吹捧的战略和策略逐步造成了一定的关系体系。只有在这种体系中、领袖的权威才能在我们称为个人崇拜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只有在这种体系中，一切（或者几乎一切）都为加强领袖的权威“效劳”。当然，特别积极“工作”的是他身边的人。他们是权威必不可少的要素。换句话说，在“领袖和政党”的关系方面出现的偏差不能只归罪于一个人。看来，问题在于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机制，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将党、人民、群众的权威放在首位的民主机制。当然，口头上这样讲了，但是同实际脱节、同社会实践脱节。正因为这样，在领袖和人民权威对比关系中出现了变形，为此人民和党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给个人崇拜的产生、性质下定义时，最常见的一个错误是强调这个人——个人崇拜体现者的主观品质。毫无疑问，主观品质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具体的个人的反面品质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形成的社会关系体系，政权的政治机制。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全部问题只在于个人身上，那么，当这个人离去、逝世后，对这个体系、这个机制就无需作任何改变，因为崇拜现象的



体现者已经不在！然而，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整个情况要复杂得多。对“统治人物”崇拜，把领袖权威神化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产生个人崇拜的社会环境和体制的“乳汁”的滋养。不建立可靠的民主机制、保障和保护措施，个性的变形就可以表现为历史上已发生过的“主观主义”或“唯意志论”，或者表现为导致社会、经济和精神停滞的可笑的自我吹捧和华而不实。

由于人们已经过多地（这也是对的！）指出了斯大林个人品质在个人崇拜现象中的重大作用，我现在打算突出描写能够反映他智力特点的一些方面。大概，这是像斯大林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形象中最少研究的一个方面。

XYZSTAR.COM
校园之星



把列宁主义“通俗化”的人

把列宁主义“通俗化”的人(1)

在朱加施维里的青年时代，“理论”和“理论家”这两个词就在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马尔托夫曾经说过：“正确的理论永远是真理的知交。”斯大林是理解这句话的，他开始接近理论，也接近理论家。1907年在伦敦兄弟会教堂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仔细端详着与东正教教堂迥异的哥特式教堂的轮廓，一面想起所罗门的一句警句：“仁慈和真理不会置你于不顾；你要把它们挂在你的颈上，你要把它们写进你的心灵的史册。”他在少年时期是宗教学校的一名勤勉的学生，以后漂泊的生涯也没有从他的头脑中驱走圣经中的那些道理。“仁慈”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从来不喜欢温情，至于真理……他觉得，在代表大会上他没有得到太多的真理。花很长时间争论“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阶级团结问题”、“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这在他看来都



是抽象的,与俄国的现实没有密切的联系。

而这种现实,在代表大会进行过程中曾极其严正地提醒人们对它加以注意:会议主持人中断了会议,突然宣布,党的会计处已经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会议开完,来支付会议场地租金,支付代表们旅店中的费用和返回的路费。当时还宣布,一位自由主义人士同意支付一张 3000 英镑的期票,条件是偿还时要付给大笔的利息,如果全体代表在期票上签字……一阵静寂之后,代表们纷纷大声议论起来,表示同意。这位突然出现的庇护人要等待十多年时间才能收回他的英镑。他是在进行一次冒险,因为历史上远非一切革命都是按照“订单”来完成的。

有一天,会议休息时,朱加施维里正巧同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呆在一起,后面三人正在争论“不断革命”的问题。铃声响了,会议要继续进行,列宁开玩笑地结束争论说:

“也许罗莎掌握俄罗斯语言比掌握马克思主义语言稍微差一些,因此我们同她有一些分歧……不过这是可以补救的!”

朱加施维里当时对“不断革命”实质的理解是模糊的,因此他没有参与那次时间短促的争论。那也是需要真理的。一个革命者需要多少这样的真理啊?大概,现在他特别需要那些真理,虽然他并没有打算把它们写进自己的心灵的史册。在这之前,只拥有发言权的朱加施维里已经写过二三十篇一般的文章和一本他认为他的理论巨著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从心底为自己这篇著作感到自豪,尽管呆在伦敦的“著作家”中还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篇东西。

斯大林当时会不会知道,30 多年后他会被一致选为一个最强大国家的科学院的荣誉院士?他会不会哪怕想一想,这个科学院中的世界科学巨擘们会在他 70 寿辰时向他献上一部几乎



800 页厚的、充满赞美之词的书籍，就在这本书里，“天才的学者”、“天才的理论家”、“最伟大的思想家”一类的话被无休无止地重复着？！科学院院士马·博·米丁、安·雅·维辛斯基、鲍·德·格列科夫、亚·瓦·托普奇耶夫、阿·费·约费、特·捷·李森科、A·奥巴林、弗·阿·奥布鲁切夫、亚·瓦·温特尔，以及其他一些院士，在这本巨著中说，斯大林对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对发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所作的贡献，如同他的思想的方法论的意义对于整个科学界一样，非常巨大。其实，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泰斗”（1939 年 12 月 22 日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第 9 号记录上就是这样写的）在那个时候是、而且后来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通俗作者、列宁思想的粗浅的解释者。不过在他成为科学院院士、在通过决议称颂他为“世界科学巨擘”时，并不是理性的愿望在支配着这些受尊敬的人们。总书记戴上了知识的桂冠，这不过是由于神化领袖而产生的一种畸形现象而已。

命运真是捉弄人！1949 年，科学院院士彼·尼·波斯佩洛夫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约·维·斯大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伟大泰斗》，可是没过几年，他又受中央委托起草了一份令人瞠目结舌的揭露性的总结，这个总结成了后来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著名报告的基础……现在我们再回到 20 年代……

斯大林身为中央核心的领导，很快感觉到，除了他所具有的组织方面的素质以及许多人在机关中都已感觉到的那种“强硬手腕”以外，他还应当以理论家的姿态表现自己。一方面，由于要过渡到为建立一个新社会而进行斗争的新阶段，需要对广泛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一切



都是新鲜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轮廓使得有可能看到今天现实地平线以外的发展轨道。但是,列宁的结论却要求把理论具体化地运用到最近将来的实践中去。

另一方面,斯大林懂得,一个党的领袖——而他是希望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成为这样的领袖的——应当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稳定的声望。他明白,他平时所写的绝大多数文章,在大众的意识中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些文章许多是为了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事件、某一个时期而写的。在革命大潮中涌现出的各种口号、思想和号召的五彩缤纷的万花筒中,斯大林那些枯燥的文章简直不为人们注意。不错,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开始逐渐在党的领导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时,他还发表过一些理论性的著作。我已经提到过一篇,即《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的理论和哲学水平到底如何,即使从下面这个片段也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在逐渐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后倒退……那么不管它今天还怎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是必遭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为生活中的累赘。由此就产生一个著名的辩证原理:凡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即日益成长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凡是日益腐朽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因而是必遭失败的。”这种推理的令人难受的肤浅和幼稚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没能妨碍米丁院士把这段话称作“对新事物的经典性说明……”

他的如下的一些理论著作,像《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年)、《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1918年)、《关于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1923年)以及其他著作,也没有引起人们多少注意。斯大林很快感觉到,他根本不可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自己的东西,使其在伟大学说中成为真正的新成就。



他越来越相信，列宁的天才已预见到很多东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已把遥远前方的帷幕揭开。斯大林无论在哪方面下多大力气，他都会发现，远在前方已有领袖的踪影。总书记的思想甚至不能接近天才的思想。

激烈的内讧不断地摇撼着党，这在客观上要求斯大林最广泛地去宣传列宁的遗著，宣传他的思想和结论。因此他产生一个想法：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进行短期的讲课，题目是《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逝世不久这门课就讲完了。1924年4月和5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讲稿。也许就是这篇讲稿使斯大林在某种程度上被公认为“理论家”的。

不仅基本群众即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而且工人阶级和党员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因此常常出现学习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要求。只有极其通俗、易懂、清楚、简单，才能使他们理解列宁的思想。斯大林对解决这个问题是有所准备的。他那种“教义问答式的”思维方式在这里是再有用不过的了。电文一样简短的句子，没有任何费解的名词。不深奥，但是清楚，非常清楚……讲稿发表以后很受欢迎，被宣传员、鼓动员广泛用来消除人民群众的政治上的无知。后来，《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论列宁主义基础》被奉为经典，被斯大林的热心的宣传员们变成了教条引文集。他的著作简直就像是引文的拼凑，如果从他的集子中去掉引文，有些著作就会只剩下标点符号了。但还是一版接一版地出……

在斯大林的这些著作中有不少论点，千百万苏联人的世界观就是在这些论点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总书记在解释列宁的思想时，把其中的许多东西根本改变了。例如，在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时，他实际上把重点只放在强制的一面，而完全“排



除了“民主”的内容。在今天,当我们读到斯大林的《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一著作而又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时,不能不浑身颤抖。

文集在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本接一本地出版。编辑们没有斯大林的许可不敢作丝毫的改动和更正。因此,比如在阅读1945年第11版《列宁主义问题》这本文集时,你会遇到一些使你惊慌失措的地方。斯大林在争辩,在谩骂、批评、污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索凌、斯卢茨基、布哈林、李可夫、拉狄克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就像是这些人还都活着一样,如说“让我们来听听拉狄克说什么”,“托洛茨基已经说了两年”,“加米涅夫所指的是”,“那么季诺维也夫怎么讲的呢?”,“这些事实季诺维也夫是知道的”,“布哈林又在说……”当然,我们知道,斯大林的这些著作是在这些人像千百万其他的人一样还活着的时候写的。但是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斯大林却依然继续同被他下令处死和消灭的论敌争辩。斯大林所提出的论据,现在已是在同亡故者的影子交战,这些论据不单在科学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污辱性。尽管书里面不断用黑体字印出“掌声转为欢呼声”、“掌声雷动”、“全体起立,向亲爱的领袖致敬”、“震耳欲聋的乌拉声!”——这就是有过的事,——现在却让人感觉到这本书本身就是从一场噩梦中来的。把自己的论敌消灭掉并且继续嘲弄死去的人,只有完全违背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的人才能干得出来。因此,甚至在斯大林的那些粗浅的通俗读物中见到的正确的论断,也不能不令人觉得是对死者进行的污辱。



把列宁主义“通俗化”的人(2)

在斯大林准备用于讲课和以后用于发表的讲稿中,他还没有完全成为思想偏见的俘虏,这种思想偏见是他后来加紧培育起来的。比如说,不可能设想斯大林会在生命的末期写出他在1924年所写的论列宁的领导作风那样的东西。在20年代中期,他能够正确地断言,列宁主义的作风就在于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他写道:“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不承认有什么阻碍,它以自己的求实的坚忍精神排除所有一切障碍,它一定要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我想,如有谁在较晚一些时期公开说出斯大林如下这样一些话,像“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那么他就不得不对此痛苦地感到惋惜。在20年代,斯大林的思想虽然不够奔放和缺少光彩,但总还没有完全被好斗的教条主义紧紧地箍住。

在这里,正好可以谈一谈斯大林的知识结构,虽然这个问题我还要回过头来再说。这种结构是在宗教教条的哺育下,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有选择地阅读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著作的影响下形成的。可以断言,特别可以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著名的”第四章断言,斯大林到底也没有弄清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关系、客观和主观的相互联系、社会发展规律的实质。他说,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铁定的必然性所确定



了的,这种论断就显然像是宿命论了,如他说:“社会主义制度是紧跟着资本主义制度而来的,就像白天紧跟着黑夜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航船上的罗盘,航船一定会驶到彼岸,但有了罗盘行驶得会更快。斯大林嘲笑那些听从“理性要求”和“公共道德”的人,而歌颂同暴力搅和在一起的庸俗唯物主义。他自然会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他的论据,永远让人听起来要么像是肯定的断言,要么像是判决。

《简明教程》中阐述的全部历史,就是一些人一连串的胜利和另一些人一连串的失败,失败者是间谍、两面派、敌人和罪犯。斯大林把一切都放在公式的框框之内: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应当像他所阐发的理论那样。这恰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谈到过的那种情况:这种态度会把思想导至“不符合实际的认识”。幸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命运最终没有被斯大林所支配。按照斯大林的逻辑,一切发生的事都是合理的:各国共产党的成长,这是肯定的;右倾的被粉碎,这是无疑的;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这是自然的,等等。创造性、意志、幻想、思想上的果敢——这些在这一章里是根本没有地盘的。

斯大林的才智做了公式的俘虏。请大家自己作出判断:辩证法的3个基本特征,反对派集团发展的4个阶段,唯物主义的3个基本特征,红军的3个特点,机会主义的3个基本来源,等等。不错,为了教学目的这也许是不坏的。然而,对整个理论进行“清点”,然后把它归结为几个特征和特点、几个阶段和时期,这就会使社会科学变得贫乏,使世界观变为教条主义的世界观。

从某个时期以来,在斯大林的著作中开始出现宗教仪式的因素。在他的思维中很难看出有什么不同色彩、转变过程、保留



条件、新颖的思想和出奇的东西。“领袖”的思想只能有一种解释：凡是出自他笔下的东西，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的发展。他的每一句名言都是纲领。凡是不符合他的提法的东西，都是可疑的，甚至是敌对的。庸俗化、简单化、公式化、片面性、武断性，使斯大林的观点带有一种原始的正统的性质。完全有理由断定，斯大林对自己所说的话的“英明性”是没有怀疑过的。得出这种结论的一个证明是，他喜欢引用自己的话。尽管如此，斯大林的才智看来也有一个强有力的特点，那就是务实性。总书记企图把每一个理论原则（常常是极其机械地）同社会实践的具体的要求和需求联系起来。我要立即声明，并不是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所有著作都具有这种具体实践的目的性。但是，我要再次强调，斯大林的这种目的性并不是辩证的。机械论，即行动的机械性，常常有些像宿命论，往往使斯大林的著作带有漫画式的性质。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会议上说：“同志们，单靠一个自由是很难生活的。（齐声赞同，鼓掌。）为了能生活得好，生活得愉快，除了政治自由的福利以外，还必须要物质福利。我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了人民物质福利，给了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生活得很愉快，而斯达汉诺夫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对这种斯达汉诺夫运动产生的根源的“论据”，用不着作什么补充说明。这种庸俗和肤浅的东西长期地向人们的意识中灌输，我们有时还不清楚，这种“搞乱”人们思想的做法究竟带来了多么严重、多么长久的后果。

20年代，在选择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方法时，党的领导者们也在积极开展理论工作。在《真理报》上，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经常刊登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



大林、加里宁、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党的其他活动家的文章，他们想观察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和前景。其中一些人在发表自己的著作方面是颇有成绩的。比如，托洛茨基在革命后的十年当中出版了 21 卷书。1924 年 12 月 4 日《真理报》报道，国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开始出版季诺维也夫的 22 卷本的文集。文集出版委员会把这部文集评价为一种“工人百科全书”。《真理报》还报道了《十月革命：列宁、布哈林、斯大林文选》一书的出版消息。在这期间，布哈林所写的材料出版得特别多，如《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等文章。

斯大林也“不甘落后”。但是，他在 20 年代发表的大部分文章，与其说是普及列宁主义，不如说是同各种集团、反对派以及各种派别的领导人进行论战。在这方面斯大林感到自己如鱼得水。看来，由于同反对派进行斗争，由于对自己昨天的同伴进行坚决的厉声的批评，他才成为了一位“理论家”。顺便提一下，托洛茨基在他的《斯大林的伪造学派》一书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书中提到，斯大林是靠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才成为“理论家”的。在论战中，在无数次的搏斗和“揭露”中磨炼了斯大林的思想。他在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发言，都是很强硬的、坚决的，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调和的，虽然斯大林有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也作了一些宽容的“松动”。例如，1926 年 10 月 11 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缓和党内斗争的措施》的报告。这些“缓和措施”归结为五点最后通牒，反对派的首领如果想留在中央，就必须接受这五点要求。

在与思想上的论敌进行论战时，斯大林完全变了样子：他开始善于雄辩，并使用了尖锐的语言，有时还带有个人侮辱的性质。斯大林常常一点也不难为情地说对方是“饶舌者”、“造谣



者”、“糊涂虫”、“不学无术”、“夸夸其谈”、“应声虫”。总书记在为党的统一、反对派别活动、争取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进行的斗争中,得到一个粗暴的但不调和的战士的名声,他对此甚至感到自豪。我们记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总结发言时,斯大林尖锐地批评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仿佛是要把粗暴的权利作为总书记的标志攫为己有,他在代表们一片赞同的笑声中说:“是的,同志们,我是一个直率而粗暴的人,这是事实,我并不否认这一点。”

我重复说一遍,这种“直率而粗暴”简直常常带有侮辱人的性质。波克罗夫斯基曾试图弄清斯大林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的立场,总书记在给他的回信中一开头便称这位律师是“自命不凡的无耻之徒”。在回信的末尾也用的是同样的调子,他写道:“你对于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是一窍不通的,简直是一窍不通的,……结论是:需要具备不学无术者的厚颜无耻和鼠目寸光的见风使舵者的自满自足,才能肆无忌惮地把事情搞到头脚颠倒的地步……”斯大林就是用这种方式 and 语言进行批评的。斯大林在反对论敌时使用的一些严肃的论据,常常要衬托上一些粗鲁的形容词。总书记总是信心十足地断定说:这里是真理,那里是谬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否则就会出现像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所说的那种情况:

我们在错误面前关上了大门。

真理慌乱不安地说:我将如何进去?



把列宁主义“通俗化”的人(3)

随着自己威信的确立和总书记职位的政治重要性的提高,斯大林越来越喜欢使用自己的话作为论据。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论据就成了至高无上的真理。但越到后来斯大林就越是很少察觉到这点。例如,在给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课时对列宁主义下了定义之后,斯大林便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一著作中实际上把这一定义吹捧为完美无缺和包罗万象的。接着他又多次大量引用自己的东西,并且总是附加上这样一类的评语:“这都是正确的,因为这完全来源于列宁主义”,等等。有时真是令人震惊,总书记竟然把自己的结论抬得那么高,评价得那么高。后来这竟成了一种惯例:让读者们去参阅他自己的文章和著作。例如,在回答波科耶夫同志《关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时,斯大林不仅闭口不谈这一思想完全属于列宁,而且还硬说正是他斯大林提出了这一思想。总书记没有用什么特别的论据来麻烦自己,他在文章的附言中直截了当地说:“您拿来《布尔什维克》杂志(莫斯科出版的)第3期看看我写的一篇文章。这会便于您的工作的。”至于对波科耶夫的回答本身,除了一些正确的原则之外,斯大林特别强调一个思想:“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结成联盟,就能彻底打败(这里和下面的着重号是我加的。——本书作者注)我国资本家”;“反对派却说,我们不能彻底打败本国资本家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我们不打算彻底打败我国的资本家……我们……夺取政权是多余的”。这



里强调的是在 1926 年“彻底击溃”剥削阶级的残余，这是非常明显的。看来在当时这并不是主要的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彻底击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非常错误的论点：越是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打击”和“彻底击溃”很快就成为斯大林几乎最主要的工作了。

尽管斯大林理论概括的水平极为平常和一般，他却十分喜欢下定义。可以举出以下一些广为人知的定义：关于列宁主义的实质、关于民族的实质、关于政治上的战略和策略、关于倾向的实质等等定义。这些定义可能在普及列宁主义基础方面起过某种作用。但斯大林是一个极其愿意进行教条式思维的人，他简直把定义奉为了教规，他可以用整篇讲话来证明某个反对派对某个问题的不理解。

不过，看来斯大林理论“创作”中最消极的东西要算是他实际上抛弃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逐渐地“论证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牺牲的社会主义”。总书记的这种世界观慢慢地使得他无所顾忌地实行了罕见的大规模的镇压，把暴力手段作为建设新社会的主要社会方法来广泛使用。事实上，把斯大林的理论观点，特别是把这些观点具体化的方法加以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总书记逐渐脱离了列宁主义。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斯大林仍是布尔什维克，但他最终并没有成为列宁主义者！这是党的领导人！在许多种社会主义，如空想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兵营式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当中，斯大林创造了某种自己的东西，即官僚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既包含教条社会主义的特点，也包含兵营式社会主义的特点。总之，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当然，在千百万人建立起来的这一社会主义的活的机体组织中，他不能、



不可能也没有来得及使一切变形。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还不能把一个只有高度社会化程度、集体的东西高于个人的东西、一切完全由“上面”来计划的社会称作社会主义社会。列宁所预见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那样一种社会主义,处在它的中心位置的是人。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是民主,是人道主义,是人,是社会公平。这种立场永远也不会与暴力结合在一起,不会与权力脱离人民结合在一起,不会与半神化的领袖结合在一起。这证明,在某个阶段上,斯大林越来越脱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

为了公平起见,不能不指出,总书记的文章、演说、答辩、回答,一般都是他自己动手准备的。他的助手们以及在各个时期同他一起工作过的、总书记机关中的其他负责人所提供的证明,使人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斯大林负担大量的工作,他还是很注意提高自己的。根据他的专门要求每天给他挑选书刊,送去文章的剪片、地方党刊的综合材料、国外报刊的综述以及最有意思的来信。

有一次他长时间地在看一封柏林的来信,回信的地址是:采林多夫,瓦尔特马尔大街,11号,“维拉·尼娜”,·克雷莫夫收。这是一封很不寻常的信。写信人是一位“失势者”,作家,1917年逃离俄国,但他在留心地、专心致志地注视着新的俄国。斯大林一面读着这封信,一面在上面划线。信中写道:“我现在给您写信,我把您看作现今俄国最大的国务活动家之一。我是个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但我爱俄国毕竟甚于爱任何其他国家。我在这里也许能看到某些您不十分清楚的事,尽管您在国内也很了解情况。”(这里用红铅笔划了两道线。——本书作者注)

“……无论如何要把政权掌握在你们这些无产阶级领袖手



中,不要顾惜一切。请记住:‘谁不善于逞凶,谁就不能成为国家领导人。’首先要有军队。军队不应当打仗,但它应当存在。大家都应当了解,关于军队的有些说法是言过其实的。各种军事检阅越多越好……要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增加俄国的人口和对他们进行充分的教育。这是对付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可怕的武器。今天已经清楚,现今的俄国可以提供一个新的历史规律:摆针可以不向其他方向摆动,它可以永远停留在左边……不需要谎言,但需要两种真理,暂时避而不谈较大的真理,以使得人们相信较小的真理;一旦需要时,小真理就可以让位于大真理了……不要排挤宗教,那样做倒会使它加强。要吸引私人资本。只要国家政权掌握在你们手中,这就不会有任何危险……要支持现今表现出来的俄国人的创造性,而不要吝惜资金。比如说支持文学或者芭蕾舞。应当投给其余世界一个现代俄国鲜明透亮的结晶体,这有时会比最广泛的宣传更起作用……革命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但是试验的时间拖得太长,需要做出实际的成绩,需要实现使无产阶级过上幸福生活的诺言。可是现在,你们办事拖拉的现象比沙皇制度时还严重。有时拖延一些是有益的,但各方面总是这样就极为有害了。”

校园之星

斯大林长时间地阅读这封信,他不再往上面划线,因为几乎每一行字在他看来都是有道理的,都是经过斟酌、耗费心血写出来的。他又看了一眼那笔触奔放的签字:“弗拉·克雷莫夫,此信请勿发表。”斯大林把信放入一个文件夹,那里专门存放他过后还要再看的文件。

在1924—1928年这段期间,斯大林曾多次把工业学院和共产主义学院的一些教授请来,向他们咨询社会知识方面的问题。他特别感到自己在哲学方面逊色。对历史他显然了解得要好一



些,他对加深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同时,他有长期的工作经验,他的职位使他不得不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他养成了敏锐的嗅觉,非常实际的头脑,善于迅速地估计情况并在遇到各种纷繁的问题时辨明方向,而且能抓住其中的主要环节。他具有天赋的观察力,能够很清楚地记住各种人物、姓名和事实,积累了同列宁周围一大批最有教养的人交往的丰富经验,——这一切不能不在斯大林身上养成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比如,他虽然不是理论家,但是在对待理论的实用态度上,在善于使理论最充分地同实际任务“结合”上,他超过了自己的许多伙伴。

在列宁逝世几个月之后,许多人就已感觉到斯大林的“强硬手腕”。总书记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饶恕。他一旦提出了目的,提出了任务,有时就会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敏锐和顽强来实现它们。在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文章和小册子中自然也有过某些“转弯”、某些修正,但他基本上是在重复他先前说过的话。这对周围的人产生了影响,并且逐渐不由自主地具有了老生常谈的色彩。比如,有一次他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and 策略”,然后他就把这一定义奉为经典。无疑,在为新制度的生存而进行直接斗争的时期,这个定义起过作用,使得人们更彻底地理解列宁的理想和目标的实质。但是这个公式在斯大林那里却凝固了许多年,虽然很清楚地可以看出这个公式比起列宁主义的理论 and 实践的内容来要明显地贫乏。把列宁的思想仅仅归结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and 策略,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以后的实践中产生许多缺点的前提条件。

同时,很明显的是,列宁主义是认识世界和对世界进行革命



改造的包括哲学、经济和社会政治观点的完整的科学体系。但是,稍稍离开一点斯大林对列宁主义实质的解释,就被看成机会主义的邪说及其带来的一切后果。

斯大林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简单化(常常简单化到肤浅的程度)的大师。好像雷马克说过,每个独裁者都是从简单化开始的。我再重复一遍,造成理论和党史公式化的功劳正是属于斯大林。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策略、革命的方法、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做这样简单化的解释,有时甚至肤浅的理解,考虑到劳动人民当时的一般政治文化水平,也许是必要的。但是不久以后,即到 20 年代末,一些比较重要和深刻的著作干脆就不能出现了。只能评价、研究、颂扬斯大林的著作。在几十年的时间内,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思维陷入了极度的不景气和停滞状态。把理论上的各种结论硬套在生活现实和社会存在上,正是由斯大林开头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简单的公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标本,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社会思想的发展。在很简单的、往往是错误的论点的基础上,教条主义的观点开始迅速地发展。可以把教条主义比作搁浅的船只。浪涛汹涌前进,而船只却原地不动,不过表面上还保持着动作的假象。斯大林对于思想体系完全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他认为,真正的思想体系,在国内应当像水泥那样发挥作用,而在国外则应当像炸药.....

他的许多“理论”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巨大社会灾难的根源。有时候我想,一个很有意思的、独出心裁的思想,好像涂上了“颜色”,涂上了橙黄色、紫色、紫红色、翠绿色和蔚蓝色.....这就如同光线穿过雾霭、黑暗和黄昏,画出了期望中的真理



的轮廓。看来,思想的世界不仅具有多种音弦,而且具有多种色彩,但必须善于发现这些色彩。斯大林的思想是灰色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实践中表现得色调愈加昏暗。请大家自己来判断一下吧。

1924年1月14日至15日举行了中央全会,全会研究了一系列问题。季诺维也夫作了国际形势的报告。报告人和其他发言者对在德国遭到的失败进行了批评性的分析;许多人认为,在德国,革命的形势没有被利用。斯大林在发言中谈到当时正在德国的拉狄克在这次事件中的作用问题。他说:“我反对因为拉狄克在德国问题上犯了错误而对他采取惩罚措施。他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我在这里举出其中的七点。”斯大林最喜欢干的就是把别人的错误串成长串。我不打算把这些错误都重述一遍,我只举出被斯大林编了号的(像在清点册里那样)“第四点”。总书记继续说,拉狄克认为,“德国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并认为必须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而我们的结论是:应当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不仅仅是天真的理论分析上的错误。斯大林这种对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评价中的政治上的短见,使共产党人和全体民主力量在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对极尖锐的问题所作的这种“肤浅的”,更确切地说,错误的阐述,说明他明显地不善于分析多方面的联系。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说明他在理论上的“不明智”。在1924年俄共(布)中央10月全会上,讨论了农村工作问题。报告人是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作了长篇发言,其实,他对农村问题,也像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一样,不很了解情况。不过他也非常正确地估计了总的形势,他说:“我们现在讨论的不仅仅是农村工作问题,而且是整个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也就是说,是更加一般



的问题,大概这个问题在一些年内不会从日程中拿掉,因为这个问题完全同当前情况下如何实行专政的问题联在一起。”斯大林在自己的发言中试图提出一些政治和理论方面的意见,从这些意见中可以看出,这里已经蕴育着未来所犯的一些巨大错误的萌芽。我们应当做的第一点,是“必须重新争取农民”;第二点是要看到“斗争的场所发生了变化”;第三点是“在农村培养干部”。当时是1924年,而斯大林的讲话,听起来好像是在1929年……在犯严重错误方面,他具有多么令人吃惊的“远见”和一贯性。作为列宁主义“诠释者”的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

我还要涉及斯大林以后年代的理论观点。不过现在,为在群众中选择和普及列宁主义思想而斗争的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不仅是科学观点,而且文学艺术也具有对人们产生社会影响的力量。

